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历史科学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历史科学

（征求意见本）

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八月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历史科学
（征求意见本）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6 15/32 印张 500,000字
定价 1.50 元

说　明

为了适应工农兵理论队伍，专业工作者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阵地，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需要，我们请大连红旗造船厂工人业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这本书。

本书收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选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全书的纲。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不再选编。

本书选编的语录，大体上按照内容排列。

本书选编工作得到中央党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宣传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帮助。北京、天津、辽宁和沈阳、营口、大连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工农兵和专业工作者给了大力支持，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

工农兵选编马列专题语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新生事物。从事选编本书工作的工人同志，怀着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雄心壮志，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做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时间仓促，选编工作还不够完善，现在印出来是为了进一步征求意见。希望同志们多多提出意见，以便继续修改。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五年八月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 1

第一编　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学成为科学……19

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29

三、历史科学的阶级性和党性……37

四、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研究全部历史……41

第二编　人类历史是在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发展的

一、社会的基本矛盾……44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44

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44

2.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51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53

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53

2.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59

二、生产方式决定社会面貌……63
三、社会形态……70
（一）原始社会……70
1. 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 ……70
2. 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 ……75
3. 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 ……79
4. 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 ……82
5. 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84
（二）奴隶社会……96
1. 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 ……96
2. 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 ……97
3. 奴隶社会的国家是奴隶主镇压奴隶的工具 …… 104
4. 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 …… 106
5. 奴隶起义震撼和打击了奴隶制度 …… 107
6. 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奴隶制的崩溃 …… 108
（三）封建社会…… 113
1. 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 …… 113
2. 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119
3. 封建国家是地主镇压农民的工具 …… 128
4. 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 131
5. 农民起义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 …… 132
6.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封建制度的崩溃…… 135
（四）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48
1. 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148

2. 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165
3. 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残酷剥削…… 170
4.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 186
5. 资产阶级国家不管采用什么形式，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 203
6.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210
7.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 221
8. 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 …… 230

第三编　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随着阶级的产生，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 240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245
（一）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斗争…… 245
（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248
（三）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255
（四）阶级斗争的加剧，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化…… 259
（五）剥削阶级不会对被剥削阶级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 261
（六）反动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265
（七）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269
（八）批判阶级调和论和唯生产力论…… 276
1. 批判阶级调和论 …… 276

2. 批判唯生产力论…… 279
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 281
（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281
（二）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285
（三）国家的主要成分是军队…… 289
（四）国家对社会发展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296
（五）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299
（六）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301
（七）法律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它具有影响经济基础的特殊能力…… 306
（八）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316
（九）批判超阶级的国家观…… 322
四、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331
（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331
（二）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336
（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 337
（四）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只有消灭帝国主义，才能消灭现代战争…… 340
（五）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 343
（六）认清战争性质，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349
（七）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355
（八）揭露帝国主义假和平真扩张的阴谋…… 356
五、民族斗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 363

（一）民族是个历史的范畴…… 363
（二）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367
（三）民族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民族压迫…… 371
（四）现代殖民主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 375
（五）民族压迫必然引起民族解放斗争…… 376
（六）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383
（七）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沙文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386

第四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393
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巨大的反作用…… 398
（一）社会意识的反作用…… 398
（二）革命理论的作用…… 400
三、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405
四、社会意识的阶级性。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410
五、道德在阶级社会里总是阶级的道德…… 414
六、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418
七、文学艺术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 427
八、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432

第五编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439

（一）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 439
（二）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442
（三）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 444
（四）无产阶级只有靠自己解放自己…… 450
（五）妇女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461
（六）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469
（七）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 481
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483
（一）每个时代都需要并会造就出自己的伟大人物… 483
（二）历史人物是一定阶级的代表…… 485
（三）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488
（四）无产阶级领袖的重要作用…… 492
（五）对历史人物要作全面地历史地分析…… 497
（六）批判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502

第六编　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

一、历史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 506
二、历史矛盾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520
三、历史的发展是按螺旋式前进的…… 525
（一）历史运动中的进化和革命…… 525
（二）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 528
四、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535
五、历史发展的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 540
六、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 543

七、历史运动的因果关系…… 550
八、历史上本质关系往往隐藏在现象形态的后面…… 553
九、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折衷主义…… 563
十、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拒…… 569
（一）新生力量必然战胜腐朽力量…… 569
（二）反对因循守旧，支持新生事物和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 574
（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582

第七编　研究历史的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指南…… 589
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 591
三、研究历史必须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 598
四、运用辩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604
五、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610
六、研究历史要抓主体、抓典型…… 622
七、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结合起来…… 629

第八编　研究历史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

一、我们的任务是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633
二、对历史遗产必须批判地继承…… 636
（一）不要割断历史…… 636
（二）要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 638

（三）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和
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641
三、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
促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647
四、认清时代，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
的斗争进行到底…… 654

附：关于历史人物的若干论述

斯巴达克…… 664
闵采尔、加尔文…… 665

德谟克利特…… 671
亚里士多德…… 672
柏拉图…… 677

培根、洛克、霍布斯…… 678
康德…… 683

摩尔根…… 686

黑格尔…… 690
费尔巴哈…… 697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703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 708

巴贝夫…… 721
魏特林…… 724
欧仁·鲍狄埃…… 727
约瑟夫·狄慈根…… 729
卡尔·李卜克内西…… 733
卢森堡…… 736

高尔基…… 737

蒲鲁东…… 745
拉萨尔…… 752
巴枯宁…… 759
伯恩施坦…… 767
考茨基…… 769

卢梭…… 777
罗伯斯比尔…… 779
拿破仑…… 784
林肯…… 793
加里波第…… 797

哥白尼…… 800
达尔文…… 802
但丁…… 808
歌德…… 808
海涅…… 810

巴尔扎克…… 813
赫尔岑…… 814
托尔斯泰…… 817

梯也尔…… 820
波拿巴…… 823
俾斯麦…… 826
马尔萨斯…… 831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论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

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了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引起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供大家学习。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些语录，并且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著作。同时，要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好。要充分理解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国亿万人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一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八五〇年一月一十一月一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

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一八七一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

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

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16—517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也许这

个时期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

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

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一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2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252页。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

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343页。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350页。

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周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

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6页。

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非常熟悉经济情况的李可夫同志对我们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只能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当做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

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67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

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七—八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

列宁：《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43页。

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把我们已经开始的进行了两年的革命进行到底。（鼓掌）这个革命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只要我们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要我们在整个国家管理方面、整个国家建设方面、整个新生活的领导方面，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8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

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阅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以及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学校和党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会因为难懂而感到害怕，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不仅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你们也会每天在任何一份报纸上涉及任何一个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材料中碰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国家，国家的实质怎样，国家的意义怎

样，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怎样。

列宁：《论国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41—42页。

（原载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第一编　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三十三

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年2月11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8页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和工人无财产相适应的只能是他们头脑中无幻想。现在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在全球环行。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11月—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8页。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29页

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底）。《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的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48页

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

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

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2—333页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要么直接希求的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

《恩格斯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5页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

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3页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

究的途径。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6页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① 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于《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做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于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千百年来生活于其中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只有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才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结论。其次，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于分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

① 指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编者注

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① 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进化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页

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

① 这里当然始终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列宁原注）

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页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页

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

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7页

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这种历史观[1]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

① 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编者注

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

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1页

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

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424页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愤怒。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118页

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

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2页

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5页

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

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页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注33

它[1]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

① 指旧唯物主义。——编者注

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245页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末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

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6页

三、历史科学的阶级性和党性

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1870年5月—7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3页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7页

我们在阅读资产阶级作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1881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3页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

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

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反过来说，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需发展严格的党性。

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发表于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6页

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不过是属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

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发表于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6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

主义的倾向。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6页

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着，它拥有庞大的组织，它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5页

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的最大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也不能期望资产阶级科学会抱别的态度，因为在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在应不应该用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有公正的工厂主一样愚蠢可笑。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1页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

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官方教授按官方规定讲授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是同样尽心竭力地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页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9页

四、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研究全部历史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注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①，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

① 指社会经济基础。——编者注

轻视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的罪过，仍然又是基督徒的罪过；他们编造了一部奇特的“天国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内在意义，只承认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来的历史具有这种意义。他们硬说人类是基督创造的，说历史有一个虚幻的最终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已经由基督所实现；他们割断了历史，因此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声言后来的十八个世纪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了解这一切的伟大，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

恩格斯：《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651页

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89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

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了一些事情，您一定会注意到，……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第二编　人类历史是在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发展的

一、社会的基本矛盾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 «commerce» 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 «Verkehr» 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322页

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而将其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它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自己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页

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8页。

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8—89页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 peculium castrense① 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 fabri② 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用途，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5—336页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

① 军营里的财产（指古代罗马人军营中的士兵的个人财产）。——编者注

② 古代罗马人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编者注

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只有按前一个意思来了解“生产”，才会把“分配”从“生产”中划分出来，而在谈论生产的“部分”中，不是运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是运用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用这种空洞的废话来抹杀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例如拿资本的概念来说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一贯把“生产”看做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末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阐明了，各个阶级获得的产品份额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相反地，如果生产关系没有阐明（例如，不了解整个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关于消费和分

配的任何论断都会变成废话，或者变成天真的浪漫主义的愿望。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2卷第166—167页

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①；（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58页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8页

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5页。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所做的讲演写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编者注

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8页

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其所以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辈新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工作的结果，因此新的一辈在最初必须接受他们在生产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现成东西，必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质资料。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改进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因素时，不会意识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进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谋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原始公社社会的某些成员在逐渐地摸索着从石器过渡到铁器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他们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意识到，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是

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会引起奴隶占有制度，——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开始建设大工场手工业企业，同行会小作坊并存，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机器化大工业，丝毫也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重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端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日常的狭隘实践的利益。

……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不经过冲突、不经过震荡的。相反地，这种过渡通常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

办法实现的。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54—656页

2、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8页

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48—49页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49页

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时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也确实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就会发生危机，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8页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是两者冲突的例子，在那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同生产力的性质极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结果，就是破坏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本身是以破坏现存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

系为使命的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8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孕育着革命，这个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52页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3年6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

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于表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作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新的“经济情况”能够赖以存在和发

展的政治状态。“经济情况”在这个与之适合的政治和法律的气氛中蓬勃地发展起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4页

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

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172页

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

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是在根本上摧毁这种妄想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道德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页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3页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这是决不可能的。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

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3页

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知道，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3页

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39页

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

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①。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1973年版第3页

2、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②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

① 原文为«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译者注

② 指1871年的巴黎公社。——编者注

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

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487页

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

明显的例子。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501页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们那种致命的疲惫和软弱，——导源于1648—1830年时期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最初表现于虔敬主义，而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对于重新振兴曾是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慢性穷困尖锐化起来才动摇了。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

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履行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1973年版第4页

二、生产方式决定社会面貌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321页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①。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

① 在1891年版本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改为“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编者注

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①，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所做的讲演写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363页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

① 在1891年版本中，“对自然界的关系”改为“对自然界的影响”。——编者注

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425页

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96页

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

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论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即马克思的用语“生产关系”）的体系是为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所包裹着的社会**基础**。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页

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5页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还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生产的另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

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时候，在生产内部彼此建立这种或那种相互关系，即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5—646页

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6页

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50页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于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

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

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8—999页

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服从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律，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例如，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规律，在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的规律。所以，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规律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互相联系着。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56页

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

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

下面就是从古代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情景。从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铧犁等等），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加工材料的金属工具进一步改良，过渡到冶铁风箱，过渡到陶器生产，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得

到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从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进而过渡到机器制，出现现代大机器工业，——这就是人类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远不完备的情景。这里很明显，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8—649页

三、社 会 形 态

（一）原 始 社 会

1、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

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

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那末上述情形是不能不如此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458页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

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

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457页

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转变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使自己的手适应于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9页

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

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0—511页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

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3页

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地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3—514页

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

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3页

2、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

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0页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①，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公社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

① 第3版注：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恩格斯注）

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390页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这种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7页

在社会的初期，产品是由生产者自己消费的，这些生产者自发地组织在或多或少是按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公社中；用这些产品的余额和外人进行交换，从而引起产品到商品的转化，是

以后的事，这种交换起先只是发生在各个不同的氏族公社之间，但后来在公社内部也实行起来，于是大大地促使公社分解为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189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5页

凡有共有制的地方——不管是土地的、或者妻子的、或者任何东西的共有制——，共有制就必定是原始的、来源于动物界的。后来的全部发展就是这种原始共有制的逐渐消亡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例子能证明，共有制是作为派生现象从最初的个人占有发展来的。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3年3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8页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是比较稠密的，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其中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5页

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列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

说原始人获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无偿的赐物，这是笨拙的童话，连刚进大学的学生听了也会对布尔加柯夫先生喝倒采。这种黄金时代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使原始人受到十分沉重的压抑。

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年6—9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89页

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是不承认私有制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8页

有一个时期，即母权制时期，妇女被认为是生产的主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原始的农业中，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她们担负着主要的职能，而男子则出没于森林，寻找野兽。后来一个时期，即父权制时期，男子在生产中占统治地位了。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生

产中，在以戈矛、套绳、弓箭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牧畜经济中，男子起着主要作用……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0页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为了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或邻近部落的牺牲品。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同时用来防御猛兽的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9—650页

3、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

原始状态的标志不是粗野，而是部落古老的血缘关系保留的程度。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3年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32页

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

恩格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版加的注（1883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页

这一进步① 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作证

① 指家庭组织的第二个进步，即排除了姊妹和兄弟之间的性交关系。——编者注

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进入了文明时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34页

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0页

我们也看到，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末差不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极其自然的）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组织。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属关系，并且它们之中每个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是又互相补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页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做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

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我们所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现在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始。

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了已经充分发达的氏族制度。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两个①；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儿氏族，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母亲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联盟至少在个别场合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完全适应的。它无非是这些社会条件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权利和义务之间还没有任何差别；参加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

① “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猜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社会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4—155页

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页

1、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

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就产生了动物崇拜……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页

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

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0页

5、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反谷物法同盟）。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末，土地就同样地占有农民，手艺同样地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0—331页

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出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品的时候，私有制是不能发生的。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

的范畴。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21页

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页

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适应于眼界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的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的土地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来对付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的灾祸。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的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页

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的自发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

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物品。早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进行交换时，它就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愈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自己消费的部分愈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愈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的专制制度和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交相更替的统治，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发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1页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象动物一样贫乏，而且在生产上也未必比动物高明。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平等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

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新的机构来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社会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而使得建立这种机构的必要性增加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页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的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的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然形成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制已经让位给各个家族的小块土地耕作制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情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

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220页

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

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

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官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在操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间，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区，每个部落设十二个；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骑士。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页

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撒利法兰克人不仅完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全部较大的森林地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

兰克国王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以礼物或恩赐的方式分给他的扈从队。这种起初由他的私人扈从以及其余的下级军事首长组成的扈从队，不久就膨胀了起来，这不仅由于其中补入了罗马人即罗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了的人，而且由于，其中也补入了奴隶、农奴和被释放的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宫廷，他就从他们中间挑选自己的宠幸者。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后来就以采邑的方式赐给他们——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去世时为止。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8—149页

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导致暂时的分工。例如，在许多地方，都发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不可置疑的遗迹；在这种作坊中发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大概是靠全体和为全体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终身手艺人至今仍然如此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是一种例外的现象。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

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① 的时候，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当货币用了。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就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6页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7页

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

① 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既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旧的部落贵族不相符合，就把部落贵族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①，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3—164页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样了。面对着没有它的参与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

① 雅典奴隶的人数见前第117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编者注）。在科林斯城全盛时代，奴隶的人数达四十六万人，在埃伊纳达四十七万人；在这两个地方奴隶的人数都等于自由民的十倍。（恩格斯原注）

了起来，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间居住着。直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末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时常遭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可勉强进行。除了氏族团体有责任并且能够予以保证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生产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对立的。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但是，每一个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甚至还包括外地人在内；因此，这种机关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而在每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与氏族公社无关的居民，他们在国内已经可以成为一种力量，象罗马的情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被逐渐容纳到血缘亲属的氏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种闭关自守的享有特权的团体对抗着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产生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

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4—165页

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公社内部的直接分配。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的伴侣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象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171页

在第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第一种阶级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形式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家长制的或有时称为克兰制的（克兰就是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

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部落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碰到比较确定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4页

在原始社会里，在人们还生活在不大的氏族中、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即处于近乎野蛮状态的时候，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见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那时妇女还不象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看不到什么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的特殊**等级**的人……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4—45页

奴隶占有制度，从现代的条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反常的荒谬事情。然而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奴隶占有制度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34页

（二）奴 隶 社 会

1、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在那些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财富只要包含着对人的支配，它就主要地、几乎完全地**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自从猎取奴隶和剥削奴隶成为彼此分开的行业的最初

时期起，奴隶劳动的剥削者就不得不购买奴隶，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物的支配，对购买价格的支配，对奴隶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支配，才能获得对人的支配。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5页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过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最落后的民族中，现在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例如在非洲现时还可以找到奴隶制的设施。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页

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做奴隶主。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做奴隶。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46页

2、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

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产生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只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同外界往来（表现为战争或交易）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动产的私有制以及后来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民仅仅共同占有自己的那些做工的奴隶，因此就被公社所有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他们在奴隶面前不得不保存这种自发产生的联合形式。因此，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民权力，随着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落。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代表城市利益，另一些则代表乡村利益。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7页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

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尔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所决定的。在古代民族中，由于一个城市里同时居住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所有权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到地产。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的。——（奴隶制和共同体）（以罗马公民法为依据的占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69页

在古代，正象现代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一样，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2页

劳动① 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① 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① 一次而永远地卖给自己的主人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① 却不是**他的**商品。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所作的讲演写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5页

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象是**有偿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象是无偿的劳动。奴隶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得用来抵

① 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偿他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没有订立任何交易合同，由于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奴隶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无报酬的。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4页

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2页注17

奴隶主买一个劳动者就象买一匹马一样。他失去奴隶，就是失去一笔资本，必须再花一笔钱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才能得到补偿。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6页

在奴隶制度下，劳动者有一个资本价值，即他的购买价格。如果他被出租，承租人就首先要支付这个购买价格的利息，此外要补偿这个资本的年损耗。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28页

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

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在波斯战争时期，科林斯地方的奴隶数目达到四十六万，在埃伊纳地方达到四十七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十个奴隶，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0页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Latifundien），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场，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那里则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业，——一部分为了满足领主的奢侈生活，一部分为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却随着领主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5页

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

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页

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发达；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是铸造的货币，只是简单地按重量交换罢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160页

我们已经看到，在较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着多久就又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① 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

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1—432页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这时人们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这时，不知道畜牧业、也不知道农业的那种贫乏原始的狩猎经济，已经被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所代替；这时已经有可能在各个人之间和各部落之间交换产品，有可能把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生产资料确实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时已经有可能迫使大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并且把大多数人变为奴隶。这里社会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那种共同的自由的劳动没有了，占主要地位的是受不劳动的奴隶主剥削的奴隶的强迫劳动。因此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也没有了。代替它的是私有制。这里，奴隶主是第一个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者。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50页

---

① 在1884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劳动力”。——编者注

3、奴隶社会的国家是奴隶主镇压奴隶的工具

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骚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2页

奴隶主把奴隶当做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6页

只有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时，当奴隶制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奴隶维持最贫苦的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攫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有国家了。

于是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了一个使奴隶主握有权力、能够管理一切奴隶的机构。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但是终究有一个机构迫使奴隶始终处于奴隶地位，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受另一部人压迫。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一种经常的强制机构不可。当阶级没有的时候，这种机构也就没有。在阶级出现以后，随着阶级划分的加强和巩固，随时随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关

即国家产生出来。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独裁的政权，共和制是一切政权机关都由选举产生；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的政权，民主制是人民的政权（民主一词按希腊文直译，意思是人民的政权）。这些区别都是在奴隶制时代产生的。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8—49页

在任何古代史讲习班听讲这一课时，你们都会听到君主国家和共和国家互相斗争的情况，但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罗马法典把奴隶看成一种物品。关于杀人的法律是把奴隶除外的，更不用说其他保护人身的法律了。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唯有他们才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奴隶占有制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9页

在奴隶占有制国家内，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甚至有民主

共和制。管理形式确实极不相同，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9—50页

在奴隶制度下，“法律”允许奴隶主杀死奴隶。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只”允许农奴主出卖农奴。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2月19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493页

4、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

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特别的说明，因为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29日—7月4日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4页

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而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882年4月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9页

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虽然古希腊人的整个宇宙观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在他们那里已经包藏着后来分裂的种子。早在泰勒斯那里，灵魂就被看作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和肉体不同的东西（比如他认为磁石也有灵魂）；在阿那克西米尼那里，灵魂是空气（正象在《创世纪》中一样）；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已经是不死的和可移动的，肉体对它说来是纯粹偶然的。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又是“以太的碎片（ἀπόσπασμα αἰθέρος）”……，冷的以太是空气，密集的以太则形成海和水气。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8页

5、奴隶起义震撼和打击了奴隶制度

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就是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51页

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废除了。可是，这个革命用农奴主和农奴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奴隶主和奴隶占有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

替了。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2月19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493页

6、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奴隶制的崩溃

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征服民族此时是否已经象现代民族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它的生产力主要还只是以它的联合和现存的共同体形式为基础。其次，占领的性质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如果占领者不依从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和交往的条件，就完全无法占领当地银行家的体现于票据中的财产。……最后，无论什么地方，占领很快就面临结束之日，那时已经没有东西可供占领了，需要转向生产。从这种很快到来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这种形式到底受到生产力的多大程度的制约，这从查理大帝等企图建立以古罗马遗迹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失败尝试中已经得到证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81页

在多瑙河各公国，徭役劳动是同实物地租和其他农奴制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劳动是交纳给统治阶级的最主要的贡赋。凡是存在这种情形的地方，徭役劳动很少是由农奴制产生的，相反，农奴制倒多半是由徭役劳动产生的。罗马尼亚各州的情形就是这样。那里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但这种公社所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员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为储备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国家储备用于战争和宗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的公用开支。久而久之，军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产，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田上的劳动。自由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着发展起来，但这只是在事实上，还没有反映到法律上，直到后来，要解放全世界的俄罗斯才借口废除农奴制而把这种农奴制用法律固定下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5—266页

马尔克制度的崩溃，在民族大迁徙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法兰克的国王们，作为民族的代表，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辽阔土地，尤其是森林，占为己有，并把它们当作礼物，慷慨地赠送给他们的廷臣、将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就构成了后世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的基础。

恩格斯：《马尔克》（1882年9月中—12月上半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2页

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为

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了。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地是租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依附着土地，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被认为是自由人，他们不能和自由人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是象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做简单的同居(contubernium)。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5—146页

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结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赘的被释放的奴隶的数目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和贫困化的自由人（就象从前美国各蓄奴州的 poor whites〔白种贫民〕一样）的数目也日益增多。……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6—147页

自由的法兰克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

处境。他们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不得不去乞求新贵人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王的权力太弱了，已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象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经常变化的租佃形式——不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经过几代之后，他们大多数都变成了农奴。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0页

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象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象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发端，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较大规模的和较小规模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162页

帝政时期罗马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牧场的面积大大扩展，使乡村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则把地产划分成许多小块租地，租给

隶农耕种，也就是建立起了依附的小农——后来的农奴的先驱——的细小农户，确立了一种孕育着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萌芽的生产方式。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11月—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1—552页

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在罗马共和国衰落时期，当自由的意大利农民被剥夺了田地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同1861年以前南部各蓄奴州里的“白种贫民”相似的阶级；在奴隶和“白种贫民”①这两个同样无力解放自己的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古代世界崩溃了。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1887年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259页

奴隶制，在它是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即成为使自由民丧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了奴隶制的限制，迫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不管奴隶制是通过强制还是自愿地废除的，**以前的生产方式**还是**死亡了**；例如在美洲，移民者的小土地经济代替了大规模的种植园。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1876—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6页

① 在德文版中不是“白种贫民”，而是“贫穷的自由人”。——编者注

（三）封 建 社 会

1、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

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的入侵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作这样的转移。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而这个地盘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了，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古代世界的奴隶，而是小农奴。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也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这种封建结构同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样，是一种联合，其目的在于对付被统治的生产阶级；只是联合的形式和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因为出现了不同的生产条件。

在**城市**中和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结构相适应的是行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这里的财产主要是各个人的劳动。联合起来反对勾结在一起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共同市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

农奴的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这一切产生了行会；个别手工业者逐渐积蓄起来的少量资本及其与不断增长的人口比较起来是固定的人数，使得帮工和学徒制度发展起来了，而这种制度在城市里产生了一种和农村等级制相似的等级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29页

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繁荣时代，分工不大发达。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虽然等级结构表现的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了阻碍，与这种经营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在各手工行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手工行业之间的分工也是很少的。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比较新的城市中，只是在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日益显著。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页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

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8—309页

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

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1页注24

考察现代的地主经济制度，必须以农奴制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经济结构作为起点。当时的经济制度的实质，就在于农业这个单位的全部土地，即全部世袭领地，分为地主土地和农民土地；后者作为份地分给农民，农民（此外，还得到其他生产资料，如森林或者牲畜等等）用自己的劳动和农具耕种这块土地，从而养活自己。农民的这种劳动产品，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必要产品；其所以是必要的，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它提供生活资料，对于地主来说它提供劳动力；这正如补偿资本可变价值的产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必要产品一样。农民的剩余劳动，表现为他们用**自己的**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这种劳动的产品归地主占有。因此，这里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农民替地主耕种地主的土地，替自己耕种自己的份地；他们在一星期中有几天替地主干活，其余几天为自己干活。这样一来，在这种经济下农民的“份地”似乎就成了实物工资（用现代的概念来说），或者成了保证地主有劳动力的手段。农民在自己的份地上经营的“自己的”经济，是地主经济存在的条件，其目的不是“保证”农民有生活资料，而是“保证”地主有劳动力。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第157—158页

因为农奴主-地主数百年来的统治在国内**全部**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区的移民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

这种占有制极其混乱。它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它反映着数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政权无理干涉农民土地关系的历史。象强迫人进入犹太人区一样，它强迫农民参加具有纳税性质的中世纪式的小团体，参加共同占有份地的团体即村社。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0页

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自然也就是在整个俄国国家中和在俄国全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大地产占有者从经济上说是农奴主：他们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是农奴制历史造成的，是世家贵族数百年来掠夺土地的历史造成的。他们目前的经营方式的基础是工役制——劳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一种利用农民的农具，利用无数种奴役小农的形式，如冬季雇工制、年租制、对分制、工役租佃制以及利用债务、割地、森林、草地、池塘等等进行盘剥的经济。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8页

农奴制和资本主义都是剥削劳动的，**在这个意义上两种**制度都是“绞索和奴役”。但是农奴制的特点是：世世代代的停滞，劳动者的闭塞无知，劳动生产率很低。资本主义的特点则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者的闭塞状态被打破，劳动者进行团结和过自觉的生活的才能开始苏醒。

因此称资本主义为绞索和奴役，同时又**维护**（象民粹派那样）**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东西，那就是**在实际上**成为农奴制的残

余、野蛮和停滞的维护者。

列宁：《论左派民粹派》（发表于1914年5月14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97页

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存在，是农奴主权力的物质支柱和君主制借以复辟的保证。这种土地占有制必然使俄国绝大多数居民即农民贫困、受奴役、受折磨，必然使全国各方面的生活处于落后状态。

俄国农民土地占有制，无论是份地（村社的或个体农户的）或私有土地（租佃的和购买的），自下至上被旧的半农奴制的关系错综复杂地束缚着，农民还像农奴制时代那样分成各种等级，土地非常零散等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1917年4月）。《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7页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农奴，但是可以买卖农奴。除了封建所有制以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铁的冶炼和加工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机的推广，农业、种菜业、酿酒业和榨油业的继续发展，除手工业作坊以外工场手工业企业的出现，——这就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特征。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对劳动感兴趣。于是，封建主就抛弃奴隶，抛弃这种对劳动不感兴趣、完全没有主动性的工作者，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

私有制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50—651页

2、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他① 靠垄断土地进行掠夺。他利用人口的增长来进行掠夺，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强了竞争，从而抬高了他的土地的价值。他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和完全偶然地落到他手里的东西当做他个人利益的泉源以进行掠夺。他也靠**出租土地**、靠最终占有他的佃户的种种改良的成果进行掠夺。大地主们日益富有的秘密就在于此。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9页

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5页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全民族中大多数被剥削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或是属于一个帝国直属贵族，或是属于一个主教，或是属于一个寺院，或是属于一个城市，总之到处他都被当作一

① 指地主。——编者注

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农奴，那么他就完全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是一个依附农，那末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一天天加重。他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作；剩下来自己支配的有限几个钟头的劳动所得还得用来缴什一税，地租，杂捐，赋税〔Bede〕，远征税（战争税），本邦税，帝国税。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复盆子，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渔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望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象处理财产一样任意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推事等着一样，当日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没有被这些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7页

“民主的”波兰格密纳的命运是必然的：原来的土地所有权被国王和贵族等等所篡夺；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公社之间的宗法关系导致农奴制；随意分割土地造成一种**农民中间等级、即骑士等级**①，农民只有在侵略战争和殖民化继续下去的时候才有可能上

① 在波兰，那些能够为自己搞到一匹马并置办全套骑士装备的农民，被纳入骑兵中服役。服役之后，他们就上升为贵族阶层。——编者注

升到这个等级，但是，此二者又正是加速他们灭亡的条件。一旦达到这个界限，这个不能起真正中间等级作用的骑士等级，就会变为贵族的流氓无产阶级。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地罗曼语居民中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有同样的命运。这种发展是很有趣的，因为在这里可以说明农奴制是纯粹按经济的途径产生的，没有侵略和民族的政合国等中间环节。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10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78—79页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象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共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页

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奴隶

制度是劳动组织的支配形态，奴隶被迫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废除为止，情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现在，形态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1868年3月2日和13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2—273页

占有土地的贵族，这时成了农村中唯一的主人。邦君们恰巧在那时候取消了贵族在等级会议中的政治权利，因此使他们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农民。而农民最后的抵抗力，已经为战争所摧毁。这样，贵族就可以把全部土地关系安排得最有利于恢复他们已经破产的财政。不但把那已经抛弃的农民田宅，直接跟地主的庄园合并起来，而且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大规模地、有系统地驱逐农民。地主的田庄越大，农民的徭役劳动自然也越重。“无限制的徭役”时代又来到了。老爷可以任意命令农民、农民的家属、农民的耕畜出多少次工，干多长的时间。农奴制度现在成了普遍的制度。自由农民正如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老爷为了将农民的任何抵抗，即令是极微弱的抵抗，也能在萌芽状态中加以扑灭，他们从邦君那里取得了领主审判权，也就是说，他们被任命为审判农民任何小过失和小纠纷的唯一法官，甚至在农民和地主本人争讼的时候，也是一样。于是，地主就成了他自己案件的法官！从此以后，棍子和鞭子统治着农村。

恩格斯：《马尔克》（1882年9月中—12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6—367页

地租的最简单的形式，即**劳动地租**，——在这个场合，直接生产者以每周的一部分，用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的劳动工具（犁、牲口等等）来耕种实际上属于他所有的土地，并以每周的其他几天，无代价地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那末，事情还是十分清楚的，在这里，地租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在这里，无酬剩余劳动所借以表现的形式就是地租，不是利润。在这里，劳动者（自给自足的农奴）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一个超过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余额，即超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我们称之为工资的余额，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取决于他的劳动时间是按什么比例划分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地主的徭役劳动的时间。因此，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这个余额，这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现为利润的东西的萌芽，完全是由地租的多少决定的。在这里，地租不仅直接是无酬剩余劳动，并且也表现为无酬剩余劳动；这是替各种生产条件（在这里，它们和土地是一回事，如果说它们和土地有区别，也只是就它们作为土地的附属物而言）的“所有者”而进行的无酬剩余劳动。徭役劳动者的产品在这里必须在补偿他的生活资料之外，足够补偿他的各种劳动条件，这种情况对一切生产方式来说始终是一样的，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切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的结果，而是一切连续不断的和再生产的劳动的自然条件，也就是任何继续进行的生产的自然条件，这种生产同时总是再生产，因而也是它本身的作用条件的再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9—890页

关于劳动地租这个最简单的和最原始的地租形式，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在这里，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并且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但是，剩余价值和别人的无酬劳动的一致性在这

里不需要加以分析，因为这种一致性依然是以它的可以看出的明显的形式存在着，直接生产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他为地主的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还是分开的，他为地主的劳动直接出现在为另一个人进行的强制劳动的野蛮形式上。同样，土地会提供地租的“属性”，在这里，也归结为一种明显的公开的秘密，因为那种束缚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力，和那种迫使劳动力的所有者不得不超过满足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所必需的程度来加紧使用劳动力的所有权关系，也属于提供地租的本性。地租直接就是土地所有者对劳动力的这种超额耗费的占有；因为直接生产者在此以外没有支付给他任何地租。在这里，不仅剩余价值和地租是一致的，而且剩余价值还明显地具有剩余劳动的形式，地租的自然条件或界限也会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因为它们就是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条件和界限。直接生产者必须1．有足够的劳动力；2．他的劳动的自然条件，从而首先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自然条件，必须有足够的肥力，一句话，就是他的自然劳动生产率足以使他在满足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所必需的劳动之外，有可能从事剩余劳动。这种可能性不会创造地租。只有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强制，才创造地租。但这种可能性本身，是同主观和客观的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的。这里面也完全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893页

农村经济中另一种阻碍农民分化的重要现象，是徭役经济，也就是工役制的残余。工役制是建立在实物偿付劳动的基础上，因而也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不很发达的基础上。工役制的必要条件和它所要求的正是中等农民，他们既不十分富裕（否则他们不会忍受工役制的盘剥），但也不是无产者（采用工役制，就必须有

自己的农具，必须是个稍微有点“财产的”业主）。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第155页

这种经济制度叫作徭役经济。显然，这种经济制度的占优势是以下列必要条件为前提的。第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奴主的领地必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整体，同外界很少联系。地主为出卖而生产粮食（这种生产在农奴制后期特别发达），这是旧制度崩溃的先声。第二、在这种经济下直接生产者必须分有一般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同时他必须束缚在土地上，否则就不能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因而，攫取剩余产品的方法在徭役经济下和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是截然相反的：前者以生产者占有份地为基础，后者则以生产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基础。第三、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地主没有直接支配农民个人的权力，他就不可能强迫那些得到份地而自行经营的人来为他们做工。所以，正如马克思在阐述这种经济制度时所说的（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把这种经济制度划入劳役地租的范畴。«Das Kapital»，Ⅲ,2,324），必须实行“超经济的强制”。这种强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从农奴地位起，一直到农民有不完全的等级权利为止。最后，第四、技术的极端低劣和停滞是上述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后果，因为种地的都是些迫于贫困、处于人身依附地位和头脑愚昧的小农。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第158—161页

所谓工役制度就是用附近农民的农具来耕种土地，其偿付形式并不改变这一制度的实质（不管是计件雇佣制下的货币偿付，对分制下的实物偿付，或者是狭义工役制下的土地偿付）。这一

制度乃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徭役制的上述经济特点几乎完全适合于工役制度（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徭役制度的一个条件在工役制度的某种形式下已不存在了，例如：在计件雇佣时我们看到的劳动报酬已不是实物，而是货币）。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第162—163页

租佃在农民经济中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对于一部分人说来，是有利的扩大经营的手段，而对于另一部分人说来，则是在贫困的威胁下进行交易。现在我们看到，出租土地在地主经济中也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换取地租把土地租给其他人来耕种；有时候是自行经营的方法，是保证田庄有劳动力的方法。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第168页

农奴制经济或徭役制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就有一个相同的方面，这就是在两种经济制度下，劳动者只得到必要劳动的产品，而把剩余劳动的产品无偿地交给生产资料所有者。然而农奴制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农奴制经济是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货币经济。第二、农奴制经济的剥削手段是把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分给他们土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手段则是把劳动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奴制地主要得到收入（即剩余产品），就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占有份地、农具和牲畜的农民。没有地、没有马、没有家业的农民，是不宜于农奴主进行剥削的。资本家要得到收入（即利润），就必须有没有地、没有家业而不得不在劳动的自由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第三、领得份地的农民必然对地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因为

他既然占有土地，如不实行强制，他是不会去为地主干活的。于是这种经济制度就产生了“超经济的强制”、农奴制、法律上的依附关系、没有充分的权利等等。反之，“理想的”资本主义就是私有者和无产者有最充分的自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订合同。

列宁：《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1908年7月1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61—62页

每一个农民都知道地主是怎样压迫人民的。那末，地主的力量在哪里呢？

在土地。

地主拥有几千万俄亩土地。因此，数百万农户除了给地主当牛马外，别无出路。

只要地主还占有几千万俄亩土地，任何“自由”都不能对农民有所帮助。

列宁：《士兵和土地》（发表于1917年4月15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113页

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地主和农奴制农民。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并强迫他担任某种劳役。其实，大家知道，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6页

在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权利，根本不算是人；在农奴制社会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束缚在土地上，

由此就有农奴制这一概念。农民可以在地主给他的那一块土地上为自己工作一定的天数，而在其余的许多天内则替老爷工作。阶级社会的实质仍然存在：社会是靠阶级剥削来维持的。只有地主才能有充分的权利，农民是没有权利的。其实，农民的地位与奴隶占有制国家内奴隶的地位没有多大区别。但是通向农民解放的道路毕竟是比较广阔了，因为农奴制农民已不算是地主的直接私有物了。农奴制农民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工作，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了。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页

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是绝大多数人——农奴制农民完全依附于极少数人——占有土地的地主。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页

3、封建国家是地主镇压农民的工具

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无论对于土地贵族或城市说来，都是一种需要。因此领导统治阶级组织即贵族组织的到处都是君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页

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官吏和僧侣、士兵和女舞蹈家、教师和警察、希腊式的博物馆和哥特式的尖塔、王室费用和官阶表这一切童话般的存在物于胚胎时期就已安睡在一个

共同的种子——捐税之中了。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页

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页

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3页

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

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3页

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

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页

在中世纪，农奴制占优势。当时的国家形式也不一样，也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虽然后者显得弱得多），但始终只有农奴主-地主才算是统治者。农奴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页

地主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需要有一种机构来使大多数人受他们支配，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规，这些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加政权。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页

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

斯大林：《贺词》（发表于1947年9月7日）。1947年9月7日《消息报》第211号

4、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随着理智和意志对世界的统治，就出现了超自然主义、从虚无中进行创造以及一神论，还特别用“人的意识的统一性”来说明一神论。至于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无非那个神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联合着各种互相对抗的自然力，而这个君主在表面上或实际上联合着利益冲突、彼此敌对的人——关于这一切，费尔巴哈却认为没有谈论的必要。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5—66页

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在农民同农奴主地主进行斗争时，平等思想是争取土地的最强有力的思想动力，在小生产者之间建立平等就是最彻底地消灭所有一切农奴制的残余。因此，平等思想是农民运动中最革命的

思想，这不仅因为它是政治斗争的促进因素，而且因为它是从经济上清除农业中的农奴制残余的推动力。

列宁：《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发表于1907年4月5、7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341页

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5页

5、农民起义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

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

遭受农民战争的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了，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不是卖给外国，就是被熔化了，他们的储备物资都耗尽了。……

贵族也大受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很多最体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诸侯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能为力已是完全注定了；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意义而沦为诸侯

的臣属。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得到什么好处。……

在这些情形之下，归根结底从农民战争取得好处的只有**诸侯**。本文一开头即已谈到德国农工商业的发展很差，使德国人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区的中央集权化，因而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代表这种局部的中央集权势力的诸侯，形成了从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任何变动中都必能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79—480页

德国农民战争却预言式地提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舞台，他们手里拿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

农民不自觉地发动了起来，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忍不住了，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不声不响也不反抗就死掉。农民受尽了各种掠夺、压迫和折磨的痛苦，使他们连一分钟都不能不听信沙皇仁慈的谣言，不能不相信，凡是有头脑的人都承认，把粮食分给挨饿的人，分给一辈子替人家做工、播种和收割粮食而现在却要饿死在“老爷的”粮仓旁边的人是公道的。……沙皇政府象野兽那样的行为使农民看到，什么叫做国家政权，它替什么人服务，它保护什么人。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45—446页

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平分土地”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39页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在俄国也象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按自己的社会经济内容来说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它绝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占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是不会铲除资本主义的，恰恰相反，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只能造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支柱，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纯粹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将第一次展开。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表于1905年11月7日〔10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39页

这些群众——主要是农民——在革命中表明，他们极度憎恨旧的秩序，他们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制度的一切重担，他们自发地渴望从这些重担下解放出来并找到美好的生活。

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发表于1910年12月18日〔31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2页

农奴革命把农奴主消灭了，把农奴制的剥削形式废除了。可

是，这个革命用资本家和地主，用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农奴主和农奴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替了。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允许出卖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只”允许使劳动者失业和贫困，破产和饿死。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2月19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488—494页

6、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封建制度的崩溃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1页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8页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

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5—256页

资本的原始积累。包括劳动条件的集中。它是劳动条件对工人和劳动本身的独立化。它的历史活动就是资本产生的历史活动——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的分离过程**。这样就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它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出物质财富同劳动的分离和独立。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48页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

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0—221页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1页

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

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2页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9页

这种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历史过程。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0页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苏格兰地产的价值。英国工业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须把耕地变成牧场。要实行这种改变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居住。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7页

原始积累就是强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霸占村社土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

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93页

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6页

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从商品、商品交换、货币权力中间产生了资本权力。在十八世纪，更正确些说，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农奴制在西欧各国被排挤掉了。这一点在俄国发生得最晚。俄国在1861年也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同时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

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6页

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0页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

由于贸易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结果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资本产生于中世纪末期，当时世界贸易因发现美洲而得到极大的发展，贵金属的数量激增，金银成了交换工具，货币周转造成了巨量财富集中在一人手里的可能。全世界都认为金银是财富。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衰落下去，新阶级即资本代表者阶级的力量发展起来。结果社会被改造成这样：好象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以前那种分为奴隶主和奴隶的现象已经消灭；所有的人，不管他占有多少资本或占有多少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或者是只有一双做工的手的穷光蛋，都被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对大家都同样保护，对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都加以保护，使其不受那些没有财产的、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日益贫穷破产而变成无产者的群众的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

就是如此。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52页

由于交换和贸易关系有更大的发展，农奴制日益解体，农民解放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农奴制社会总是比奴隶占有制社会更复杂。农奴制社会有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巨大因素，这在当时就导致资本主义。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页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①。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产物在追求绝对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4页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1页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变成了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特点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

的自由发展，由于剥夺的地主土地落入农民手中，小农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序言》（1907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159页

徭役经济制度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崩溃了。这一制度的一切主要基础，如自然经济，地主领地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其各个部分的紧密联系以及地主对农民的统治等等，都已经被破坏了。农民经济脱离了地主经济；农民把自己的土地赎回，完全归自己所有，地主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正如刚才指出的，是建筑在截然相反的基础上的。当然，这种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的过渡，决不能一蹴而成，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尚未具备。需要有一个由惯于从事雇佣劳动的人们组成的阶级，需要用地主的农具代替农民的农具；需要把农业组织得象其他各种工商企业一样，而不是象老爷们的家务那样。所有这些条件只能逐渐形成，所以，某些地主在改革后初期向国外订购外国机器以至招收外国工人的尝试，也不可能不以完全破产而宣告结束。不能一下子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旧的徭役经济制度只不过遭到了破坏，但是还没有彻底消灭。农民经济还没有完全脱离地主经济，因为地主还掌握着绝大部分的农民份地："割地"、森林、草地、饮马场、牧场等等。农民没有这些土地（或地役权）就根本不能独立经营，结果，地主就可能通过工役制形式继续保持旧的经济制度。"超经济的强制"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着，例如，还有暂时义务农身分、连环保、体罚农民、派农民的公差等等存在。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第161—162页

如果“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末，现代资产阶级就应当不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起初，市民等级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统治的封建贵族缴纳贡税，它由各种各样的农奴和奴隶出身的人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贵族的不断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最后，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步地使贵族资产阶级化，并把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潢门面的上层。它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通过斗争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土地占有、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强大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3—204页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时，一部分人手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两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一方面他们出卖劳动力不受任何拘束或限制，另一方面他们脱离土地和脱离任何生产资料，这是无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工人“无产者”。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91—592页

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

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1页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3页

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

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

资产者在自己还没有爬上统治地位的时候则是革命的。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1847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2页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它在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内已经赢得了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

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页

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步伐整齐纪律严明的队伍去同资本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农奴

制农民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掀起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在全世界织组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5页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始终是**雇佣奴隶**制度，始终是极少数现代（《moderne》）奴隶主即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工农劳动者的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为这种奴役做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雇佣奴隶制。

列宁：《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7月20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3页

封建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奴隶经济制度优越，大约费去了二百年，也许略少些。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当时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而生产的技术又非常原始。

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封建经济制度优越，大约费去了一百年，或者不到一百年。还在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就已显示出它比封建经济制度优越，并且优越得多。这里时间长短的不同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有更快的发展速度，

有更发达的技术。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1—122页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1905年的俄国，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意味着前进一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从我们苏联现在的条件看来，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了一步。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34页

（四）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0页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9页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

就① 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② 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③，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④；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253页

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公社差不多所有消费品都是自己生产而几乎没有交换关系，并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流转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种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作为一个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

① “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编者注

② 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领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领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③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编者注

④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编者注

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而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1页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象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

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846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7—648页

凡是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场的地方，产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个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便夺取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权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会师傅的威风。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威力以后，也就摧毁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4—215页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

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纪起经过简单

① 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的书面著作。——编者注

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9页

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8页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

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页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用较大量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简单形态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的特殊形式。它至多不过在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手工业中，在那种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适应的、仅仅由于同时使用的工人数量和所积聚的生产资料的规模才和农民经济有本质区别的大农业中，近似地表现出来。简单协作在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始终是占统治的形式。

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一种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2页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者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2页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叶。

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方式产生的。

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

但是，工场手工业也以相反的方式产生。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这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每个这样的手工业者（可能带一两个帮工）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他仍然按照原有的手工业方式进行劳动。但是外部情况很快促使人们按照另一种方式来利用集中在同一个场所的工人和他们同时进行的劳动。例如，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大量完成的商品这种情况，就是如此。于是劳动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

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这种偶然的分工一再重复，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变成了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375页

在十七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创立（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是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的，例如，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税的保护下开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保护关税只不过是抵制竞争的治标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货币制度）、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

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67页

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列万特[1]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

但是机器发明了，而机器又引起了手工劳动的衰落。工业品价格的暴跌，首先引起了工场手工业的崩溃，然后又使最古老的封建的家庭工业也渐渐瓦解。

奥地利企图用彻底执行保护关税制度来躲避机器。但是枉费心机。保护关税制度恰好促使机器输入奥地利。波希米亚的棉纺

① 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编者注

织工业发展起来了，伦巴第的机器丝纺业发展起来了，在维也纳甚至开始出现了机器制造业。

后果也就接踵而来了。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断绝了生路。工场手工业地区的居民全被迫放弃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从过去的小市民中产生了大资产者，他们支配着千百个工人，就象他们的邻居公爵和伯爵们支配着千百个徭役农民一样。徭役农民，由于旧工业的瓦解就丧失了原有的副业，由于新工业的发展却出现了新的需求。封建的农业经营方法已经无法同现代工业并存。徭役已必须取消。农民和地主间的封建关系已不可能继续存在。城市相继兴起来了。行会已使消费者受到限制，对行会会员不利并使工业家无法忍受。必须逐步准许竞争了。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起了根本的变化。那些旧阶级已越来越让位于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工业比较起来农业的比重已经降低，农村已让位给城市。

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1848年1月25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19—520页

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9页

工场手工业时期很快就宣布减少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自觉的原则，因此也就间或使用机器，特别是在某些需要大量

人力、费力很大的简单的最初的过程。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6页

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循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因此，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6—377页

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前者使同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单在北明翰就生产出约5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

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8—379页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这条航道同东印度通商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这些被遣散的下属在未进入作坊之前都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十五、十六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场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

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杂费开支等等。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131页

产业革命到处都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愈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愈众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也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殖，所以无产阶级的增长是和资本的增长完全一致的。同时，产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就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来，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就把工资愈压愈低，把它降低到上述的那种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愈来愈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产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5—216页

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

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① 一切时代的地方。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正象马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须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一切社会形态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群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1868年3月2日和13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6—277页

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外的**无产者，——正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

① “过去”在1890年德文版中是：“其他”。——编者注

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去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7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数量上都没有变化，而且也不超出地主的世袭领地、农村或农村手艺人和小工业者(所谓手工业者)的小市集的界限。相反地，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需要"寻求国外市场"。

因此，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决不象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爱描述的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地表明了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7—188页

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摈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1918年3月7日)。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54页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①。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而劳动者或者分散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己经营的资料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过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商品生产的地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4—685页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状态来说，确实是从零散的小商品生产的制度和个人劳动所有制开始的（例如在英国）。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4页注

① 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译者注

商品经济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使另一部分人发财。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民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页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页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它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1页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页

2、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终将消逝的经济阶段，充满着各种内

在矛盾，这些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日趋明显。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9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67页

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

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页

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2页

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

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他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①。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0—311页

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

① 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或者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原注）

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象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铁矿产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定来“瓜分”这些市场。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的路线和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的轮船公司。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使生产

走到最全面的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自由竞争过渡到完全社会化的新的社会制度。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8页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这并不是说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工作（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是说随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减少，工业部门的数目增多；就是说，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例如在手工纺织时代，小生产者自己纺纱并用纺出的纱织布，于是工业部门也就为数不多（纺纱业和织布业融合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工业部门的数目就增加起来，纺纱和织布都单独进行：这个生产单独化和生产集中化过程使机器制造业、煤炭采掘业等等新部门相继出现。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门里，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巩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零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麻、纺麻、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俗话，即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后者又依赖棉田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每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就不

行。“人人为自己”的俗话显然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没有存在的余地，他既不能作为天空的幻影，也不能作为人间的“金犊”）。制度的性质已完全改变。在分散的小企业存在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只影响到社会少数成员，并不引起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十分专业化工业部门而几乎是为全社会工作并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特以社会化已达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末，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即只有当这个企业的商品具备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都由个别资本家经营，由他为所欲为，由他把社会产品攫为私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和占有形式处于不调和的矛盾之中，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1—42页

3、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残酷剥削

大家都知道，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就开始了厂主对工人阶级的前所未闻的、毫无限制的和肆无忌惮的剥削。新机器使成年男人的劳动成为多余的；看管机器所需要的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更适合这个工作，同时比男人的工资少。于是工业剥削立即殃及工人的整个家庭，把他们监禁在工厂里；妇女和儿童只要还没有累倒，就必须日以继夜地工作而不得休息。在日益需要儿童的情况下，习艺所里穷人的孩子就成了十足的交易对象。他们从四

岁起，甚至从三岁起，就成批地以签订学徒契约的形式卖给出价最高的厂主。从前对儿童和妇女进行了无耻的和残酷的剥削，这种剥削对自己的牺牲者是从不放松的，一直到吸尽他们最后一滴血，耗尽他们肌肉和血管的最后一点力气，才肯罢休；英国老一代的工人对于这种剥削至今还记忆犹新；许多人都还记得那弯曲的脊背或残废的四肢，都还记得健康坏得根本无法恢复的身体。

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76—277页

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3页

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hands），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

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5页

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5页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①，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4—265页

---

① 马利·奥日埃《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第265页〕（马克思原注第249）

②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马克思原注第250）

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2页

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5页

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4页

他①“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②，吸血鬼就决不罢休。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4—335页

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

① 指工人。——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马克思原注）

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

由于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剩余价值在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下怎样才能产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结构，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5页

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虽然正是这一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构成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

这种虚假的外观，就是雇佣劳动和其他历史形态的劳动不同的地方。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4页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页

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

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资本家的利润是这样来的：他可以出售他没有支付分文的某种东西。剩余价值或利润，恰恰就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或者说，就是商品包含的劳动总额超过它包含的有酬劳动额的余额。因此，不管剩余价值来自何处，它总是一个超过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0—51页

工人受剥削现象所环绕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来强迫工人生产出比构成劳动力的有酬价值多得多的东西。正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资本家及其奴仆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1页

工人所出卖的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暂时转让给资本家支配的他的**劳动力**。情况确实是这样，连法律也规定了——我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怎样，但至少大陆上的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允许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大期限**。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那就会使奴隶制立刻恢复起来。如果这种出卖包括一个

工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9页

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支付了这劳动力的价值，就象所有其他买主一样，获得了消费或使用他所买的这个商品的权利。迫使一个人去工作以消费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象开动一架机器以消费或使用这架机器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从而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内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它去工作的权利。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2页

既然他① 已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了资本家，于是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他所创造的全部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属于他的劳动力的暂时所有者。于是资本家预付3先令，结果却实现出6先令的价值，因为他预付的是6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而他取得的却是12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都预付3先令和每天取得6先令，这6先令中有一半又拿去支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资本家不付任何等价而白白获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为基础，同时这种交换必然经常使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使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专为资本家服务的**剩余时间**或**剩余劳动**之间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是依**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

① 指工人。——编者注

超过工人只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或补偿其工资所费的劳动**时间**为转移的。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3页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石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代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偿付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这个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在全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阶级及其所豢养的奴仆（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之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这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1页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含无偿劳动各个部分的不同名称**罢了，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一个泉源产生的**。它们不是由**土地**本身和**资本**本身产生出来的，但是土地和资本使其所有者可能从企业资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来说，究竟企业资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部占为己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给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假定说，一个企业资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资本，并且他本人又是其所需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场

合，剩余价值就要完全归他所有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企业资本家，不论最终他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企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这种关系上面。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7页

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1页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使**资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所做的讲演写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2页

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

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①），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②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③；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

---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9页）。——编者注

② 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5节和第9节。——编者注

③ 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8节b。——编者注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4—315页

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一方面有资本家，另一方面有雇佣工人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再生产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工人的穷困。因此，存在着这种情况：一方面经常存在着资本家，他们是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经常存在着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被迫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最多只能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养育出新的一代有劳动能力的无产者。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而已；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殖起来，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象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无产的工人阶级。“资本的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资本家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 **所以，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资本论》第1卷第600页②）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

① 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4节。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② 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1节。——编者注

军，在营业状况衰落或平常的时候，是在劳动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社会的财富越大……相对剩余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经常在业的）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或者说，其贫困与其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论》第1卷第631页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1868年3月2日和13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5—276页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

① 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4节。——编者注

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9页

私有制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有充分政治自由的最民主的共和国里，都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贫困的、雇佣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1919年9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1页

资本占有者、土地占有者、工厂占有者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支配着全部国民劳动，就是说，使全体劳动群众受其支配、压迫和剥削；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数是无产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靠出卖双手、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在农奴制时代分散的和受压迫的农民，在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一部分（大多数）变成无产者，一部分（少数）变成富裕农民，他们自己雇佣工人，成为农村资产阶级。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6页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保留着大土地占有者对附近小农所施行的中世纪式、半劳役式的剥削制残余，例如德国的租房农民（Instleute），法国的分成制

佃农（métayers），美国的分成制佃农（在美国南部，不仅黑人多半受这样的剥削，而且有时白种人也受这种剥削）。

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初）。《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85页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4页

现代资本家，也象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象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44页

机器和更完善的生产方式的采用，使人类进行这一斗争，特别是进行食物生产容易得多了。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

① 1790年，奴隶与自由民在英属西印度是10比1，在法属西印度是14比1，在荷属西印度是23比1。（亨利·布鲁姆《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1803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74页）（马克思原注第247）

人取得食物更加困难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抬高了地租和地价，使农业集中在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手中，使更多的机器、工具和货币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说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年6—9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89页

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不论是机器的改进①，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0页

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0—201页

只要还存在着**资本权力**，所有的东西——不仅是土地，甚至连人的劳动、人的个性，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

① 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

出卖的东西。

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1907年3月21—25日〔4月3—7日〕之间）。《列宁全集》第12卷第282页

资产阶级社会是完全靠千百万人的雇佣劳动生存、维持的。没有雇佣劳动，不论地主的收入，或者资本家的利润以及丰衣足食生活的“派生”财源例如稿费、薪水等等，都是不可能有的。而把千百万人赶到雇佣大军中去的那种力量，就是饥饿。

列宁：《一个发现》（发表于1913年2月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543页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产生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贷制度的整个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对农民的剥夺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破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态度。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19页

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反转来压迫工人，使小业主破产，造成失业大军。大生产在工业中能够取得胜利是十分明显的，在农业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日益占优势，使用机器的范围日益扩大，农民经济日益陷入货币资本的绞索，由于技术落后而日益衰败和破产。在农业方面，小生产的衰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衰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本打击着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造成了大

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物却归一小撮资本家所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也造成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4页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

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257页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

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象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6—317页

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2卷第136页

如果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相对的生产方式，它的限制不是绝对的，然而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则是绝对的。否则，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求呢；为了在国内能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必须到国外、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因为只是在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剩余产品才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只有在这种产品对他来说再转化为资本的时候，才能让这种产品由消费去支配。最后，如果说资本家只需

要在他们之间互相交换和消费商品，那末，这就忘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忘记了这里的问题是资本的增殖，而不是资本的消费。总之，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它们并不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因而也不是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

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象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

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首先是在人口中生产出了一个过大的部分，他们实际上不会劳动，他们由于自己的条件可以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来生活，或者靠这样一种劳动来生活，这种劳动只有在可鄙的生产方式下才能称为劳动。其次，要使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情况下劳动，就是说，要使他们的绝对劳动时间能够由于劳动时间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数量和效率而得到缩短，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还很不够。

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要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致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多了。

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

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6—287页

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2卷第135—136页

目前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就是说，商品的生产量超过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这就是说，纺织品、燃料、工厂制品和食品的生产量超过基本消费者即人民群众能用现钱购买的数量，因为人民群众的收入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所以资本家为保持高昂的价格就把“多余”商品如纺织品、粮食等等堆积在仓库里甚或销毁，同时缩减生产，解雇工人，于是人民群众就因为商品生产过多而不得不过贫困的生活。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09页

资本主义的稳定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增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危机的某种暂时的缓和，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下一次新的资本主义危机。不管这方面发生什么变化，新的危机总是避免不了的。

斯大林：《和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的谈话》（1925年10月14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95页

俄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内达到的巨大进展，保证工人运动将会毫不停顿地扩大和深入。显然现在我们正经历着资本主义周期的那样一个时期，这时，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

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那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底）。《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2页

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2页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制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的扩展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可怕的贫

困现象。不久以后，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6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的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7页

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于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07页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

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é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6页

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5页

现在，当美国、法国和德国开始打破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并由此象1847年以前那样又开始更迅速地出现生产过剩时，又产生了为期五年的中间危机。这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彻底衰竭。繁荣期再也达不到它的充分发展了；五年过后，便又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在这五年当中，整个说来，情况也是不大

妙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1884—1887年间，就不会再象1844—1847年间那样，工商业又有相当大的复苏。但是，在这之后，彻底破产必将到来。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3年5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6页

危机是随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每隔十二年、十年、八年或更短的时间就发生一次。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79页

生产过剩从来还没有象这次危机中这样普遍；它也十分明显地存在于殖民地商品和谷物方面。这是件大好事，它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当生产过剩只限于工业时，这只是问题的一半，而当它波及到农业，并且把热带和温带都包括在内的时候，事情就大了。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年1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21页

我们所谈到的两种危机理论，对危机的解释完全不同。第一种理论用生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由此可见，第一种理论认为现象的根源在生产之外（因而西斯蒙第总是攻击古典学派，说他们忽略消费，只研究生产）；第二种理论则认为生产条件正是现象的根源。简言之，第一种理论用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则用生产的混乱状态来解释危机。总之，这两种理论都用经济制度本身的

矛盾来解释危机，然而在指明这一矛盾时却分道扬镳了。试问，第二种理论是不是否认生产和消费矛盾的事实、消费不足的事实呢？当然不否认。它完全承认这种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放在应有的从属的地位，并且看做只是和资本主义总生产的一个部类有关的事实。它认为这种事实不能解释危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2卷第133页

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9页

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于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4页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

明显。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8页

在经济危机扩展的进程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危机和各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不但同时发生，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因而使困难加重，并且注定了经营积极性必然普遍低落。更不用说，工业危机将使农业危机更为严重，而农业危机又将使工业危机拖延下去，结果就不能不使整个经济危机深刻化。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6页

危机不仅笼罩了工业，而且也笼罩了整个农业。危机不仅在生产和商业范围内闹得很凶，而且也扩展到信用和货币流通范围，完全打乱了各国之间原有的信用关系和外汇关系。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07页

危机——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我们知道，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2页

所谓用卡特尔消除危机，这是拼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剧烈。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特点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

严重了。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1页

帝国主义没有而且**不能**自下而上地**改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复杂尖锐起来，使垄断和自由竞争“搅在一起”，而**不能消除**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

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这就是一般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

……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这种结合在造成崩溃，即造成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4—5月）。《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1—432页

现在的资本主义和从前的资本主义不同，它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注定了，尽管生产过剩，各种资本主义联合也必然要竭力设法保持商品的垄断高价。显然，这种情况使商品基本消费者人民群众因危机而特别痛苦，使他们遭到破产，因而不能不使危机拖延下去，不能不阻碍危机的消除。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6页

战争“将引起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们必须“利用”这种危机，利用的目的不是为了缓和危机，不是为了保卫祖国，相反地，而是为了“**激发**”群众，为了“加速资本统治的崩溃”。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发表于1916年1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1页

现在的工业危机为什么会空前持久呢？

首先，因为工业危机席卷了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使一些国家很难靠牺牲另一些国家来摆脱危机。

第二、因为工业危机和席卷了所有一切农业国和半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结果不能不使工业危机复杂和加深。

第三、因为农业危机在这期间加剧了，笼罩了所有一切农业部门（包括畜牧业在内），使农业退化，退到由机器改为手工劳动，退到用马匹代替拖拉机，退到大大减少人造肥料的使用，有时甚至完全不用，结果使工业危机更加持久。

第四、因为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的卡特尔竭力保持高昂的商品价格，结果使危机特别严重，使积存商品的销售受到阻碍。

最后，这是主要的，因为这次工业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爆发的。这时候，不论在各主要国家里，或者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在战前和十月革命前有过的那种力量和巩固性；这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承受了帝国主义战争遗留下来的企业经常开工不足的现象和千百万人的失业大军，再也无力摆脱它们。

这就是决定目前的工业危机十分持久的一些情况。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08—509页

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45页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于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6—457页

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

恩格斯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加的注（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页

请看资本家想怎样摆脱经济危机。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料价格。可是，他们不肯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这就是说，他们想靠牺牲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利益，牺牲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摆脱危机。资本家在拆自己的台脚。结果不是摆脱危机而是加深了危机，积累了引起更加剧烈的新危机的新前提。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4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396页

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末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2页

这种定期重演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创造了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要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是按照现今的原则经营，就只有依靠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才能维持生存，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将是一种威胁，它不但将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须消灭大工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是承认，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

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却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有害的动荡的因素。

因此，以下各点便得到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明：

（1） 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2） 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6—217页

二等富翁被头等富翁代替，资本力量增大，大批小私有者破产（如小额存款人随着银行的破产而丧失全部财产），工人阶级极端贫困化，——这就是危机所引起的后果。

列宁：《危机的教训》（发表于1901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75页

世界经济危机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各种矛盾的暴露和尖锐化。

（甲）**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争夺原料的斗争、争夺资本输出的斗争正在暴露并尖锐化。

……

（乙）**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正在暴露并将尖锐化。

……

（丙）**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正在暴露**并尖锐化。……

（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并尖锐化。……

这一切事实说明什么呢？

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

说明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

说明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为政治危机。

第一、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为此就利用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

第二、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

最后，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削剥、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7—223页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选择了战争的道路，那末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四年的危机和失业弄得痛苦不堪的工人阶级就会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是说，革命危机正在成熟并将日益成熟。资产阶级陷入自己的战争圈套愈深，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愈频繁，革命危机就成熟得愈快。

有些同志认为：既然有革命危机，资产阶级就必然会陷入没有出路的境地，因此，资产阶级的死亡已经预定，革命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他们只要等待资产阶级的灭亡和起草胜利的决议就

行了。这是很大的错误。革命的胜利从来不是自行到来的。它是需要准备和争取的。而能够准备和争取它的，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时候，形势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根本动摇了，而革命的胜利还是没有到来，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果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那就愚蠢了。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18页

5、资产阶级国家不管采用什么形式，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0页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由于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阶级**了，因此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一个地区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

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页

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的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也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对全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如此明目张胆的贿赂手段（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点）。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全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4页

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92年12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7页

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

改变全国的一切制度——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需要进行很多长期顽强的斗争。一切富人、一切私有主、整个**资产阶级**①，将用全副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官吏和军队将要起来保护整个**富人阶级**，因为政府本身就掌握在富人阶级手里。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00页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使德国富翁集团或英国富翁集团大

① 资产者就是私有主。资产阶级就是一切私有主合在一起。大资产者就是大私有主。小资产者就是小私有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就是私有主和工人、富人和穷人、靠别人劳动养活的人和替别人做工挣工钱的人。（列宁原注）

发其财，几千万人遭到屠杀，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中，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失败后，协约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1页

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1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3页

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强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利用来把国家政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

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1页

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3页

国家①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和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所指的也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19页

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觉到资本的权力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公开表现出来。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1页

资产阶级利用了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家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劳动者的工具。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就是这样。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页

---

① 指资本主义国家。——编者注

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各个政府的经验创造了**两种**压制人民的方法。第一种是使用暴力。尼古拉·罗曼诺夫一世（刑棍尼古拉）和尼古拉二世（暴君尼古拉）已把这种屠杀方法全部表演给俄国人民看了。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被受过多次大革命和群众革命运动“教训的”英法资产阶级修饰得非常精巧。这就是欺骗，恭维，说空话，无数的许诺，小恩小惠，小处让步，大处不放等等。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2页

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7页

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5—516页

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充满了冠冕堂皇的词句、动听的诺言和响亮的**自由平等**口号的民主，事实上，这种外表堂皇的民主掩饰着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掩盖着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不自由和不

平等。

列宁：《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发表于1919年11月6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1页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工人、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实际上在经济方面是不自由也不平等的。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2月11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54—355页

总的说来，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这一要求首先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最先提出了这个要求。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人到处都以主人的资格来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于温和的、规规矩矩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在和平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微妙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99—600页

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做“自由”。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0页

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5页

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按照有钱活命无钱上吊的原则办事的。

恩格斯：《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1848年8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63页

6、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垄断组织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时期：（1）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过广泛的发展，但是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3）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

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4—745页

目前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资本的数额十分巨大。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有时，极少数资本家就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就落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各种联合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手里。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从金融上、产权上，有的甚至从生产上，控制了整批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已经把最自由的共和国变成了金融君主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15—316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制有五种主要表现：（1）成立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生产集中达到了产生这种资本家垄断同盟的阶段；（2）大银行占垄断地位，三五个大银行支配着美法德三国的全部经济生活；（3）原料产地被托拉斯和金融寡头占据（金融资本是和银行资本溶合起来的垄断工业资本）；（4）国际卡特尔开始瓜分世界（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种国际卡特尔的数目已经在一百

个以上，它们占据了全部世界市场，并且“和睦地”进行瓜分（当战争还没有重新瓜分它以前）。资本输出这种特殊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5）从领土上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已经完毕。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83—884页

应该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08页

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2页

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今天这种技术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

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的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3—784页

资本输出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大大发展起来的。在大战前夜，三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一千七百五十亿至二千亿法郎。按百分之五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每年会有八十亿至一百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4—785页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

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17—818页

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派别。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20页

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了，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了。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42页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必须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43页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第一、这表现在腐朽

的趋势上，这种趋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切垄断所特有的现象。共和民主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君主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所以日益消失，正是因为两者都在活生生地腐烂着（这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个别工业部门，在个别国家或在个别时期内的惊人迅速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专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五十亿至八十亿法郎。第三、资本输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的表现。第四、“金融资本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贿赂收买风行一时，类似巴拿马案件层出不穷。第五、同兼并密切联系着的那种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民族身上的寄生虫。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84页

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84—885页

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

法。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95页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在从经济上分割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与此有联系的是，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在从领土上分割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96页

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10页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全面的反动，是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而引起的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28—829页

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统治趋势的结果，就是

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39页

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制度。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6页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由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各民族的最大压迫者。资本主义已由进步转为反动，它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类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要在许多年内、甚至在数十年内熬受各"大"国为勉强保存资本主义（通过侵占殖民地，实行垄断，建立特权，实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0页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4页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

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联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飞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的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惧、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2—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38—739页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1920年7月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7页

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这时候，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变成自己的对立物，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在经济方面，这一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物，但是我们看到，自由竞争开始变成垄断，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最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致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以及同这些垄断组织溶合起来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

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07—808页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40页

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来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同时，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1918年3月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80—481页

客观情况表明，战争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一般垄断已经发展为国家垄断。这一切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这样一来，战争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1917年4月）。《列宁全集》第24卷第211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消费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因

为绝大多数生产者都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同这些资料隔绝起来；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但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来求得平衡的恢复；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2—573页

象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活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必得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末，“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生存斗争的含义在这里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3—164页

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

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象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5页

7、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6页

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产物，正是这个革命近百年来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实现了整个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起初是在工业方面，后来是在农业方面；由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参与生产的只有两个阶级：拥有劳动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和既没有劳动工具、原料，也没有生活资料，而

必须首先用自己的劳动向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的工人阶级。因此，现代无产者仅仅同一个敌视他、剥削他的社会阶级——资本家阶级、资产者——直接发生关系。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1月底—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74—75页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①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4页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自觉的”。——编者注

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8页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织组；他们如果不愿意象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步，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开始领先，并且成了**全民的运动**。

恩格斯：《德国状况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三封信》（1846年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8—649页

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

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9—80页

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每个奴隶是**特定的**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们与主人的利害攸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一个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做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比奴隶为高。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一种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

能解放自己。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1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3页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发表于1913年3月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7页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专门阐明这一真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力量就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会社会的建设者，领导者，推动者；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够代替它的力量。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中，未必找得到一章不是阐明这个问题的。

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1919年3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3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3页

工人阶级抱有最崇高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把人类从各式各样的压迫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数十年来它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顽强地、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斗争，组织成百万人的政党，不为个别的失败和暂时的失利灰心。对这样真正的革命阶级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摆脱一切自我欺骗、一切海市蜃楼和错觉更重要的了。

列宁：《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发表于1905年1月4日〔1904年12月22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页

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改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9页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页

资本主义已使主要工业部门达到大机器工业的阶段；它从而使生产社会化，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工厂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和俄国全体劳动人民遭受着按经济实质说来是同样的资产阶级剥削，但它就

谋本身的解放来说却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已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旧社会没有丝毫联系；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并给它以走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可能。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6页

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彻底民主革命以及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意识到这个任务的无产者，是起来反对奴隶制的奴隶。没有意识到本阶级的领导权思想，或是背弃这个思想的无产者，则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至多也不过是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不是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的奴隶。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发表于1911年9月14日（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05页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出自善良的愿望，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会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9页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页

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它用英勇果敢的精神，用毫不留情的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打破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通向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完全对立的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92页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

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发表于1871年11—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

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页

无产阶级除了贫困以外，什么也不会失去，而得到的则是整个祖国，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6页

8、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象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8页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后，由于自己的处境而觉醒起来的工人，也会取得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进步；从这时起，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就不是单个工人，或者顶多几百几千个工人，而是他们全体、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利益和原则的**统一的**阶级，他们团结一致地按照总的计划行动，同自己最后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战斗。

这次战斗的结局是十分清楚的。象贵族阶级和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中等阶级的致命打击一样，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打倒。

私有制也要和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将使一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

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1847年6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69页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

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7页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一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归于消灭。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479页

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一向都找到过不少历史理由的废话，已经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页

我们描述经济关系，描述这些关系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5页

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页

资产阶级已经接近贵族在1789年所处的地位了：它不仅愈来愈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东西，而且成为社会的障碍；它日益脱离生产活动，象旧时的贵族一样，日益成为一个只会收取固定收入的阶级；它不用任何暴力的戏法，而以纯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它自己的地位的变革，并造成了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此外，它决不愿意它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产生这样的结果，相反地，这种结果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同它的意志和愿望背道而驰地实现了；它拥有的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它的领导，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或者推向变革。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4—205页

企业主阶级垄断一切取得和创造财富的手段，而雇佣工人阶级被迫〈首先〉为这些企业主的利润劳动，这种制度是压迫和奴役的制度。

这两个阶级的对抗〈导致〉表现在激烈的竞争中——在工人中间为受雇而竞争，在资本家中间为市场而竞争。这种情况〈引起阶级仇恨和阶级冲突〉使民族分裂而不利于它，使它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且破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幸福。

现今的制度使寄生虫安逸和奢侈，让工人劳动和贫困，并且使所有的人退化；这种制度按其实质来说是不公正的，是应该被消灭的。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场的任何扩大都吸收不了那种过多的产品，因此生活资料和福利资料的丰富本身成了工商业停滞、失业、从而千百万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既然如此，这种制度就是可以被消灭的。

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1887年6月14日和23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69—570页

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这一点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所以，象李嘉图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家，在这里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为它自己造成了一种限制，因此，他们不是把这种限制归咎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咎于自然（在地租学说中就是这样）。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

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0页

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统一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显著、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无论就每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来说，或者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崩溃来说都是如此。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页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

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却正是消灭这种

贫困和这些有害的动荡的因素。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

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象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①，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3页

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

① 在德文版中是："低级的社会形式"。——编者注

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8页

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废除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废除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他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权力之外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象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7页

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

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

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

《马克思致卡·卡菲埃罗（1879年7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58页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每天空前大量增长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终于造成一种定会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

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愈加荒谬和愈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

恩格斯：《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8—349页

他们[①]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向前发展，在马克思逝世后半世纪以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者注

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在智慧上和精神上推动这个转变、在体力上完成这个转变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它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99页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发表于1915年8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

大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而从生产力状况的观点来看，即按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来看，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它把先进的产业工人联合起来，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联合起来。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4页

第三编　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随着阶级的产生，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

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①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②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

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

① 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恩格斯原注）

② 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恩格斯原注）

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42页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

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

的。所以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111页

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作了很高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种时期，解决了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正是在这种时期，最有力地表现出了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建立了后来长期固定在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根基。同时，马克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认为这种时期不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不是“社会病态”的表现，不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7月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9页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页

从收入来源寻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把分配关

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果。这个错误马克思早已指出过，他把看不见这种错误的人称为庸俗的社会主义者。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占有这部分或那部分社会生产资料，把它们用于私人的经济，用于出卖产品的经济，——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同没有生产资料、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不同点。

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发表于1902年11月1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233页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43页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

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发表于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60页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一）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斗争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1894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现在还不能认真地谈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根据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认识到某种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团结精神。前一种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后一种学说是唯心主义的。前一种学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学说是改良主义的。前一种学说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后一种学说则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

列宁：《再论杜马内阁》（发表于1906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我们从来不曾，而且现在也并不指望靠“说服”有产者当局或者靠有教养的人转到“善人”方面来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我们一向，而且现在也总是教导说，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

列宁：《〈警察司长洛普兴的报告书〉序言》（1905年2—3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176页

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在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度崩溃时随之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日益明显地表明了**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退了拚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

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5—446页

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现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设立代议机关、实行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创办深入群众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联合会等等出现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宪政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7—588页

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①，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了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象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

① 指唯物史观。——编者注

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193页

革命日益显露出农民在现在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劳役制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者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列一些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他们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沿。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序言》（1907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7—158页

（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6页

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0页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

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恩格斯：《论权威》（1872年10月—187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象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那末，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末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末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1872年1月14(—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9页

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0页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

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0—501页

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关心不让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又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问题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6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1页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

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列宁：《革命的教训》（1917年7月底）。《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5页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9页

我们再概括起来说一遍：人民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还有农民的组织上的创造性，在革命旋风时期要比在所谓的平安宁静的（牛车似的）历史进步时期强烈、丰富、有效千百万倍。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30页

革命无疑是那样迅速、那样彻底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代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1页

革命将第一次给各个阶级以真正的政治洗礼。这些阶级将以一定的政治面貌在革命中出现，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自己。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2页

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众，并且以不可抑制的力量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纲领方面来，因为这是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的唯一纲领。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8页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那我们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按照一般规律——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总起来说就叫做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和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有过；而这种形势在德国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在俄国1859—1861年、1879—1880年也曾有过，虽然那时并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

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

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观点就是这样，这种观点已屡次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而且被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了，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已经特别明显地为1905年的经验所证明了。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0—621页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卷入政治运动（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那些到现在还非常消沉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迅速产生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9页

单凭压迫这一点，不管它有多么严重，也未必能够造成国内的革命形势。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社会不愿意**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社会**

不能象先前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

列宁：《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示威游行》（发表于1913年6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13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三）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简化和集中旧社会的凶猛的垂

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

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1848年11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8页

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

马克思：《艾希曼的命令》（1848年1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8页

一种暴力行动只能用另一种暴力行动来铲除。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发表于1849年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87页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

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

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这两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由强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强力，积极使用这种

强力，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23页

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的条件下，在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握有武器和政权机关的暴徒，就不能把人民从暴徒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5页

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是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用来反对剥削者的暴力，那末我们是拥护这种暴力的！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0页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暴力将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时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二者相互交织着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各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的整个时代。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1918年3月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79页

无产阶级认为暴力是正当的、合法的，并且用忍受最大牺牲

的事实证明了采用这种暴力是正确的。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3月2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2页

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90年3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62—363页

机会主义总是反对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使用任何暴力，而我们则始终主张在群众性的斗争以及与此有关的斗争中使用暴力。

列宁：《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6年11月4日）。《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2页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还一般地反对对人使用暴力。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70页

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36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旧制

度进行根本的改造呢？

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25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129页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外，没有人会武断地说：不遭到抵抗，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用铁腕来对付旧世界，就可以获得胜利。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发言》（1917年12月14日〔27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3页

（四）阶级斗争的加剧，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化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

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象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6页

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当法国

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在许多无产者面前由此出现了升到无产阶级之上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比起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要更加坚决、更加激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54页

（五）剥削阶级不会对被剥削阶级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

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君主们不遭到外界的强大压力而限制自己的特权和向人民的要求让步的例子，同样，也没有君主们每当可以不受制裁地违背自己的誓约和诺言的时候而仍然信守前言的例子。

马克思：《普鲁士备战》（1860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05页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而告终了，而且暂

时还使压迫倍增。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78页

经过了艰苦的斗争，农民遭受了失败。从那时起，在日耳曼农民中间，农奴制度重新又取得了普遍的优势。在爆发战争的地方，一切还保留着的农民权利，现在都遭到了无耻的践踏，他们的公有地变成了地主的土地，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农奴。

恩格斯：《马尔克》（1882年9月中—12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5页

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页

在暴君尼古拉① 的“立宪”诏书发表以后，接着便发生了特列波夫② 和他那一群匪徒所策划的无数次新的谋杀事件。哥萨克的猖獗，对犹太人的蹂躏，在大街上枪杀刚刚“被大赦的”政治犯，黑帮在警察的帮助下进行抢劫——为了镇压革命斗争，一切手段都使用出来了。

沙皇帮了革命者一个大忙，他证实了革命者认为“自由主义的”诏书是假让步、是丑恶的滑稽剧的评价。

列宁：《最新的消息》（1905年11月4日（10月22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423页

① 指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905年10月17日曾发布“立宪”诏书，口头上答应颁布宪法，给人民自由，实际上是欺骗群众，准备新的进攻。——编者注

② 特列波夫，彼得堡省总督，镇压俄国1905年革命的刽子手。——编者注

政府[1]的退却，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是表明政府选择了新的自己认为更加合适的战斗阵地罢了。以所谓10月17日诏书这种一纸空文来宣布“自由”，只是企图准备精神条件来同革命作斗争，——与此同时，特列波夫统率着全俄黑帮党徒在为这个斗争准备物质条件。

……政府口头上作了让步而立刻开始在实际上准备进攻。在允诺颁布宪法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最野蛮最丑恶的暴行，好象故意要在人民面前更明显地表示专制政府的真实权力的全部真实意义。许诺、空话、一纸空文同实际情形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比地明显了。事变开始雄辩地证明我们早就肯定地说过而且将来一直都要对读者肯定地说的那个真理：当沙皇政府的实际权力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它的一切让步，甚至直到“立宪”会议，都只是一种幻象、泡影、障眼法罢了。

列宁：《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发表于1905年11月16日〔3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435—436页

仅仅破坏或限制沙皇政权还不够，必须把它**消灭**。沙皇政权如不消灭，沙皇的让步总是不可靠的。沙皇在革命进攻加强时就作些让步，进攻减弱时就把这些让步统统收回了。只有争得民主共和国，推翻沙皇政权，使政权归人民，才能使俄国摆脱官吏的暴力和专断，摆脱黑帮-十月党人杜马，摆脱农村中地主及其走狗的专横势力。现在革命后农民和工人所遭到的灾难比先前更加深重，就是当时革命的力量还弱，而沙皇政权没有被推翻的结果。

列宁：《革命的教训》（发表于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7页

---

① 指沙皇俄国政府。——编者注

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来看，不能不认为这个变化是一大进步。起初，社会主义是为生存而斗争，当时，反对它的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大胆地和坚决地维护自由主义这一套经济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后来，社会主义成长了，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生存的权利，它现在是**为争取政权**而斗争了；而资产阶级日益腐朽，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于是就竭力用不彻底的虚伪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发表于1911年9月14日〔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03页

他们[①]只是向后退，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页

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不能把任何改良叫作革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这样地实现，即用改良的方法，用统治阶级让步的方法，使一种社会制度悄悄地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参见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2—23页

① 指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分子。——编者注

（六）反动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愿意自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除了君主本人有偏见以外，还有大批的文职、军职和神职官僚束缚住他们的双手，因为君主专制的这一组成部分是绝对不愿意拿自己的统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另一方面，封建等级又极端保守；对他们来说这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财产的保留或者被剥夺的问题。尽管资产阶级以一切忠心耿耿的誓言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专制的君主依然认定他的真正利益同这些等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6—187页

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在名义上它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同时在它尚未宣告死亡和宣读遗嘱的时候，继承者们就为遗产而争吵了起来。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

马克思：《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1855年6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63页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

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

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1907年3月21—25日〔4月3—7日〕之间）。《列宁全集》第12卷第261页

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40页

全部世界史、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一切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拚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2—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43页

糟糕的社会主义者总以为资本家会立刻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不会的。世界上还没有这样善良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

列宁：《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18年12月14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340—341页

统治阶级决不会将自己的权力交给被压迫阶级。但是被压迫阶级应当在事实上证明它不仅能够推翻剥削者，而且能够组织起来进行自卫，不怕一切牺牲。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页

人在生理上是要自然“死亡”的，但是思想政治流派不会这样死亡。正象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受资产阶级培养和扶植的、代表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的利益的那个流派，在没有被“消灭”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

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发表于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4页

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恰恰相反，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全会》（1928年7月4—12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0页

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所以暂时还能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他们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城乡小资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每日每时都从自己中间分泌出大小资本家来，而这些资本主义分子会采取一切办法来卫护自己的生存。

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273页

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这个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已经衰亡的阶级不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请你回忆一下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说过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了吗？然而难道不需要克伦威尔用暴力去粉碎旧制度吗？

……

再从我国历史中举几个例子吧。难道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不是知道沙皇制度在腐朽，在崩溃吗？然而为了推翻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啊！

而十月革命呢？难道知道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指出了唯一正确出路的人还少吗？难道人们不懂得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吗？但是你知道，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我们进行了多么大的抵抗，我们流了多少血啊！

或者再看一看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在1789年以前很久，许多人就已经知道，国王的政权和农奴制度是腐朽到极点了。但是没有人民起义，没有阶级冲突，就没有办法而且也不可能有办法。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最后一个相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要他们相信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坏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的阶级拿起武器，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

……

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共产党人掌握了这个历史经验。共产党人是会欢迎资产阶级自愿地退出舞台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不会投降而应当加以击溃的统帅呢？作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参见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6—18页

（七）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①]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274页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复辟时期的活动家们并不讳言，如要回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就应当恢复美好的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

① 这里所指的不是1660—1689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1814—1830年法国的复辟时期。（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

万一他们[①]得逞，不管他们的复辟采取什么名目，不管哪个侥幸成功的谋位者成为首脑，复辟实际上只能恢复帝国，即恢复这些腐朽阶级的统治的最后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如果他们恢复了帝国，——一旦他们的任何一个复辟计划成功，他们势必要恢复帝国，——他们只会加速他们所代表的旧社会的腐朽，加速他们所反抗的新社会的成熟。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50页

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的一贯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还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17—718页

在革命战胜反革命以后，反革命并不会消失，相反地，还必然会更加不顾死活地进行新的斗争。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33页

① 指梯也尔代表的法国反动统治阶级。——编者注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40页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事情就告终结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因为资产阶级直到今天还不相信它已被推翻……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6页

我们深深知道，资产阶级至今还占有优势，他们在其他国家内还有自己的财产，有时甚至在国内还握有大量金钱。我们清楚地知道，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放弃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

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1919年3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4页

我们必须记住，资产阶级正在竭力煽动农民反对工人，竭力利用工人的口号发动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来反对工人，这一切将直接引向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恢复资本主

义，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旧政权。这种政治危险性现在是存在的。许多革命都很明显地走过这条道路，我们也经常指出这条道路。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4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昨天，我们曾遇到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危险，其表现就是科尔尼洛夫之流、郭茨之流、都托夫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鲍加也夫斯基之流的行动。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个复辟，同样是这个复辟的危险，又表现为别种形式，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应该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会战胜它的。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24页

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有巨大优势，由于战争、破坏、流行病、灾荒必然使人民极端贫困痛苦，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中就表现出特别严重的动摇情绪。这种动摇表现在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而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历次革命的全部经

验都十分清楚地和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力量和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只能是促成资本家地主的政权和私有制的复辟（恢复）。

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1921年3月8—1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84—485页

要知道，如果资本家占了我们的上风，那就意味着恢复老样子。这一点是以往一切革命的经验所证实了的。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个斗争的实质，必须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这个斗争的实质："谁占胜谁？谁取得胜利？"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48页

工农政权在各方面开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它的任务不仅是彻底扫除地主和资本家，——这件事情我们几乎已经办到了，——而且要建立一个无论地主或资本家都不能重新产生的社会。在革命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被扫除了，但在很短时间内，从富农、富裕农民和投机者当中又产生了新的资本家，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而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扫除旧的资本家，而且要使新的资本家不能产生，使政权完全地、整个地、绝对地掌握在劳动的人，靠劳动为生的人的手里。

列宁：《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1919年3月1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20—21页

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

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

列宁：《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 6—8 日〔19—2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1—152页

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90—391页

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同反动派妥协。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1906年5月）。《列宁全集》第10卷第307页

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4页

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防卫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的企图，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世界的侵犯。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参见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页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们，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并使农民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这些老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

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说，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6页）。

很明显，既然小生产在我国很普遍，甚至占优势，既然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经常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末我国就有使资本主义恢复成为可能的条件。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1928年10月19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236页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69页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谁认为有这样的革命，谁就不仅不是革命者，而且是工人阶级的死敌。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4月17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页

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当我们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了政权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感到惋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坚决彻底。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95页

（八）批判阶级调和论和唯生产力论

1、批判阶级调和论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1869年3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3页

认为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废话，归结起来无非是主张劳资利益调和的滥调。如果资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会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所，并且一般说来也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如果工人认识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不会举行罢工，不会醉心于社会民主运动，不会参与政治，而会俯首贴耳地听从自己的上司资本家。真可惜，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完全不在扎克斯先生及其无数前辈所宣传的那一点上。劳资调和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传了五十年，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试图设立模范机关来证明这种调和也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

这五十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97—498页

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0页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年7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7页

这班冒充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小市民思想家的理论简直是反动的了。他们抹杀现代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硬说可以用一般的、指望依靠一切人的关于“振兴”“改良”等等的措施来办妥事情，硬说可以调解和联合。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家描绘成一种站在阶级之上从而适宜于并能够给被剥削群众以某种重大的和真诚的帮助的东西。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6页

资产阶级（民粹派总是盲目地跟着它跑）的利益要求农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混淆不清。

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反对这种混淆不清，要求处处（包括在

农民中）划清阶级界限。

列宁：《农民和雇佣劳动》（发表于1914年2月20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2—103页

毫无疑问，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维护阶级合作，背弃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革命斗争方法，迎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忘记民族或祖国历史上暂时的边界，把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成偶象，由于害怕自己脱离“广大群众”（应读作：小资产阶级）而放弃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发表于1914年11月1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页

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8—649页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本国”政府渡过难关，而不利用它的困难进行革命。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8—679页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也是一样的，都是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法制，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发表于1916年1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4页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就厌恶阶级斗争，幻想逃避这种斗争，力图缓和、调和和钝化这种斗争。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法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85页

2、批判唯生产力论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但是第一、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近似东方正在开始和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象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的时候，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那又怎样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

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1页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41页

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2页注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

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42页

雅罗申柯同志在把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个正确思想拿过来以后，却把这个思想弄到了荒谬的地步，竟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作用；而且，本来是有血有肉的社会生产，在他那里却成了片面的和干瘪的生产工艺学，即布哈林的“社会组织技术”之类的东西了。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51页

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

（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地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335页

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各个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并一定程度脱离社会的“权力”，它便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

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控制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控制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建立联系，直接或间接收买官吏和报刊等等）。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0—601页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 175 页

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即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不仅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往往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的特殊等级。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

的。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页

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据现代最新技术造成的二十世纪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可以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暴力机构、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手中。我们详细地观察了这种共同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产生于阶级出现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于国家的实质及其意义的问题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当社会上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当人们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在较为平等的原始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时候，当原始人很难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最简陋的原始生活的时候，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专门分化出来实行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殊集团。只有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时，当奴隶制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奴隶维持最贫苦

的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攫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有国家了。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7—48页

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约束多数被剥削者。国家政权的工具，主要集中于军队、惩罚机关、侦察机关和监狱。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内部的（主要的）职能是约束多数被剥削者；外部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从前的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就是这样。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是这样。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703—704页

（二）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

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

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

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4—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2 页

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1年 2 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1 页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76 页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90 页

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 9 月底—10月 1 日〔14日〕）。《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321 页

一切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都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的机器，这种压迫所以必需，是因为地主和资本家、整个资产阶级及其一切走狗、一切剥削者在被推翻被剥夺时，总要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拚命进行反抗。

列宁：《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 1 月21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9页

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使用暴力，而全部区别就在于：这种暴力是用来反对被剥削者还是反对剥削者。这种暴力是不是用来反对劳动者和被剥削者阶级的。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1921年 5 月26—28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9—410页

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

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4页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8页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必须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是**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6—637页

（三）国家的主要成分是军队

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可

能不是这样吗？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78 页

大家知道，现在，这种暴力机构就是武装部队、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列宁：《论国家》（1919年 7 月11日）。《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45页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当作警察来使用，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所以十八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nations policées）①。这样，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兵队，或者如德国南部和瑞士所说的 Landjäger ②。不过，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事。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3 月底—5 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14—115 页

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括在居民以内；九万雅典公民，对于三十六万五千奴隶来说，只是

① 文字游戏：《policé》——“文明的”，《police》——“警察”。——编者注
② 方言，意即宪兵。——编者注

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页

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制止过去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的复活。在无法做到这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要听从国家政权机关的调动，而要听从由工人所建立的革命的市议会调动。凡是工人在国家企业中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是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8页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

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4—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4 页

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6 页

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都同样是以现行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现代统治阶级当然要用它拥有的全部工具（其中之一就是现代国家机器）来维护和支持现行的劳动组织。因此，要废除现行的劳动组织，并用新的组织来代替它，就需要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不仅用于抵抗而且用于进攻的力量；但是要取得这样的力量，就需要组成一支拥有足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力量以同敌军进行斗争的军队。

马克思：《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1854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 126 页

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724 页

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从军事上领导人民群众对付专制

制度军事力量的残余所必需的。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发表于1905年7月10日〔6月2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28页

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在各个地方，常备军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成了资本反对劳动的斗争的奴仆，成了扼杀人民自由的刽子手。

列宁：《军队和革命》（1905年11月15日〔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4页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在二十世纪（以及在整个文明时代），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把“废除武装”列到纲领中去，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反对使用武器。这也和我们说我们反对使用暴力一样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列宁：《论“废除武装”的口号》（1916年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93页

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伪善的奴仆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的奴仆和警察的帮凶。

列宁：《军队和革命》（1905年11月15日〔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3页

没有一个大革命是不“瓦解”军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顽固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顺从

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同时并存。恩格斯说过，法国在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了的："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① 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②。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纯粹是胆小的市侩对此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在艰苦的内战中逐渐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和巩固这种统治地位。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69页

对于为什么要有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使自己同社会脱离的特殊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同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比较起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6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编者注

来，只是在复杂的程度上、技术的高明上有所不同，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成为不可能，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那在它们之间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78 页

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向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

此外，这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 3 月21—2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3 页

到现在为止，一切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队，不管它们的成分怎样，都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军队。这种军队过去是现在还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军队。各国资产者都在撒谎，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这是不正确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军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这是事实。然而这绝对不是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恰恰相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军队过去和现在都

被卷入政治斗争，充当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

斯大林：《论红军的三个特点》（1928年2月25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页

（四）国家对社会发展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5页

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

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走某个国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例如摩尔西班牙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223页

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来说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各该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转变，要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解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独立使用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为前提，他们可以和厂

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最后，所有的人的劳动——因为它们都是**人的**劳动并且只就这一点而言——的平等和同等效用，不自觉地但最强烈地表现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根据这一规律，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但是，当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时，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4—145页

大家知道，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展，那末上述的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如果在国家制度显然带有资本主义以前性质的国家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末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区域脱离整体的可能也就愈大，因为连结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5页

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

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五）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列宁：《论两个政权》（发表于1917年4月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9页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21—26日〕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发表于1913年5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4页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页

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发表于1917年9月27日（14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

人民**根据经验**确信，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没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的，那末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事变的客观进程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不是这样或那样地来修订法律和宪法的问题，而是**政权**问题，实际的权力问题。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

的机关都等于零。

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7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98页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毫无例外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5页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这是不是说，事情只限于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取得政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许多原因，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30页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29页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

斯大林：《两条路线》（发表于1917年9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82页

（六）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驾于社会之

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176—177页

无产阶级做到这一点，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构，而是彻底摧毁它、粉碎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泣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机构。这个新的国家机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构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向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中成长起来的。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27 页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4—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34 页

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 4 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92 页

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

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4—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11 页

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4—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12 页

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 1872 年对《共产党宣言》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627—628页

马克思正是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69页

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行政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0页

作为资本家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都默不做声。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07页

6～54

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自下而上地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破坏议会的、司法的、军事的、官僚的、行政的、市政的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拘禁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粉碎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役的尝试，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保证真正使整个剥削阶级屈服。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4页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

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12页

“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简要地表明了。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流行的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完全忘记了，而且被它公然歪曲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2页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4页

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91—192页

① 见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

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经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有通过彻底粉碎议会制和官僚制度的新型国家。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4页

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219页

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打碎它的旧军队，打碎它的官僚机关，打碎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 3 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704页

（七）法律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它具有影响经济基础的特殊能力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

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象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基础中，例如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接触到的关系很简单，那末公平的、不公平的、公平感、法权感这一类名词甚至应用于社会现象也不致引起什么大误会，可是在关于经济关系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名词便引起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象在现代化学中企图保留燃素论的术语会引起的混乱一样。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40页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 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象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法律，实质上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这种保存法制基础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使那些现在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私人利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其目的在于强迫社会接受那些已被这一社会的生活条件、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交换以及物质生产本身宣判无效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使那些专门维护私人利益的立法者继续掌握政权；其结果会导致滥用国家权力去强迫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

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做法时刻与现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

马克思：《在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发表于1849年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1—292页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就象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象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个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象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

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249页

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这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1869年8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4页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9页

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这些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将使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拥护所有权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1872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1—452页

消灭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

级制度。随着贵族特权的废除，立法也资产阶级化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3页

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两者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描述，并要求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以便作出这种描述。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

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484页

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页

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

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1842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①。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1872年 3—4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1页

在法国，革命②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差不多完满地表现了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英国的法律仍然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之符合于它所表达的事物，正象英文的拼法符合于英文的读音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你们写下伦敦，而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也只有这个英国法律把大陆上那些在君主专制时期已经丧失而到现在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完全恢复起来的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即古代日耳曼自由中的精华部分，保存了几个世

① 草稿中不是“稳定性”，而是“承认”。——编者注

② 指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编者注

纪，并且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5—396页

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律根据。在这不久以前发生的过程中，奴颜婢膝的法学家阶级为贵族卖了多大力气，这从上世纪一位英国法学家达尔林普尔那儿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著作《封建所有制》中以极其坦率的态度证明：在为所有权进行的诉讼中，在资产阶级大发横财时期的英国，法学家对于有关财产的每一条法律和每一份文件就作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在贵族阶级发财致富的苏格兰，则作有利于**贵族阶级**的解释，而在两种场合下，都充满着敌视**人民**的精神。

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1853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75页

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一百五十年而毫无效果。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法。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

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0页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9—240页

这全部胡说① 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支配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所产生的实际后果侮辱了作者的法权感，而作者却虔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改变，灾祸能够消除。——是啊，癞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权观念”，即自己有剥削工人的特权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向我们声明这不是他的法权观念，难道我们就会前进一步吗？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6页

① 指在德国莱比锡出版的《人民国家报》1872年2—3月连载的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由蒲鲁东分子写的。——编者注

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4页

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統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8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146页

（八）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7页

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322页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

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8页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8页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

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

《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页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6—207页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

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88页

“高级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要到这样的时候，即：（1）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了；（2）**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注意：劳动的习惯成了常规，不用强制!!）；（3）生产力高度地发展了，等等。显然，只有在这个高级阶段，国家才能**完全**消亡。注意这一点。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1917年1—2月）。1964年版第33页

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自己来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只有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一部分人挨饿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6—57页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

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1—242页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为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9页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3页

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

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3—254页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7页

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计算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

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象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于是，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9页

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根本消亡的唯一道路。

列宁：《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13页

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1月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473页

（九）批判超阶级的国家观

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

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了他们那种琐碎的修正案，就会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自他们从事立法事业之初，他们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军队以及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这个可敬的议会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8页

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5页

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说法)。这些先生们放过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愚不可及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你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你们实际上的失败。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84年2月中—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2页

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

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1849年1月25—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5页

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72页

这个论据① 运用“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倒向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种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

① 指机会主义分子为了替剥削者辩护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据。——编者注

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17页

我们的这位庸人①“同意”说：工人们，斗争吧（这是资产者也“同意”的，既然工人反正都要斗争，那就只好设法挫折他们的剑锋了），——斗争吧，但是**不得胜利**！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谁真正同意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谁多少考虑过这个真理，谁就决不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说什么能够战胜金融资本的无产阶级组织不应当变成国家组织。正是在这一点上显出了小资产者的原形，在小资产者看来，国家“终究”是一种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东西。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47页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们不是把改造设想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设想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意识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

① 指考茨基。——编者注

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91 页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只是市侩式地夸大了民主的概念，没有丝毫政治内容。既然人们当时可以合法地利用这个口号来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制，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86 页

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因为这是一种骗局，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人们迷信般地崇拜国家，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腐童话；无产阶级要把叫做国家的这个机器摈弃，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论国家》（1919年 7 月11日）。《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56页

直到现在，往往还有人把这个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不仅宗教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自以为没有宗教偏见的人，也往往把专门的国家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

一谈，并且企图树立一种具有一套哲学见解和论据的往往异常复杂的学说，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是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力量，它把某种不是来自人类本身而是来自外界的东西赋予或可能赋予人们，它是上天赐予的力量。必须指出，这个学说同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的利益有极密切的联系，处处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深深浸透了资产阶级代表先生们的一切习惯、一切观点和全部科学，因此，你们随时随地都会遇见这一学说的残余，甚至那些愤慨地否认他们受宗教偏见支配并且深信自己能够清醒地看待国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也不例外。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2—43页

满脑子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忘掉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精髓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老爷们，把**国家政权**当作一种圣物，当作一种偶象或者是正式投票产生的合力，当作“彻底民主”的绝对物（还有其他类似的胡说）。他们没有看到，国家政权仅仅是**各个**阶级都能而且应该利用（并且应该善于利用）来**为自己的阶级目的服务的工具**。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页

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来看，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执，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民主自由和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我国孟什维克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尝尝幸福的味道”（《火星报》第103号第

3 版第 2 栏），其实这正是流露出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 309 页

或者是地主资本家专政（即铁的政权），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只有公子少爷、赘脚的知识分子这些连坏书都学得很差的先生，才会凭空幻想中间道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中间道路，而且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民权、立宪会议、自由等等漂亮词句掩盖着的），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1919年 8 月24日）。《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63页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630 页

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利用这个在历史上比封建制度前进了一大步的民主，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它的历史条件性和局限性，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国家在君主制度和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都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资产阶级不得不说假话，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说成“全民政权”或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但实际上，这种民主共和

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

列宁：《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11页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的**论调，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9页

就拿最自由最文明的美国来说。它是一个民主共和国。那里怎么样呢？在那里，不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而是一小撮亿万富翁实行着残暴的统治，全体人民处于奴隶地位，没有自由。既然工厂、银行和全国一切财富都属于资本家所有，与民主共和制同时并存，千百万劳动者处于奴隶地位，过着极悲惨的贫困生活，试问，那里有你们吹嘘的平等博爱吗？

没有！哪里由“民主派”统治，哪里就是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抢掠。我们是知道所谓民主的真正本质的。

列宁：《在前米赫里逊工厂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30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73—74页

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

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2页

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实现任何第三种专政。大概马尔托夫之流至死也不会抛弃这种幻想。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我们要记得，在实践中，这班人总不免今天倒向邓尼金，明天倒向布尔什维克。而今天应该做今天的事。

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919年7月3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8页

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作为他们现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才存在着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能够具备高度的觉悟、坚强的性格、洞察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可以**只用投票表决**来决定，或者不要长期的斗争经验而用任何一种方式**预先决定**他们跟哪个阶级或哪个政党走。

这是幻想。这是考茨基、龙格、麦克唐纳之类的书呆子和甜言蜜语的社会党人的阿谀奉承。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0页

我在这一点上不象您那样乐观①。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

① 纽约《世界报》驻伦敦记者R·兰多尔访问马克思时说：“我想，在英国，不论预期的结局如何，都可以不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达到它。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英国方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编者注

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

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1871年7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6页

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屠杀、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那种具体的情况下，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理的隐瞒。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4页

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现在有可能通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发表于1927年11月6—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0年版第203页

四、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①，他的思想受胎于黑格尔。而马

①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Karl von Clausewitz：《Vom Kriege》），全集第1卷第28页。参看第3卷第139—140页：“谁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各国政府间和各个民族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这样想，似乎战争一开始，这种关系就会中断，并且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己特殊规律支配的形势。我们的论断恰恰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通过另一种手段干预的继续。”（列宁原注）

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当时各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页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

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的战争，你们就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实行的政治是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镇压工人运动。当前的战争① 正是这一政治的继续，也只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例如无论在奥地利或俄国，无论平时或战时的政治都是奴役各民族，而不是解放各民族。相反地，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一些附属国里，我们看到的政治却是亿万人民觉醒起来争取民族生存，是亿万人民要从反动“大”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现在仍然只能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战争。

在考察当前的战争时，只要把这一战争视为“大”国及其主要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就立刻可以看出，认为在当前战争中可以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那完全是反历史的、虚伪的和骗人

① 指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注

的。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3页

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识别它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如果政治是帝国主义政治，就是说，如果它保护财政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和其他国家，那末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治是民族解放政治，就是说，如果它反映了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那末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便是民族解放战争。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24页

普列汉诺夫先生忘记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战争是代表一定阶级的一定政府所实行的**政治的继续**。

尼古拉二世和威廉二世代表着两国的反动的资本家阶级，近几十年来两国都执行着掠夺别国的政策，例如掠夺中国、扼杀波斯、蹂躏和瓜分土耳其，这些都是事实。普列汉诺夫先生只要翻一翻——哪怕只是翻一下——近几十年的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就不能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敢否认这一点。

尼古拉二世和威廉二世进行的这场战争，正是同两国银行资本有密切联系的帝国主义掠夺政治的**继续**。

既然战争是两个掠夺者和压迫者集团为了分脏、为了争取**谁能**压迫**更多的**民族、**谁能**掠夺**更多的**东西而进行的，对于**这种**战争来说，谁先发动、谁先宣战等等问题也就没有任何经济的和政治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先生（完全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

流一模一样）已经堕落成一个庸俗不堪、非常平凡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他不想知道（也许向来就不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和政治是同一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应当分析哪些阶级在进行战争，他们在为什么而战。

列宁：《跟着〈俄罗斯意志报〉的脚印走》（发表于1917年4月13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91—92页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十八世纪末，法国的革命市民和革命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国的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镇压了本国的君主和地主。革命阶级的这种政治不能不彻底动摇欧洲所有其它专制的、君主的、半封建的国家。而战争也是胜利了的法国革命阶级的政治的必然继续，在这种战争中欧洲的所有君主国结成了有名的联盟，用反革命的战争反对革命的法国。革命的法国人民不但当时在国内第一次表现出了几百年来没有过的革命毅力，而且在十八世纪末叶的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巨大革命创造精神。他们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规章，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我认为这个例子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现时资产阶级报刊的政论家根本忘记了的东西，他们利用还不觉悟的人民群众怀有偏见，愚昧无知，不懂得每个国家、每个阶级所发动的任何战争与它们战前的政治有着密切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联系，而愚弄这些人民群众。每个战前实行统治的阶级都保证用所谓的“和平”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所以说是“所谓的”，是因为它们为了“和平地”统治殖民地而采用的那些镇压手段，未必能够称得上是和平的。

列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页

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村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的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7页

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是帝国主义政治更激烈更露骨的表现。我们的战争则是我们共产主义政治的继续，无产阶级政治的继续。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1919年12月2—4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53页

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它促使群众起来反对自己的统治者。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内战争，是推翻这些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治的继续，这种战争愈向前发展，就愈能加强劳动群众同领导这一战争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1919年12月2—4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54页

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政治的继续，是推翻剥削者——资本家和地主这一政治的继续。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9年12月5—9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93页

不能把**战争**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因为战争是政治的表现。

《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1930年1月1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4页

战争同政治有直接的联系，政治产生战争，战争是政治用暴力手段的继续。

《斯大林给拉辛同志的复信（1946年2月23日）》，载苏联《军事思想》1941年1月第1期

（二）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

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1852年2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8页

只有完全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才可能消灭战争。

列宁：《欧洲资本和专制制度》（发表于1905年4月5日〔3月23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40页

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发表于1905年7月10日〔6月2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31页

要永远牢记，当阶级统治还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会消除的。

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发表于1905年1月14日〔1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35页

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念头。我们的口号应当

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75页

（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

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73页

即使在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纲领必须承认这种战争，虽然对人们使用暴力并不是我们的理想。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3—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页

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在一些稍微自由和先进的国家里，经常（甚至可以说几乎毫无例外）发生

两个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发展和全世界现代社会的整个历史造成和加深着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两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列宁：《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发表于1917年9月29日〔16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12页

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就是旧东西死亡的无比复杂的痛苦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生活方式的诞生。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23页

历史上还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说，对外战争还可以持续一个相当时期而不致于使资本主义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那末国内战争要不引起这种结果就显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

列宁：《预言》（1918年6月2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78页

在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始终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在一切国家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没有极严重的破坏，没有恐怖，没有为了战争利益而对形式的民主实行限制，国内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甜言蜜语的牧师，不管是基督教牧师，或是沙龙的议会的社会主义者之类的“世俗”牧师，才会看不见、不了解和感觉不到这种必然性。只有僵死的“套中人”才能因此避开革命，而不在历史要求用斗争和战争来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时以最大的热情和决

心投入战斗。

……

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懂得，为了推翻黑奴制度，为了推翻奴隶主的政权，就是使全国多年进行国内战争，遭到同任何战争分不开的无穷的破坏、摧残和恐怖，也是值得的。可是现在，当问题涉及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无比伟大的任务时，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辩护人，以及被资产阶级吓倒的和回避革命的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却不能够和不愿意了解国内战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92—593页

历史上真的有一次同战争无关的大革命吗？当然没有！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页

迄今为止，一切革命、一切最伟大的革命的命运都是由一系列的战争来决定的。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20年12月2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86页

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主张社会和平的。在尖锐的经济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发展成公开的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

列宁：《游击战争》（发表于1906年9月3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8页

（四）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只有消灭帝国主义，才能消灭现代战争

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个最高阶段了。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越出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狭隘的范围。因此，列强力图奴役其他民族，掠夺殖民地，以获得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整个世界已经融合为一个经济机体，整个世界已被少数列强瓜分完毕。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完全成熟，现在这场战争是资本家的战争，其目的是争夺特权和垄断，以延缓资本主义的崩溃。

列宁：《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1915年8月20日〔9月2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4页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财政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

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4—5月）。《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6页

各大强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瓜分世界和剥削世界，是为了压迫各族人民。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发表于1916年1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3页

现在**资本家**不仅要用战争来争夺东西，而且为了保存资本主义，他们**非打仗不可**，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92页

资本主义把大量土地集中在个别国家手里，把最后一块土地都分割完了；再要瓜分，再要扩大领土，就只有牺牲别人，为了一个国家而牺牲另一个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使用武力，因此，世界掠夺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列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62页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1920年7月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3页

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金融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金融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4页

在战争时期互相厮打的两个资本主义同盟，其中每一个都指

望粉碎敌方，而获得世界霸权，它们都想从这里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美国指望击溃自己最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夺取国外市场、世界的原料资源，并取得世界霸权。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23页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跃进式的、剧变式的发展所代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表现得特别厉害，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9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6页

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 2—3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756 页

无产阶级对战争的回答应当是：宣传、准备和实现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各国工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现在正空前迅速地加强起来。

列宁：《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任务》（1916年10月底—11月初）。《列宁全集》第23卷第138页

要摆脱战争，除了社会主义胜利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但是许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现在，人类大多数都反对血腥的屠杀，但是他们不了解这种屠杀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关系。甚至资产

阶级也看到这次战争的惨祸，但它不肯承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消灭战争……　这个主要思想一直使布尔什维克和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于那些想使和平降临人间而又要资本主义制度万古长存的人们。

列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61页

要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依靠骗子、空谈家或市侩庸人提出一些甜蜜的“口号”，只有实际打倒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这次战争有千丝万缕的（甚至千绳万索的）经济联系的**阶级**，只有真正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起来掌握政权。**不然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和平。**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68页

我们用革命的办法摆脱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尤其宝贵的是，如果资本主义继续存在，那末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爆发反动的帝国主义大屠杀；在1912年和1914—1918年，工人的叛徒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曾用《巴塞尔宣言》愚弄了自己和工人，但是二十世纪的人已经很难再次满足于这种宣言了。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1922年2月底）。《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96页

（五）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

战争。那时会有八百万到一千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会哭泣的。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1887年1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402页

他[①]天真地提出要以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发生，而且也曾经发

① 指爱尔威。——编者注

生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不懂得，能不能“回答”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危机的性质。根据这些条件才能选择斗争的手段，同时这个斗争的目的不应当（这是爱尔威思想的第三个误解和考虑欠周的地方）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单纯地防止发动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但是，在爱尔威思想的全部半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中，也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内容，即从下面的意义上来说，它推动了社会主义：不要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手段，要努力使群众懂得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手段来对付战争必然引起的危机，最后，要努力使群众深切地懂得工人国际团结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年8月底—9月初）。《列宁全集》第13卷第63—64页

内战的学校人民并没有白进。这个学校是很艰苦的，它的全部课程必然包括反革命的胜利、凶恶的反动派的猖獗、旧政权对反叛者的野蛮镇压等等。但是，只有十分愚蠢的书呆子和没有头脑的木乃伊才会因人民进入这个受苦的学校而痛哭流涕；这个学校教被压迫的阶级进行内战，教他们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把现代奴隶群众中的仇恨集中起来。这种仇恨长期隐藏在闭塞的、迟钝的、无知无识的奴隶的心中，奴隶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可耻的奴隶地位，这种仇恨就会引导他们去建立最伟大的历史功勋。

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发表于1908年7月23日〔8月5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7页

同志们，这又向我们表明，**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真正在集聚力量**。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灾难和痛苦是难以设想的，但是我们不应当、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将来悲观失望。

在战争中阵亡的和由于战争而丧生的几百万人并不是白白地牺牲的。千百万人在忍饥挨饿，千百万人在战壕中牺牲性命，他们不但在受苦受难，而且也在聚集力量，思索大战的真正原因，锻炼自己的意志，他们对革命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群众的不满愈来愈增长，风潮、罢工、游行示威和抗议战争的运动愈来愈激烈。**对于我们这就是保证，保证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在欧战以后到来。**

列宁：《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6年2月8日）。《列宁全集》第22卷第118—119页

尤尼乌斯在这里说得完全对，革命是不能“制造”的。革命在1914—1916年提上了日程，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58页

帝国主义战争既然会使无产阶级和农民遭到经济破产，这些阶级就一定会起来反对这场战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14—22日〔4月27日—5月5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3页

要摆脱这场战争，除了革命，除了内战，除了将各资本家之间争夺利润、分赃和扼杀弱小国家的战争变成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这种战争以外，别无出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这种战争，在历史上不仅经常随着伟大的革命而爆发，而且也随着某些不很重大的革命而爆发，从被压迫和受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利益来看，这种战争是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神圣的战争。（鼓掌）没有这

种战争，便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1918年6月27日—7月2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3页

资产阶级在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吓得丧魂失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了。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15页

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政治的集中，可以在这场地主资本家依靠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而强迫我们进行的空前艰苦的战争中学习政治。在这场战火中，工人农民学到了很多东西。工人们学会了怎样利用国家权力，怎样把每一个步骤变成宣传和教育的资料，怎样把农民占多数的红军变成教育农民的工具，怎样把红军变成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工具。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9年12月5—9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93—194页

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的革命风潮的根源。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23页

战争是统治阶级掀起的，要结束它只有靠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否很快得到和平，完全决定于革命的发展。有人把事情说得很好听，有人说让我们马上来结束战争吧，不管他们怎样说，没有

革命的发展，战争是结束不了的。

列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92页

虽然战争确实只有利于资本家强盗，只会使他们发财致富，但战争并不是由资本家强盗的恶念造成的，战争是由半世纪来全世界资本的发展及其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求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平。

1917年二三月的俄国革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开端。这次革命走了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是只有走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这将是在全世界“突破战线”——资本利益的战线的开始。只有突破这条战线，无产阶级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的灾祸，给人类以持久和平的幸福。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5—46页

我们认为，结束战争的办法应当是而且一定是在一系列国家举行革命，就是说，由新的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这个新的阶级不是资本家，不是小业主（其中有一半经常依附于资本家），而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

列宁：《联欢的意义》（1917年5月11日〔4月28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286—287页

这个战争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目前我们应当准备这种革命，援助这种革命。俄国人民尽管痛恨战争，渴望和平，可是当沙皇还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们要反对战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准备革命来反对沙皇和推翻沙皇。实际情况也正是

这样。昨天的历史向你们证实了这一点，明天的历史也将向你们证实这一点。

列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页

当然，没有根据可以推断说，战争能给予真正的出路。恰恰相反，战争必然会使情况更加混乱。而且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问题，就象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如果资产阶级政治家不顾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教训，还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抓住战争，那就是说，他们已经糊涂透顶，已经走入绝境，准备急速地跳进深渊。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15页

（六）认清战争性质，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要弄清战争的性质，首先必须确定这次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是怎样的。必须把这次战争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自己对它的态度。否则对问题的解释就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折中主义的了。

对战争的态度应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环境、阶级对比关系等等而有所不同。永远根本拒绝参加战争是没有道理的。

列宁：《无产阶级和战争》（1914年10月1日〔14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1页

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它不象任何其他战争那样，是为了维护一小撮统治者和剥削者的自私利益，它是为了人民群众反对暴君的利益，为了千百万被剥削者和劳动者反对专横和强力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

列宁：《革命的日子》（发表于1905年1月31日〔18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85页

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一种战争是冒险，它满足王朝的利益、强盗的胃口和追逐资本主义利润的英雄们的目的。一种战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合理的**战争，即反对人民的压迫者和奴役者的战争。只有乌托邦和市侩才会根本谴责这种战争。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发表于1905年7月1日〔6月2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31页

社会党人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

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8页

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那时起到巴黎公社止，也就是从1789年起到1871年止，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战争成了各种战争类型中的一种。换句话说，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是这种战争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因此这种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一切正直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一切社会党人，总是同情那些有助于推翻或摧毁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的极端有害的基础的国家（即资产阶级），希望它们取得胜利。例如，在法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法国人掠夺过和侵占过他国领土，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些战争破坏和动摇了整个旧农奴制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在普法战争中，德国掠夺过法国，但是这没有改变这个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次战争把数千万德国人民从封建割据状况、从俄国沙皇和拿破仑第三这两个暴君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8—669页

不区别战争的类型，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列宁给亚·米·柯伦泰（1915年夏）》。《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4页

马克思主义作了这种分析，它指出如果战争的“真正实质”在于，例如，推翻异族压迫（这对1789—1871年的欧洲来说是特别典型的），那末，战争从被压迫国家或民族方面说来就是进步

的。如果战争的“真正实质”是重新分割殖民地、瓜分赃物、掠夺他国领土（1914—1916年的战争就是这样的），那末保卫祖国的词句就是“完全欺骗人民的”。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页

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反对而且也不可能反对革命战争。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71页

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

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得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有可能同这种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碰在一起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我们尤其不能否认这一点的，是因为在欧洲革命史上，近百年来（一百二十五年至一百三十五年）除了有许多反动战争以外，还有革命战争，如法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欧洲的战

争，就是一个例子。现时在西欧（最近期间也在我们俄国）最流行的一种欺骗群众的手段，就是靠引用革命战争的例子来愚弄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必须弄清楚，该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不弄清楚这些，我们关于战争的一切谈论都是纯粹的空谈，都是字面上的和没有结果的争论。

列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0—71页

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是一场掠夺性的战争。必须揭露这场战争，把它描述成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勾当。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1918年3月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85页

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赞成革命战争。战争的阶级性——这就是摆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问题。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赃、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就是这样估计战争的，事实也证实了这种估计。谁不这样看战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70—671页

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个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末一切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

阶级）都是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屠杀的惨祸的**唯一**出路。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72页

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争，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全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一切忠实的人都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希望你们坚定不移！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9—860页

我们一向说："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我们谴责**帝国主义**战争，但并不否定**一般战争**。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页

要知道我们不是反对**任何**战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战争。但是我们**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

《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1930年1月1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4页

列宁把战争分为两类：侵略战争即非正义战争，解放战争即正义战争。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1941年11月6日)。参见《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2年版第31页

（七）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恩格斯：《欧洲军队》（1855年6月底—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478页

关于针发枪可能引起的所谓战术革命，人们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普鲁士的大多数军界人士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于使用针发枪进行快速连续齐射的营进行任何冲锋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刺刀也就完全没有用了。如果这种愚蠢的意见占了上风，那末针发枪就会给普鲁士人带来许多惨痛的失败。幸而意大利战争告诉了一切有头脑的人：现代步枪的火力对于勇猛冲锋的营来说并不是那样非常可怕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便利用这次机会告诫他的同僚：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军界的舆论改变了；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到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

恩格斯：《步枪史》（1860年10月底—1861年1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1—232页

全世界对于这支没有经验的军队①毫无例外地在每一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勇猛精神，都一定感到惊奇。虽然可以说这是后装枪造成的，但是这些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

恩格斯：《德国战争短评》（1866年6月19日和7月5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1页

摆脱了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的力量，能创造出

① 指普鲁士军队。——编者注

真正的奇迹。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革命战争如果真正是由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的，是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末，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97页

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

列宁：《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5月13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7页

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认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认识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列宁：《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5月13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7页

我不认为原子弹象某些政治家所想象的那样厉害。原子弹能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

斯大林：《答〈星期日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韦尔特先生问（1946年9月17日书面提出的问题）》。参见《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1952年版第70页

（八）揭露帝国主义假和平真扩张的阴谋

应当记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它正

在选择有利的战略条件，研究进攻的方法，等待着时机。

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5页

我们知道敌人正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十分肯定地指出：虽然有了媾和建议，但战争还是可能的。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3月2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64页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进行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8页

我们知道，每过一个月我们的力量都会大大增强，而且将来也会愈来愈大。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更巩固。但是我们对待国际危机应当非常小心，应当准备随时应付任何突然事件。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3月2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64页

当机会主义者刚在拚命赞美“社会和平”，拚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发表于1913年3月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9页

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积极意义，这种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象1789—1871年为了推翻民族压迫、为了把封建割据的国家建成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或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后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而进行的战争。

在今天，宣传和平而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这只能散布幻想，使无产阶级相信资产阶级的仁慈，使他们成为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具。认为不经过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谓民主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1915年2月19日〔3月4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0—141页

当争夺强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就来劝导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东西，裁军才是好事。这样做和这样做的结果完全象基督教的牧师从讲台上劝导资本家说，博爱是上帝的教诲，是灵魂的所向，是文明的道德规范。考茨基称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为非作歹的劝告。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5—636页

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争取尽速停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

民的空想。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5—696页

和平口号可以同一定的和平条件联系起来，也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即不为一定的和平而斗争，而是为一般的和平（Frieden ohne weiters）而斗争。显然，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而是一个十分空虚的毫无意义的口号。一般的和平无疑谁都赞成，甚至基特切涅尔、霞飞、兴登堡和暴君尼古拉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每个人都要提出对“本”民族有利的帝国主义的（即掠夺性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和平条件。我们提出口号的目的，是要在宣传鼓动中向群众说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区别，而不是要用一个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的字眼来**调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

列宁：《和平问题》（1915年7—8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8—269页

争取和平的斗争如果不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就只是资产者的温情的或欺骗民众的和平主义词句。

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装出“国家要人”的姿态去制定一些“具体的”和平纲领。相反地，我们应当告诉群众，如果**不**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任何想实现民主的（不割地的、不使用暴力的、不掠夺他国的）和平的愿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在宣言中一开始就肯定而明确地告诉群众，战争是由帝国主义引起的，帝国主义是一小撮“大国”“奴役”各民族，“奴役”全世界所有民族。因此，我们要帮助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否则就不可能实现不割地的和平。自然，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艰巨的，但是群众应

当知道进行这一艰巨而必需的斗争的**真理**。群众不应当陶醉在不推翻帝国主义也可以实现和平的幻想之中。

列宁：《致国际社会党委员会》（1915年9月12日〔25日〕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352—353页

我们的“和平纲领”应当说明帝国主义列强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可能**给予民主的和平。民主的和平**要**寻找，要争取，——但**不是倒退**到**非**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平等民族的联合这种反动的空想里去寻找和争取，而是要**前进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里面去寻找和争取。在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经过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革命战斗，任何一个根本的民主要求都不可能比较广泛而巩固地实现。

谁许诺各民族以“民主的”和平，而又不同时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甚至在战争已经进行时还否认这种斗争，谁就是欺骗无产阶级。

列宁：《论“和平纲领”》（发表于1916年3月25日）。《列宁全集》第22卷第161—162页

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这就不仅要引起摩擦，而且要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然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说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

只有在我们推翻、最终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东西，即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工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最艰巨、最需要斗争的工作，那末，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甫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愿意想，不愿意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73—874页

社会和平主义没有向工人说明，指望不推翻资产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能求得和平乃是一种幻想，社会和平主义只是重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老调，它劝诱工人相信资产阶级，掩盖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和它们彼此间的勾结，诱使工人放弃已经成熟、已经被事变提到日程上来的社会主义革命。

……

现在许多帝国主义政府都在弹奏和平主义的乐章，考茨基、屠拉梯、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也哼着同样的和平主义调子，列诺得尔友好地向这些政府或这些人伸出了手，——这一切都揭露出实际政策中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

列宁：《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的工人书》（1916年12月底〔旧历〕）。《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6—237页

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谢德曼之流）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屠拉梯和考茨基）原则上的一致性也就在于，不管前者或

后者，客观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不过一部分人为帝国主义“效劳”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粉饰帝国主义战争，另一部分人为同一个帝国主义效劳是用空谈民主和约来粉饰正在酝酿中和准备中的帝国主义和约。

这两类奴才或者说这两种色彩的奴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都是需要的，他们既需要普列汉诺夫之流用“打倒侵略者”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继续进行屠杀，也需要考茨基之流用歌颂和平的靡靡之音来安慰怨气冲天的群众。

列宁：《世界政治的转变》（发表于1917年1月31日）。《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3页

毫无疑问，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而且一定能结束一切战争。但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国家，例如在法国，取得胜利，就立刻并且一定会消灭一切战争，那就是和平主义的幻想了。

列宁：《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1921年12月11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08页

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假仁假义，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了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谈论、任何对于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发表于1920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10页

国际联盟关于和平、关于废除军备和裁减军备的空谈究竟有什么结果呢？除了欺骗群众，除了使军备竞争更形加剧，除了使日益成熟的冲突更形尖锐之外，并没有什么良好的结果。国际联

盟空谈和平与废除军备已经三年之久，所谓第二国际支持这种虚伪的空谈也已经三年之久，而“各国”仍然继续加紧武装，扩大“列强”间旧有的冲突，增加新的冲突，因而破坏和平事业，——这种事实难道可以认为是偶然的吗？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1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8页

五、民族斗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

（一）民族是个历史的范畴

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

《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1916年12月〔旧历〕下半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198页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征服这件事看起来好象是同这种历史观完全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这里我们只能谈一谈主要之点，因此我们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罗马和野蛮人，封建主义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

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页

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页

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面。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9页

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出，一个原来统一的部落怎样逐渐散布于广阔的大陆；各部落怎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民族〔Völker〕，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在部落内部，个别氏族怎样分裂为好几个氏族，老的母亲氏族以胞族的形式保存下来，但是这些最老的氏族的名称，在彼此相距极远的、老早就分离了的部落中间仍是一样的——“狼”和“熊”在大多数印第安部落中仍然是氏族的名称。一般说来，上述的社会制度适用于印第安人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许多

部落没有达到亲属部落联盟的程度罢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1—92页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leine Vö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Völkchen〕，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0页

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做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

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总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5—106页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提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这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代。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

里发展起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页

要给“没有历史的民族”找一个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除非在乌托邦中寻找)，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有历史的民族。

列宁：《编辑部对韦帖兰的〈民族问题和拉脱维亚的无产阶级〉一文的意见》（发表于1914年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16页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

（二）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领导克拉科夫革命运动的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独立，而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没有土地运动来把农奴变成

自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你们使波兰贵族去代替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只不过是使专制主义改变一下国籍而已。德国人就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破仑换成了三十六个梅特涅的。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上的依旧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是被奴役的地主。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丝毫也不会改变波兰农民的社会地位。

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做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294页

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

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1848年7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

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争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因为爱尔兰的人民比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绪和更加顽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会失去作为**英国统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道义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

势力，英国无产阶级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害。

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1页

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作自己共同的敌人。

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1871年3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16页

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4页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7页

如果属于统治民族的国际会员号召被征服的和继续受压迫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抛开民族分歧”等等，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宣扬向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这只会加深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很广的一种观念：他们比爱尔兰人高一等，对爱尔兰人说来他们是贵族，正如蓄奴州的最堕落的白人认为自

已对黑人说来是贵族一样。

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1872年5月14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6页

在英国，爱尔兰工人和英国工人的对抗，始终是英国的阶级统治赖以维持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1872年5月14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6页

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1页

资产阶级唆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反对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千方百计地分裂他们。觉悟的工人懂得，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是不可避免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们竭力去启发落后国家的同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

列宁：《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发表于1913年10月29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456页

一切都在变化……社会生活在变化，“民族问题”也跟着在变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舞台上，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

斯大林：《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发表于1904年9月1日）。《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页

（三）民族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民族压迫

一个国家中个别资产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288页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

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

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庆祝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1845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6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和一般政治上的）压迫是**不可能**的。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要铲除民族压迫，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等。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劳动者不应当忘记，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占少数的压迫民族，即大国的（帝国主义的）、享有充分权利和特权的民族，以及占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即附属或半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

列宁：《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1919年12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页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斗争的自觉的代表者，它根据自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揭露其虚假和伪善的基本任务，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

点，而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71页

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遗产，地主、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支持这种政策，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特权，分化各民族的工人。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9页

私有制和资本必然使人们离散，燃起民族纷争，加强民族压迫，而集体所有制和劳动却必然使人们接近，去除民族纷争，消灭民族压迫。没有民族压迫，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没有民族自由，社会主义的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

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发表于1921年2月10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页

列宁不是把民族差别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时期，就是说，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胜利

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8页

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孤立和民族的互不信任将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1973年版第40页

至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更远的前途，那末我向来都是坚持而且现在还是坚持列宁的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已经巩固并且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各民族语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不会是大俄罗斯语言，也不会是德意志语言，而将是某种新的语言。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1930年7月2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6页

民族语言的消亡和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问题不是**国家内部**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而是**国际**问题，是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问题。……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不能混为一谈。列宁说，民族差别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胜利以后

还会存在很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1930年7月2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8页

（四）现代殖民主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就是压迫其他许多民族的民族力图扩大和巩固这种压迫，重新瓜分殖民地。

列宁：《和平问题》（1915年7—8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1页

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0页

我们是处在一个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97页

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列强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05页

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5年版第4页

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所有这些，一方面使各个民族的经济和领土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19页

正是由于必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垄断资本主义才采取这样冒险的步骤，例如奴役和不断掠夺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把许多独立国变为附属国，组织新战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头子们看来，战争是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最好的“生意”），以及企图夺取世界的经济霸权。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8年版第30页

（五）民族压迫必然引起民族解放斗争

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

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当波兰无产阶级把它争到手的时候，它就会完全有保障了。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1892年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7页

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

恩格斯：《支持波兰》（发表于1875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2页

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7页

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1849年4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6—337页

现在，大多数居民已经觉醒，已经行动起来，连最“有威力的”列强也阻挡不住他们了。它们能怎么办！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杀的“胜利者”，现在连小得可怜的爱尔兰都不能战胜……

列宁：《〈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1922年5月2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2页

如果有人“信口开河地”说：小国反对大国的战争是没有希望的，那我们就必须指出：没有希望的战争也是战争；其次，“大国”内部的某些现象——如革命的爆发——可以使“没有希望的”战争成为大“有希望的”战争。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52页

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55页

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性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使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扩大**和尖锐化。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72页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十亿人口，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在这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已经很强大，就是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这种政治的继续。这种战争**可能**导致目前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也可能不导致，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

举一个例子：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殖民地打了七年仗，也就是说，进行了七年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无论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或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以及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

础上都可能发生)。结果法国被打败，并且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北美合众国反对英国一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法国和西班牙(当时这两个国家仍占有今天美国的一部分)，由于仇视英国，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便同起义反对英国的合众国缔结了友好条约。当时法军同美军一起打英国人。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竞争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附带因素，同我们在1914—1916年战争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塞奥战争中，民族因素同决定一切的帝国主义竞争相比，没有多大的意义）。由此可见，死板地应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并且由此得出“不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的结论，那是何等的荒谬。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51—852页

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着重指出（第一次在我们的共产国际内）我们已经着手准备这个斗争，是很重要的。自然，在这个广大的领域内，困难是更多了，但是，不管怎样，运动是在向前发展，而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殖民地国家的农民，虽然他们现在还很落后，但他们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9页

帝国主义战争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由殖民地人民组成的整团整团的军队被卷入了欧洲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

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新式机器。他们将利用这种学识去反对帝国主义老爷们。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3页

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09页

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现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东方各民族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3页

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向来都是帝国主义国际政策的对象，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2—103页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里，引火物这样迅速地增多，烈火这样明显地延烧到昨天还在沉眠不醒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去，这样，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活动的日益加强和各个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日益尖锐

化就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发表于1908年7月23日〔8月5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2页

被压迫者（例如殖民地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即压迫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在今天也是可能的。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为反对实行民族压迫的国家而“保卫祖国”，这不是欺骗，社会主义者也**决不反对**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页

祖国是个历史的概念。在一个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争取推翻民族压迫的**时期**，祖国是一回事；在民族运动早已结束的时期，祖国则是另一回事。……

《**共产党宣言**》曾指出，工人没有祖国。

这是对的。但是，那里**不仅仅**谈到这一点。那里还指出，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无产阶级的作用有些特殊。如果只抓住第一个原理（工人没有祖国），而**忘记了**它同第二个原理（工人确定为民族的阶级，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的**联系**，这将是天大的错误。

这种联系是什么呢？我认为，这种联系就是：在**民主**运动中（在这样的时机，在这样的具体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拒绝支持这个运动（因而，也不能拒绝在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可是，同一个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马克思在1848年，恩格斯在1859年（恩格斯在《波河和莱茵河》这本小册子的末尾直接激发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直接号召德国人进行民

族战争）。1891年，鉴于法国（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反对德国的战争当时已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直接承认要“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是他们头脑不清吗？不是的。依我看，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给印·阿尔曼德（1916年11月30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239页

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太可笑了。

斯大林：《再论民族问题》（发表于1925年6月30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85页

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3页

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3页

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

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1页

帝国主义者本身及其新的吞并行为会给东方的革命化以不小的援助，因为这种吞并行为会把更多的国家卷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世界革命的基地。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参与东方日益增长的自发运动，向前发展这种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斯大林：《不要忘记东方》（发表于1918年11月24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53页

不难了解，各国法西斯化的政府所施行的这种残暴压制不能不引起各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和宗主国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革命运动增长的事实，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命运不能没有决定的意义。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1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1页

安然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觉醒的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发表于1927年11月6—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206页

（六）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

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587页

现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的年轻的、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国民族的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

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1848年7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5页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象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2页

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象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

工人看做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

……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0—381页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8页

在黑人的劳动被打上屈辱的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永远不能解放。

《马克思致弗·拉法格（1866年1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9页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哪怕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4页

同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认”民族问题的蒲鲁东分子相反，马克思鉴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2页

现在却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步调一致的统一阵线，主张利用一切反帝民族运动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反对整个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愈纯粹，“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一国际主义原则显然也就愈有现实意义。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64页

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那末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战线，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6页

（七）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沙文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3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7页

在象爱尔兰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

的民族组织为基础。爱尔兰人也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只有在和统治民族的代表享有平等权利并反对奴役的情况下才能加入协会。所以，各爱尔兰支部的存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他们甚至必须在自己章程的导言中宣布，作为爱尔兰人，他们的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职责是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

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1872年5月14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6页

我们一向懂得并且不会忘记，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

列宁：《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三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11月6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0页

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

列宁：《在全俄缝纫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1年2月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3页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9页

如果我们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们主要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就是兼并者。

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7页

要作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专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这在“理论”上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践上有人恰恰表现出兼并主义者的漠视态度。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68页

决不容许口头上谴责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进行革命斗争来把殖民地（和附属国）从**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出来。这是假仁假义。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为资本家阶级效劳的工人长官）的政策。英、法、荷、比等国的党，都是在口头上仇视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在“本国”殖民地内进行革命斗争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不经常援助殖民地内已经普遍开始的**革命**工作，不把殖民地革命政党所需要的武器和书报送到殖民地去。这些党是恶棍和叛徒们的党。

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7月14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2页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党的各个政党中最常见

的现象。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74页

我们既然是国际主义者，所以第一、我们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4页

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

列宁：《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给政治局的便笺》（1922年10月6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页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得享有任何特权！对少数民族不能有丝毫的压制、丝毫的不公平！

列宁：《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发表于1913年5月10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74—75页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在估计这个社会时，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页

工人阶级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民族压迫。

列宁：《民族平等》（发表于1914年4月16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33页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和马尼洛夫精神。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2—53页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74页

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发表于1920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11页

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7页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3页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始终同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获得民族间的和平（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获得平等权利，获得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这也叫作“实际精神”。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地位。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1页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9页

“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3页

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援助，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2页

无产阶级不解放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发表于1927年11月6—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204—205页

第四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8页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十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

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3页

他们[1]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就已表达得十分明确的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页

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页

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0页

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者注

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0页

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以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封建制度下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一种，——那不能用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的“本性”和“属性”来解释，而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解释。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0页

物质方面的发展，外部条件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先于**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这样一来，自然发展史就根本粉碎了所谓唯心主义。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应该这样说。

历史表明：各种不同时代的人们之所以抱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愿望，是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和自然作斗争以求满足本身的需要，与此相适应，他们的经济关系也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起来。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9页

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巨大的反作用

（一）社会意识的反作用

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4页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2页

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却这样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极小的意义。

当时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

于是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4月底）。《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6页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他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2页

（二）革命理论的作用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力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

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2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

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1页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

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

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2页

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发表于1902年8月1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163页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3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发表于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2—333页

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能够领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击退各种名目翻新的老朽不堪的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列宁：《祝贺格·瓦·普列汉诺夫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1901年12月初）。《列宁全集》第5卷第288页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

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243页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2页

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1929年12月2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339页

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

义。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1929年12月2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339—340页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16页

三、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

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

由于实施这个新制度和容纳大量被保护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释放的奴隶，——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便受到排挤而不再过问社会事务；它们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会社。不过，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因袭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很久，只是逐渐才消亡下去。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4页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

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8页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

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

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

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114页

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正如我有一次指出的，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95页

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机关，但是还存在着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力量，这就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愈坚决地摧毁支持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另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力量即习惯的力量就表现的愈明显。干得好，机关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干得怎样好，习惯是永远不能一下子打破的。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5—846页

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了，但它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还会有不少的人留恋过去。

列宁：《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1919年3月12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页

能不能说我们已经肃清了经济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呢？不，不能这样说。更不能说我们已经肃清了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因为人们意识的发展落后于人们的经

济地位，而且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力图恢复和支持苏联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我们布尔什维克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必须时刻戒备。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54—555页

四、社会意识的阶级性。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

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学家（主要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建制度。在普

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破坏永恒公平的。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它是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540页

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指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①，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6页

①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或多或少地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一般工人的觉悟水平，使他们不要自限于被故意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范围内，而要学习多多理解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限于”，而是被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为知识分子写的读物的，而只是某些（恶劣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制度的情形，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列宁原注）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它使自发性受它支配。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8页注

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谈这个基本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最起码的真理，而"大谈"其空话，这在事实上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的底细，使读者不能看到它。崩得分子的**实际**表现和资产者是一样的，因为资产者的全部利益要求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6—7页

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大家知道，这就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1页

五、道德在阶级社会里总是阶级的道德

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的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这里像通常一样，关于这些思想家应当指出，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2页

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社会财产形式，绝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1页

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末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在这里没有人怀疑，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134页

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反驳，说无论如何善不是恶，恶不是善；如果把善恶混淆起来，那末一切道德都将完结，而每个人都将可以为所欲为了。如果除去一切极端玄妙的词句，这也就是杜林先生的意见。但是问题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的。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末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的宗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地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分成许多种类，从耶稣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

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有真理性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2—133页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这是一种欺骗。我们的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52页

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18年10月22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105页

究竟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呢？有没有共产主义品德呢？当然是有的。人们往往硬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资产阶级常常责备我们，说我们共产主义者摈弃一切道德。这是一种偷换概念、蒙蔽工农耳目的手段。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摈弃道德，否认品德呢？

是在资产阶级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旨中引伸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说，我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明明知道，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是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要贯彻他们这些剥削者的利益。也有人不是从道德的意旨中，不是从上帝的意旨中，而是从往往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引伸出这种道德来的。

我们摈弃从超人类或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51—352页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所以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服从这个任务。我们说：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成果都

交给了一部分人。可是，我国的土地已经是公共财产了。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53页

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道德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服务的。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55页

六、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① 占统治地位罢

① “在信仰的领域里”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在知识的领域里”。——编者注

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

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谬论来加以粉饰的：牧师、哲学家、律师和国家活动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个人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

恩格斯：《十小时工作制问题》（1850年2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270页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旧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不进行宣传，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仅仅在研究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而且，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来说，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

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止；同时，这种色彩不能象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堵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①、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① 阿尔比派是十二至十三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城市的一个教派。它的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以宗教形式反映了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抗议，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权制度。——编者注

他们① 在宪章运动的年代里领教过人民这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的作为。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了联合王国的法律之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学校董事会中就让牧师占据优势；于是，资产阶级日益增加自我捐税，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从崇礼派直到“救世军”。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1页

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部分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即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宣传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这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说明宗教的

① 指英国中等阶级。——编者注

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抑，在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厉害一千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面前，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而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势力，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盲目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末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发表于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8—379页

宗教是终身给他人劳作、为穷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蒙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

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发表于1905年12月3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63页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发表于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5页

在那些最自由的国家里，呼吁“民主、人民、舆论和科学”是**完全**不适当的，——在这样的国家（美国、瑞士等等）里，人们正是特别热心地用这种纯洁的、精神上的、创造的神的观念来麻痹人民和工人。正因为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观念，甚至任何对神的谄媚，都是无法形容的卑鄙龌龊的东西，是**民主**资产阶级毫不在乎的（在很多场合甚至是他们所欢迎的）东西，——所以是最危险的东西，是最可恶的“传染病”。群众识破千百万种罪恶、坏事、暴行和**肉体**的传染病，比识破**精巧的**、精神上的、用最漂亮的“思想”外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念要容易得多，因此前者的危害性比后者小得多。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1913年11月中旬）》。《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1—482页

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而是一贯

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1913年12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111页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反对僧侣主义的斗争，象英国发生的一切严重斗争一样，同样具有穷人反对富人、人民反对贵族、“下层”阶级反对“上层”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

马克思：《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1855年6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65页

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象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发表于1905年12月3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页

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儒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

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把”工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发表于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7—378页

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坚决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发表于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8页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提出反宗教斗争的问题，不应当根据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来进行反宗教斗争，而应当具体地、根据当前**在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马克

思主义者应该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相对的，是可以移动、可以改变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既不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小资产者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象他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忘记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宗教信仰，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而斤斤计较细小的得失：不得罪人，不排斥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绝顶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让别人活”，如此等等。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发表于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381页

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避免加剧宗教狂。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2—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46页

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那些貌似马克思主义而事实上却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往往忽视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6页

七、文学艺术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

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①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您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了。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

① 马克思指的是织工起义前夕在西里西亚纺织区流行的革命歌曲《血腥的屠杀》。这次起义是1844年6月4—6日在西里西亚爆发的，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编者注

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

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于1905年11月1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47页

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于1905年11月1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48页

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以及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于1905年11月1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49页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

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读者和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于1905年11月1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0页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

生相互作用。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于1905年11月1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0页

各种半党派性的和非党杂志所刊载的专门的文学批评文章，长篇大论，没有什么好东西！我们最好设法远远离开这种知识分子的陈旧的老爷派头，也就是说，把文学批评也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7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页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发表于1908年9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9页

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情况，使它们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才会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于1905年11月1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1页

在书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描写战争的“恐怖”、引起对一切

战争（不仅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也对其他一切战争）的反感的文艺小说。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小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把读者从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引到了解必须打倒组织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小说。

《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1930年1月1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4页

电影具有从精神上影响群众的特别巨大的可能性，它帮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者，组织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战斗力。

《斯大林致苏联电影管理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发表于1935年1月11日）》。载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真理报》

八、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发表于1902年2月1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309页

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工作中有十分之九的时间用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70页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末资产阶级的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一定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68页

我们应当再三地发动尽可能多的群众，来打倒资本主义旧社会的、使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传染和腐蚀的可恶的信条"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残暴的、肮脏的和血腥的资本主义的这个遗毒，极厉害地窒息、压抑、伤害、折磨和摧残着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摆脱这种遗毒，必须同它进行不倦的斗争，不仅一次二次而且多次对它宣战，对它进行十字军讨伐。

列宁：《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1919年1月26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9页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习惯与传统，也是反对国家监督的，要求"神圣私有财产制"和"神圣"私有企业的不可侵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指出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潮，说它们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如何不可调和，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明显，这个原理多么正确。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07页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

谈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8—859页

“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幻想”。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1849年2月14—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5页

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但它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9页

二月革命① 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② ——

① 指1848年2月巴黎人民举行的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二月革命迫使国王退位，成立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的临时政府，宣布第二共和国成立。——编者注

② 指执行权委员会，即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在1848年5月10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编者注

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1]的焰火变成了卡芬雅克[2]的炮火。

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

马克思：《六月革命》（1848年6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9—300页

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是承认这种斗争的，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2页

---

①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编者注

②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编者注

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等等空话吧。现在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夸大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象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望见“善良君子”极“光滑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地断定他“大概是个骗子”。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页

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象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

无政府主义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发表于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384页

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204页

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61—362页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页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锻炼严整的革命人生观，而今后的实际任务就是使青年组织起来，转向我们的委员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463页

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3—374页

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工农劳动群众必须战胜知识分子的旧习气，必须改造自己，不这样就无法着手建设事业。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66页

工人阶级开始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主资本家社会，从剥削者和土豪社会，从少数人龌龊地营私致富而使多数人遭受贫困的社会继承下来的。可是工人阶级是能够战胜——**并且归根到底必然会战胜**——旧世界，能够战胜它的毛病和弱点的，只要工人阶级不断地派出一批一批人数更多，经验更丰富，在困难斗争中受到更多锻炼的工人队伍与敌人作斗争就行了。

列宁：《论饥荒》（1918年5月2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66—567页

用被迫劳动的人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只想摆脱多余的沉重负担，只想**从资产阶级那里**捞到一点东西，——这是一种旧习惯，必须同这种习惯作斗争。这个斗争已经由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展开了。……一切有觉悟的、诚实的、有思想的农民和劳动人民，在这场斗争中一定会站到先进工人这方面来。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95—396页

第五编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6页

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发表于1921年）。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83页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

恩格斯：《普鲁士“危机”》（1873年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5页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88页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增长。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2页

要革命，但又不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革命从来也没有过。

列宁：《十二条纲要》（1917年1月13—17日〔26—30日〕之间）。《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3页

我们知道，革命是要靠试验和实践才能领会的；只有当千百

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列宁：《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918年7月4—10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76页

我们力量的主要泉源，在于工人很自觉，很英勇，始终得到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

列宁：《与燃料恐慌作斗争》（发表于1919年11月13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8页

新的历史任务愈艰巨，愈伟大和愈重要，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当吸引千百万人自觉地来解决这些任务。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1918年6月27日—7月2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9页

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

列宁：《〈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1922年5月2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1页

被压迫阶级的代表，甚至待遇很好和非常有知识的工人，也都是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关键，单纯直率得惊人，信心坚定不移，观点极为明确，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25页

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5页

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

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7页

（二）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1881年8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无产阶级在实际上表明，它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它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和豪华，它的劳动是我们整个“文化”的基石。

列宁：《革命的日子》（发表于1905年1月31日〔18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96页

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8页

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为了要找到在宗教问题上敢于运用自己的智力的人，就必须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去，到当时所谓的“肮脏人群”中去，到工人中去，特别是到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中去。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5页

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3页

把领袖看做唯一的历史创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设工厂、矿井、铁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创造一切生活资料，供给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2月19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05页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为科学和技术开拓新道路的，有时并不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1938年5月17日）。参见《列宁文选》（两卷集）1956年版第1卷第60页

（三）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

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2页

经过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酝酿而成熟起来的矛盾，都在革命

过程中浮现出来。生活变得非常丰富。一向不露头面因而常常被肤浅的观察家所忽视甚至轻视的群众，以积极的斗士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些群众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拟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思想家的理论。这些群众为了能承担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巨大的世界性的任务作了英勇的努力，而不论个别的失败如何惨重，不论流血和成千的牺牲使我们如何震惊，但是群众和各阶级在整个革命斗争中都受到了直接的教育，这一点的意义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这一斗争的历史必须以天来计量。

列宁：《革命的日子》（发表于1905年1月31日〔18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82页

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如果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而言，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这两种力量中去的话。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7页

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当德国资产阶级堕落到极其拜占庭式地逢迎“常胜的威廉”，把手足捆起来向俾斯麦投降，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前程的时候，工人阶级却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政府和资产阶级为了镇压他们而想

出来的措施，反而使得工人阶级的运动加快和加强了。

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1878年2月中—3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9—140页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无产阶级还从来没有在严重斗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放下武器，还从来没有不和敌人较量一下力量就向这个该死的压迫和剥削的遗物让步。

列宁：《朋友见面了》（发表于1905年9月26日（13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244页

象往常一样，资产者这一次也胆小如鼠，不敢捍卫本身的利益；从攻破巴士底狱以来，平民曾不得不为资产者完成种种工作；如果平民在7月14日、10月5—6日直到8月10日、9月2日等等不进行干预，旧制度每一次都会战胜资产阶级，同宫廷结成的同盟就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可见，只是这些平民把革命完成了。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4页

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①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克伦威尔之后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差不多完全绝迹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2页

---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起义”，而是“革命”。——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这句话是这样的：“无论如何，正是由于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上了断头台”。查理一世（1600—1649），在1625—1649年为英国国王，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处死。——编者注

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1页

工人阶级抱有最崇高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把人类从各式各样的压迫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数十年来它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顽强地、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斗争，组织成百万人的政党，不为个别的失败和暂时的失利灰心。

列宁：《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发表于1905年1月4日〔1904年12月22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页

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发表于1908年8月）。《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2页

资产阶级的（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讲）解放运动，按动力来讲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这一运动的动力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什么可能这样呢？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比资产阶级更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更需要自由，更需要消灭地主的压迫。相反彻底的胜利对资产阶级则具有危险性：无产阶级会运用完全的自由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自由愈完全，地主政权消灭的愈彻底，运用起来也就愈方便。

因此，资产阶级期望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是半途而废，是半自由，是跟旧政权和地主勾结起来。这种期望的根源就是资产阶

级的阶级利益。

列宁：《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发表于1907年4月1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320页

没有**农民**群众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那没收地主土地也好，建立共和国也好，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也好，都是没有希望实现的“空想”。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发表于1908年8月）。《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3页

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夺回去。

列宁：《革命的教训》（发表于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7页

工人随时随地都与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家阶级发生直接冲突。在同这个敌人斗争过程中，工人就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觉悟到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必须彻底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压迫。工人一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会一往直前地奋勇斗争，反对横在他们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首先是反对沙皇政权和农奴主-地主。

列宁：《革命的教训》（发表于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9页

既然**群众**已经振作起来，既然千百万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那末任何迫害和任何镇压都不能阻挡运动。迫害只能激起斗争，使愈来愈多的新战士卷入斗争。恐怖主义者的任何暗杀活动都帮助不了受压迫的群众，而一旦群众站立起来，世界上任何力量都

阻挡不住他们。

列宁：《游行示威开始了》（发表于1910年12月18日〔31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7页

1905年革命使沙皇专制制度动摇了。在俄国，这次革命第一次把对农奴制的压迫记忆犹新的农夫群众变成了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人民。1905年革命第一次向沙皇政府、俄国地主、俄国资产阶级表明，千百万人已经成了公民，成了战士，不再容许把他们当成愚民、黑骨头任意压榨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

列宁：《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发表于1911年2月8日〔21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72页

只有群众运动才是真正的政治斗争。

《列宁给弗兰茨·科里乔涅尔（1916年10月25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27页

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917年10月25—26日〔11月7—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61页

帝国主义者不会结束他们自己掀起的战争，结束战争的是另外的阶级，是工人阶级，因为各国的工人阶级正在一天天地更有力地行动起来，愈来愈感到不满和愤慨，不管人们的感情和情绪怎样，这种行动、不满和愤慨受客观力量的支配，迫使人们推翻资本家统治。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1918年6月27日—7月2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3页

“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发表于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17—318页

（四）无产阶级只有靠自己解放自己

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

① 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1854年3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7页

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

恩格斯：《十小时工作制问题》（1850年2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74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发表于1871年11—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

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和2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0页

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页

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902年1月底—2月初）。《列宁全集》第6卷第11页

要同贫困作斗争，除了**工人自己联合起来**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96页

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他们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22页

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经常说：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得到解放；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宣传鼓动，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而新的历史

任务愈艰巨，愈伟大和愈重要，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当吸引千百万人自觉地来解决这些任务。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1918年6月27日—7月2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9页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发表于1871年11—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

你们很清楚地知道，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反对本身的缺点。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79页

无产阶级只有不局限在狭隘的行会范围内，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阶级。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00页

无产阶级必须一致行动，推翻剥削者，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64页

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但是如果不把阶级斗争引到农村中去，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

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初）。《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78页

无产阶级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完成过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而是消灭任何剥削；而其他阶级的革命，却只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局限在它们和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相矛盾的狭隘阶级利益的范围以内。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39页

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90页

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页

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越深越广，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能干的人也就越多，不仅是能干的鼓动员，而且是能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好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少见的）。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3页

要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这一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完成下面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者，首先是推翻他们的主要的经济和政治的代表——资产阶级；彻底粉碎他们；镇压他们的反抗；使他们的任何恢复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的尝试都不能得逞。第二个任务是：不仅要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引导受资本剥削的全部劳动群众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在反对剥削者的英勇忘我、坚决无情的斗争的进程中，启发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纪律性；要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第三个任务是：使几乎在一切先进国家里人数还相当多（虽然只占人口的少数）的，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小业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相适应的知识分子、职员等阶层保持中立，或者使他们不起有害的作用。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3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

最革命的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先锋队引导本阶级的绝大多数前进时，这种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8页

在我们这种过渡形式的无产阶级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任何斗争，比如，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作斗争等等，其最终目的只能是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84—585页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93—94页

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方法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3页

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

正的工人政党就行。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1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1页

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7页

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1919年12月2—4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60页

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通过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群众，然后是农民群众，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做到把

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

列宁：《党内危机》（1921年1月19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页

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1905—1906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锻炼、教育、改造旧社会遗留给无产阶级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分子。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改造这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影响他们，而不是他们影响无产阶级。

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发表于1909年9月11日（24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49页

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1921年3月8—1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83页

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善于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本阶级而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

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极少数工人贵族、以前的工联主义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部分抵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5页

如果说不需要共产党，那就等于说无产阶级的斗争可以不要有专门研究斗争条件和拟定斗争方法的司令部和领导核心，就等于说没有司令部比有司令部要战斗得好，这样说是愚蠢的。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发表于1921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58页

3
1
十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工人阶级要取得和实现本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统治**。全体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过渡时期实行**统治**，来彻底消灭阶级，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把被资本主义折磨、压迫和分散的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工人的周围，同他们结成最紧密的联盟。

《列宁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1918年9月17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78页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样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它能领导分散的农民，并且经得起剥削者的一切进攻。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帮助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团结

起来，彻底捍卫和巩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52页

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7页

农民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朋友，是工人在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中最忠实的同盟者。作为劳动者，千百万的农民大众是支持一二十万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并由几百万有组织的无产者所组成的国家“机器”的。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页

巩固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同城市无产者的联盟。为了这个联盟，我们要马上使**人民得到完全的政治自由，使农民得到完全的平等权利和消灭农奴制盘剥。**而当这个联盟建立和巩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戳穿资产阶级用来诱骗中农的各种东西，那时候我们就能很容易而且很快地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反对政府一切势力而往前走第二步、第三步，直到最后一步，那时候我们就能一直往前走，走向胜利，并且会很快地争得**全体劳动人民的完全解放。**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43页

没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完成的；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千百万受资本主义压制的、受折磨的、不

识字的和分散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完成。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4月17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61页

（五）妇女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那种认为妇女在社会发展初期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我们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所继承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页

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常常对妇女怀着比我们欧洲人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做真正的贵妇人（lady, frowa, Frau＝夫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页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

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页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页

我们看到，各民主共和国都宣布了平等，但是在民法中，在规定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离婚权利的法律中，妇女处处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受卑视的地位。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1919年9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2页

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71页

他[1]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0页

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1]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典时代

① 指傅立叶。——编者注

① 指参加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的女战士。——编者注

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者，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5页

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11月19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2页

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

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11月19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

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女工自己应当关心这种设施的发展，妇女的这种活动将根本改变她们以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地位。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1919年9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3页

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

列宁：《致女工》（1920年2月21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40页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解放运动都不能没有妇女直接参加，因为被压迫阶级在解放道路上每走一步就使妇女的地位

改善一步。在古代的奴隶解放运动和近代的农奴解放运动的队伍中，不仅有男子，而且有妇女，她们是用自己的鲜血保证忠于劳动人民事业的女战士和女烈士。而在现代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即在人类一切解放运动中最深刻最强大的解放运动中，不仅产生了女英雄和女烈士，而且产生了在无产阶级的共同旗帜下胜利斗争的千百万劳动妇女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

斯大林：《致山民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21年6月17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8页

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劳动妇女，一切被压迫者中最受压迫的劳动妇女，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站在解放运动大道的旁边。

斯大林：《庆祝国际妇女节》（发表于1925年3月8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3页

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是工人阶级最大的一支后备力量。这支后备力量足足占全体居民的半数。妇女这支后备力量是拥护工人阶级还是反对工人阶级，——决定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败，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胜败。

斯大林：《庆祝国际妇女节》（发表于1925年3月8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3页

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页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8页

在工资还没有废除以前，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终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要求。

《恩格斯致盖·吉约姆-沙克（1885年7月5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2页

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别的保护，使之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争取妇女的形式上的权利的英国妇女，竟主张让妇女和男子受资本家同样厉害的剥削，她们自己多半同资本主义对男女劳动者的剥削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我承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的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于关心两性在形式上的绝对平等。

《恩格斯致盖·吉约姆-沙克（1885年7月5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2页

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恩格斯致盖·吉约姆-沙克（1885年7月5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2—453页

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8—49页

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开始了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更确切地说，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页

妇女要是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总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与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1919年9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2页

尽人皆知的女性的多愁善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妇女所具有的阶级痼疾。

《恩格斯致娜·李卜克内西（1877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62页

妇女在战争条件下也能从事劳动，例如支援军队，在军队中进行鼓动。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1919年9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4页

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使妇女获得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她们不

要做“家庭奴隶”，不要永远把自己仅仅限制在作饭和照料小孩的圈子里（这会使她们愚钝和受人鄙视）。这就是主要的任务。

列宁：《迎接国际妇女节》（1920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75页

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生活而不把妇女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是不行的。因为占人类半数的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着双重的压迫。女工和农妇受着资本的压迫，此外，她们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处于不完全平等的地位，因为法律不允许她们同男子平等，这是第一；第二，——这也是主要的——，她们仍然受着“家庭的奴役”，仍然是“家庭的奴隶”，她们被最琐碎、最粗重、最辛苦、最使人愚钝的厨房工作及一般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1921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3页

在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里，要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特殊的素养，因此，甚至在最先进、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自从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被消灭、地主资本家政权被推翻以后，政治任务对于劳动群众和劳动妇女，已经是一种简单明白、大家完全能参与的事情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她们是极少参与政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劳动者的政权，有了劳动者的政权，政治的首要任务就同劳动者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一方面，不仅需要党员女工和觉悟的女工，而且需要非党

女工和觉悟最低的女工都来参加。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1919年9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3—74页

哪里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那里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可能有男女的平等。

哪里没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哪里是由没有这些剥削者参加的劳动者的政权建设新生活，那里在法律上就有男女的平等。

列宁：《致女工》（1920年2月21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9页

有人说，妇女的法律地位最能表明文明程度。这句话很有些道理。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真正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列宁：《迎接国际妇女节》（1920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74页

女工和农妇中间的**组织人才**比我们知道的要多许多倍，他们善于举办有很多工作者有更多消费者参加的实际事业，而没有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或幼稚的“共产党员”所常“患”的那些毛病：爱讲空话，无事忙，好争吵，空谈计划、体系等等。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19页

妇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埋没这支力量就是犯罪。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2月19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02页

妇女占我国人口的半数，她们是一支劳动大军，并且她们负有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即我们的将来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让这一支劳动大军过着愚昧无知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欢迎劳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欢迎她们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认为这是我国文化水平提高的明显标志。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48页

（六）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十二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二百四十英镑；根据一位科学界权威赫胥黎教授的估计，这种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它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

做它的工作；它象密尔顿写他的《失乐园》一样所得的报酬只是几英镑；它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刚愎自用，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4—415页

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我们发号施令，我们要永远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武器。

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行动的。**从自私自利**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果戈里笔下的那类神甫、录事和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农奴制也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而且一定会粉碎他们的反抗。**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所加到劳动者肩上的那种伟大的、真正豪迈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安慰自己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的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教养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

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从事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94—395页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7年11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3页

从全国观点看来，一个模范县和一个模范乡的工作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军事上，例如在最后一次抗波战争期间，我们未曾害怕违背官僚主义的等级制，我们未曾害怕“降低官衔”，未曾害怕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仍保留他们在中央的高级职务）调到下层去工作。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把全俄中央执委行员会某些委员或部务委员会某些委员或者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们，调到甚至是县里，甚至是乡里去工作呢？的确，我们并没有“官僚化”到这样的程度，调到下面去就“感到难堪”。而且我们这里可以找到几十个乐意担负这种工作的中央工作人员。我们这样做了，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成绩，因此，模范乡或模范县所起的作用不仅会是巨大的，而且简直会是

有决定意义的，有历史意义的。

列宁：《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31—532页

如果没有劳动群众的直接支持，单靠指挥人员的力量是不能建设新社会的。

斯大林：《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1925年4月15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72页

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人赐给人类的现成制度。社会主义是目前无产阶级**为了**达到根本目的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天的目的走向明天的目的并且逐渐**接近**根本目的的斗争。

列宁：《谈话》（1913年3—4月）。《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页

现在的任务，就是用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实践**来证明工农政府的生命力。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生气勃勃、真诚正直的农民，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一定会用全副精力在实践中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历史问题。

干起来吧，大家都干起来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应当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再版序言》（1917年11月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94页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精神之下，才能

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94—495页

工人们自己在创造社会主义，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我们是在这个实践中学习，并为正确地干革命的艺术打下基础。

列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64页

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它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斗争方式，重新部署我们的力量，改善并巩固我们的一切组织。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265页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即对少数居民实行镇压，同时，它又**充分**发扬民主，也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加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

《列宁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页

这个力量依靠什么呢？依靠人民群众。这就是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统治人民、统治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统治少数人，统治一小撮警察暴徒，统治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僚的政权

机关。这就是统治人民的专政同革命人民的专政的区别，布兰克先生和基捷韦帖尔先生，请好好记住这一点！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狡猾手段，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于政权之外，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它是靠欺骗来维持的。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5—316页

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使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这应当由非党工人来做，应当让他们在非党工农代表会议上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做。要帮助那些负担重得受不了的共产党员。我们应该尽量把工人和农民输送到这种机关中去。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起来，把它做好，把官僚主义赶出我们的机关。必须让广大的非党群众来检查一切国家工作，学会自己管理国家。

列宁：《在布拉古舍-列弗尔托沃区非党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2月9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18页

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当着群众的面办理一切事情，群众很容易接近它；它是直接在群众中产生的，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6页

我们现在应当回顾一下过去，从这种建设中得出总的教训，加以领会，并把它更广泛地灌输到劳动群众中去。这个教训就是：只有让工人参加国家的整个管理工作，我们才能在这样难以

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坚持下去，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会得到完全的胜利。我们应当吸取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正确地对待农民，正确地对待千百万农民群众，完全是由于这样做了，我们才顺利地克服了各种困难，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不断地取得胜利。

列宁：《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1919年11月7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8—109页

改善国家机关，认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使国家机关成为同广大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群众本身对国家机关的经常和积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到管理机关中来，不建立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最“下层”的直接联系，要得到群众积极的和不断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3—134页

群众自己的朝气蓬勃的、强大的运动会象清除毫无用处的腐败东西，把杜撰的、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方案一起清除掉，自己则永远一往直前地前进。

我们亲眼看到的规模壮阔的运动的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

列宁：《生活在教导人们》（发表于1913年1月19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518页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4页

工人监督应当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府必须实行的第一个基本步骤。我们没有下令立刻在我国全部工业中实行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工人群众的威信已经树立，社会主义才能够形成和巩固。不然社会主义就不过是一个愿望。

列宁：《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11月6—9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3页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算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觉自愿和诚诚恳恳地实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96页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让工人们建立起自己监督自己工厂的制度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磅粮食都应当统计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统计。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7年11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

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7页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92页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页

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页

城市工人的生活比农民的生活坏得不可比拟，他们却首先开始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如果你们能估计到这点，那末我深信，在你们全体一致支持之下，我们一定会使现有的几千个公社和劳动组合每一个都成为在农民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的真正苗圃，都用实际行动来向农民表明，虽然它们还是嫩弱的幼芽，但毕竟不是人工制造的，不是温室里培植出来的，而是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真正幼芽。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巩固地战胜旧的愚昧状态，才能战胜破产和贫困，只有那时，我们才不会害怕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

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12月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114页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稀罕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所说的那样）。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6页

只有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潮和劳动热情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如果没有这种增长，社会主义在我国就不能最后战胜资本主义。

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1929年11月3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327页

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

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6页

不夺取银行，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但是不对全体人民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来的生产资料组织民主管理，不吸收全体劳动群众，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来民主地组织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力量和参加国家的管理，就不能实现这些革命措施。

《列宁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页

现在展现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是已经变成全民财产的国土，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根据社会主义原则组织新的生产和消费。……劳动人民一定能完成这一宏伟的历史任务，因为在他们身上蕴藏着尚未苏醒的伟大的革命、复兴和革新的力量。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452页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1918年3月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83页

我们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

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96页

工会成了新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只能是千百万群众。如果农奴制时代的社会建设者是几百人，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是由几千人或几万人建设起来的，那末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几千万人积极地、直接地、实际地参加国家管理才能完成。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4页

推进我国工业，提高工业生产率，造就新的工业建设干部，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积累，合理地使用积累来满足工业的需要，建立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整顿国家机关，使它精简廉洁，清除国家机关在我国建设时期所沾染的恶习和污秽，经常对贪污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人作斗争，——所有这些任务，如果没有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直接的和经常的支持，任何政党都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任务就在于吸引千百万非党工人群众来参加我国的全部建设工作。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7页

无产阶级**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管理国家，**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建设工业，**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能够**不顾资本主义包围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发表于1927年11月6—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204页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4页

（七）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97—198页

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的最根本的基础，它**归根到底**总是决定着政治派别的划分的。但是这个根本的基础，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历史发展的参加者和创造者的觉悟程度的高低而显露出来的。这个"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有时通过长期的、顽强的、以数年和数十年计算的斗争——这个斗争，有时剧烈地表现为各种政治危机，有时沉寂下来，好象暂时停止了——才得以实现。

列宁：《革命青年的任务》（发表于1903年9月）。《列宁全集》第7卷第31页

第一、这就是说，党应当倾听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群众的革命本能，应当研究群众的斗争实践，并根据这些来检查自己政策的正确性，所以它不仅应当教导群众，而且应当向群众学习。

第二、这就是说，党应当每天每天取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应当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博得群众的拥护，党不应当命令群众，而首先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易于根据本身经验来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所以它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

违背这些条件就是破坏先锋队和本阶级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就是损害"相互信任"，就是既破坏阶级纪律，又破坏党的纪律。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25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143页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99页

共产党员（也和一般顺利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一样）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

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3页

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1871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78页

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每个时代都需要并会造就出自己的伟大人物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

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和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446页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异族统治的时期，也给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脸谱，其中有两个经过特别刻画的类型：斯加纳列尔和杜尔卡马腊。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编者序言》（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页

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强大，正在于它有无尽的泉源。我们知道，它使一批批的人涌现出来，去接替忘我地献身革命并在斗争中牺牲的人们。这些人刚踏上路途时也许经验较少，知识不够，修养较差，但他们与群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选拔很多人材来接

替去世的伟大天才，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开始的事业。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72页

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使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有了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环境、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69页

（二）历史人物是一定阶级的代表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83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3—84页

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344页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208页

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

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3页

“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389页

如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严峻客观地分析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那末凭着什么奇迹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活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3页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0页

坚定的方针、勇气和决心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能够表现勇气和决心的那个阶级的问题，这样的阶级只有一个，就是无产阶级。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发表于1917年9月27日〔14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363页

（三）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71—372页

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那末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种队伍，因为这种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无限的信任。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3页

“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

列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发表于1901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283页

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

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

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变革，那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并不会这样合适，不会这样“方便”。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

列宁：《“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发表于1905年10月17日〔4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53—354页

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相当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4月底）。《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4—105页

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夺取政权，可以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和夺取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夺取政权以后，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吸引愈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

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7页

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4页

路德维希：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而你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

斯大林：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① 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

① 指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妄想恢复中世纪骑士制度，是一个脱离实际，到处碰壁，复古倒退的典型。——编者注

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至少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这样了解马克思的。而我们研究马克思已经不止十年了。

路德维希：大约在三十年前，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许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信徒的德国教授向我们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的作用，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斯大林：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35页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51页

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精力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就会束手无策。

……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参见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页

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列宁：《两次留声机片录音演说》（1920年3月底）。《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2页

（四）无产阶级领袖的重要作用

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1921年8月14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5页

革命领袖的职责是引导群众走向革命，是在工人武装和德国革命的影响能够立刻解决问题的时候不错过时机。

列宁：《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1919年9月20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8页

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的顽强的斗争以争取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

列宁：《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8页

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5页

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

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1—602页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

《恩格斯致约·贝克尔（1884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9—450页

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10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4—425页

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

正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注

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① 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德国的现代经济学派只有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他一点东西（常常抄错了），才可以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0页

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经济制度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编者注

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8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7页

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态度，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0页

在1864年，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团结了各国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3页

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总是始终不渝地在“矫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

列宁：《〈约·弗·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6日〔1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9页

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年来考察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期的分娩痛苦，经过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团结全世界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年1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3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首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03页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列宁，也只有列宁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锻炼有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这一事实的原

因之一正应当在这里来找。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发表于1920年4月23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9页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我完全不是想以此说明，列宁对任何革命动荡都同样嘉许，或者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主张革命爆发。完全不是。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列宁的英明远见在任何时候都不象在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充分和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象鱼在水里一样。"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

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11月1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2页

（五）对历史人物要作全面地历史地分析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

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页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6页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405页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1869年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8—599页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9页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动活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

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

列宁：《哲学笔记》（1914—1916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往往是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名词，把它（**不区分历史时代**）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向导）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生产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8页

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

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发表于1905年1月14日〔1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

把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和垂死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拿来对比，也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

对比一样。这就象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等“资产阶级代表”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等“资产阶级代表”拿来对比一样。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如果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不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做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帝国主义者在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7—628页

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装，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名子，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6页

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21页

评论一个人不是凭他对自己的看法，而要看他的政治行为。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4页

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牺牲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末，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做辩护。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3页

（六）批判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这些人① 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0页

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

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

① 指参加莱茵省议会为贵族等级进行辩论的人。——编者注

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在宣布自己的启示之前，是否受到了某块现实主义的石头的致命打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

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8—329页

这位固执的、高傲的无师自通的学者①，对他以前的一切权威——法学家、院士、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

恩格斯：《蒲鲁东》（1848年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70页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

① 指蒲鲁东。——编者注

决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了解便简单得象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象《魔笛》① 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得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

① 《魔笛》是莫扎特利用爱·施卡奈德尔的歌词谱成的歌剧。——编者注

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所有这些义愤填膺的浮夸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较为隐蔽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6—308页

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6页

第六编　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

一、历史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

历史的发展象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1887年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1页

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关心的是一件事：用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也就证明了另一制度的必然性，证明这种制度必然要从前一制度中生长出来，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33页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

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5页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

排斥的、对立的倾向。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1—712页

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页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页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

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

唯一的历史道路。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 535 页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① 才是停滞不动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108—109页

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他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12 页

① 马克思引自卢克莱修的诗篇《物性论》（第 3 卷第 869 首）中的一句：“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编者注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页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6页

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

会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82页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

决不能认为生活是一种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

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275页

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急的时代中表现得特别显著。在这种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出，总是和一切时代玩弄政治的庸人所愿做的完全不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535页

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6页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在这两个社会①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它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要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唯一可能的和解。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年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02页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页

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

历史表明：所有制形式直接以生产形式为转移，生产形式一改变，所有制形式迟早也必然要改变。有一个时期，所有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当时原始人出没其间的森林和原野归大家所有，而不归个人所有。为什么当时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呢？因为当时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是共同的，集体的，大家共同劳动，谁也离不开谁。后来一个时期，即小资产阶级生产的时期，所有制具有个人主义的（私人的）性质，人所必需的一切（当然空气、

① 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编者注

日光等等除外）都被认为私有财产。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生产已成了个人主义的生产，每个人都藏在自己的角落里开始为自己而劳动了。最后，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成百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个场所、一个工厂里一起劳动。在这里，已看不见旧时那种自顾自、各干各的情形了，在这里，每个工人和每个车间所有的工人，在工作方面和本车间的工友、和其他车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只要某个车间停顿下来，整个工厂的工人就会无事可做。由此可见，生产过程、劳动已经具有社会性，已经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不仅个别工厂的情形是如此，整个生产部门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情形也是如此：只要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生产就会陷于困难的境地；只要石油和石炭的生产停顿下来，很快就会有整批的工厂关门。很明显，在这里，生产过程已具有社会的集体主义的性质了。既然占有的私人性不适合生产的社会性，既然现代集体主义的劳动必然引向集体所有制，所以不言而喻，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正象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

历史就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9—310页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

人中间，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末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174页

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

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9页

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得以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120页

我不仅把**大工业**[①]看作是对抗的根源，而且也看作是解决这

① 指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编者注

些对抗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创造者，当然，这种解决不可能走**平静舒坦的道路**。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3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8页

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而实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也是经常引起分歧的一种根源。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但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又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一方面启发着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纪律性，另一方面又压制和压迫工人，使他们退化堕落，受穷受苦等等。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能够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这种矛盾，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种矛盾。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发表于1910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3页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

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

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0页

代表大会（以及党）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事实，本来不仅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危险，而且甚至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恰恰相反，俄国（而且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中最近十年来的事实，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这样的划分。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列宁全集》第7卷第338页

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恩格斯致爱·伯施恩坦（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59页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3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

黑格尔指出：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

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每一个人，只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

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驰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总之，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象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就是说，只要了解和重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在这个时代里，蒸气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每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仅仅由于这个问题①的正当解决会引起欧洲战争而害怕提出这个历史性的问题。

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1853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7页

二、历史矛盾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50页

① 指土耳其问题。——编者注

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 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集中成群，因此，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适应于这种趋势，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换句话说，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0—1001页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

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年7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0页

克拉科夫起义的纪念日不仅是悲痛的日子；对我们民主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庆祝的日子，因为失败本身中就包含着胜利，而且这一胜利的果实我们已经巩固地取得，失败只是暂时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5页

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3页

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1]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页

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战争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已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即它已为社会主义直接打开了大门。

列宁：《为了面包与和平》（1917年12月14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5页

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芯一样。

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1848年11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7页

大的意见分歧有时是由很小的、甚至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发展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一生中总要有几十次小的

① 指巴黎公社。——编者注

创伤或者擦伤的，但是，如果伤口化脓，如果引起破伤风，这种小小的创伤也会变成最危险的病症，甚至是不治之症。在一切冲突中（甚至在纯粹个人的冲突中）常常是这样。在政治上也常常是这样。

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全部政治大厦，足以造成——用布哈林同志的比喻来说——火车的倾覆的话，那末这种分歧就可能变成有政治危险的东西。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31—432页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4页

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同时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0—181页

反动势力愈猖獗，实际上它就愈是阻碍必不可免的经济发展，就愈是有效地促进更广泛的民主运动的高涨。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5页

三、历史的发展是按螺旋式前进的

（一）历史运动中的进化和革命

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比通常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4页

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

“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个时机，无产阶级的策略都应估计到人类历史的这个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谓“和平的”龟行的发展时代来加强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完全引向达到这个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实际解决伟大的任务。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2—603页

革命本身，也决不能想象为单一的行动（纳杰日丁之类的人大概觉得就是这样的），而应当看做是比较激烈的爆发时期和比较沉寂的平静时期的几次迅速交替的过程。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84页

在革命时期，**决不能**仅限于规定**当前的**政治任务，所以不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在这样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基本**任务被提到首位，需要对它们进行详尽的分析，这是不同于“和平的”和细小的宪制建设时期的。第二、在这样的时期，规定**当前的**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可能而且必然会发生突然的转折、急速的转变、意外的情况和剧烈的爆发。

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发表于1907年3月4日和25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196页

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

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它们的使命就是用暴力消灭旧生产关系。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56页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程，看作量变不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31—632页

达尔文主义不仅摈斥居维叶的激变，而且摈斥包括革命在内的、按辩证法来了解的发展，但从辩证方法观点看来，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质变乃是同一运动的两个必要形式。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5页

运动有两种形式，即进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

当进步分子自发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

当这些进步分子联合起来，抱着一个共同思想向敌人的营垒冲去，以期根本消灭旧制度，使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

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

（二）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

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1918年3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92页

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3年3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60页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6页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9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607页

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

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象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314页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自然，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这样不喜欢资产阶级统治。当洋洋得意的当代“办事人物”①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的时候，我们就在德国首先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

但是我们向工人和小资产者说：宁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受苦，也不要回到已经过时了的旧社会去！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

① 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共产主义者称为“冷酷的理论家”，而把自己叫做“办事人物”。——编者注

会以自己的工业为建立一种使你们都能获得解放的新社会创造物质资料，而旧社会则以拯救你们的阶级为借口把整个民族抛回到中世纪的野蛮状态中去！

马克思：《孟德斯鸠第五十六》（1849年1月20—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30页

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毛病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农奴制颠覆后过了半世纪，俄国农村仍有不少的农奴制残余。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后过了半世纪，那里的黑人往往还处于半奴隶状态。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页

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51页

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风顺，只有各国无产者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证，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宽阔、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暂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围困在碉堡内”，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会在实际上常常滚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阵营，象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虽然少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92页

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选择直接的道路还是曲折的道路的问题让斗争着的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解决不了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考虑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对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应该善于向群众解说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象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官方警察的历史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走直线一样。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15—716页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同它对妥协的态度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绝对否定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不会掌握这个矛盾（似乎是矛盾），谁就是丝毫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16页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

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5页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94页

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

列宁：《论妥协》（1917年9月1—3日〔14—16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99页

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4月1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2页

不能把革命运动看作一直上升的运动。这是对于革命的一种

书本上的非现实的想法。革命总是曲折地进行的，它在一些地区里实行进攻并破坏旧秩序，在另一些地区里却遭到局部失败并实行退却。蒋介石的政变就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曲折之一，这一曲折是必要的，因为借此可以把一切肮脏东西从革命中清洗出去，并沿着强大的土地运动的道路把革命向前推进。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4页

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继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经过进攻和退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的。在发展进程中来潮和退潮锻炼了革命力量并且准备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5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78页

要知道，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样样向上的。不，同志们，我们还有阶级，我们国内还有矛盾，我们有过去的东西，我们也有现在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这种种东西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波浪上一帆风顺地前进。我们是在斗争中、在各种矛盾的发展中、在克服这些矛盾中、在发现和消除这些矛盾中前进的。

只要还有阶级，我们就永远不能说：好，谢天谢地，现在算是万事大吉了。同志们，这种情形我们是永远不会有的。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1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3页

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发表于1927年11月6—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207页

四、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实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1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0页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87页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

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2页

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

恩格斯：《爱尔兰史》（1870年5月—7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0—571页

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宾夕法尼亚

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象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房屋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年7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5—276页

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的整个战斗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负有在运动中起极重要作用的使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掉外国服装。它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占绝大多数的而且是本地人的美国人靠拢。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1887年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2页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1869年3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2页

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都在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预备学校，以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但是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发

展过程。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5页

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3页

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4页

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1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2页

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国家劳动公社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

映出来。这种多样性愈是丰富（当然，不是标新立异），我们就能愈可靠愈迅速地达到民主集中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经济。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3月28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1页

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虽然有上述条件的差别，但是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8页

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个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它们的发展规律无疑是共同的。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拿来作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以互相比较。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7页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一致需要的托拉斯和银行，甚至在现代帝国主义条件下，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也具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至于美、英、法、德等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基本上相同，但它的形式是更加不一样的。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

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因为这顶多不过是苏兹达尔城的蹩脚绘画罢了。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五、历史发展的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

体现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相反，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只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我们在这里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49页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持久，这样有力，这样强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

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终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6页

实际上，专制制度也好，君主立宪也好，共和制也好，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而且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一方面，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要经过它的阶级内容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另一方面，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本身）丝毫也不消灭从前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不过形式是改变了。

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发表于1909年1月7日〔20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310页

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视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7页

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页

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内容**，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相当迅速地**发生变革。”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仿佛没有形式的内容是可能的，象沙·哥·梦见的那样（见《号召报》创刊号《一元论批判》一文）。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因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始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个内容，于是新的内容“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例如现在具有**私人**性的产品占有形式不适合于生产的**社会**内容，而现代的社会“冲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292页

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能想象的，这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现有的形式**永远不会完全适合于**现有的内容**：前者落后于后者，新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包藏在旧形式中，因此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也表现在这一点上。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1页

问题不仅在于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虽然这种形式是极大的革命成果。问题首先在于苏维埃的工作内容，问题在于苏维埃的工作性质，问题在于苏维埃究竟是由**谁**领导的，——是由革命者领导的还是由反革命分子领导的。正因为如此，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表示反对苏维埃的。

斯大林：《关于农村工作》（1933年1月11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484页

问题不仅在于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本身，而且首先在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内容，——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由**谁**主持，集体农庄由**谁**领导。

斯大林：《关于农村工作》（1933年1月11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485—486页

六、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

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种规

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认识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在这个生产形式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力量，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

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

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只要你作为一个党的代表出现，你就要被卷到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必然性的旋涡里去。只有采取自主态度，实质上比其他人更革命，才能至少在一段时期对这个旋涡保持独立，当然最后还是要被卷到旋涡里去。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10页

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

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在第二卷[①]中，我们对于这个流通领域当然只能就它所产生的各种形式规定进行说明，论证资本的形态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看，这个领域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6页

①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编者注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他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马克思万分确定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其所以是新东西，是因为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须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须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的东西的那个制度的优越性，只须指明这个理想制度的适合“人类天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做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各国和非欧洲各国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客观分

析(他指明了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后裔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类天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25页

战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宣扬爱国主义、博爱与和平并不比机会主义者差）所认为的"罪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与和平一样，是**资本主义**生活的合乎规律的形式。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发表于1914年11月1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页

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4页

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

列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1914年末或1915年初)。《列宁全集》第38卷第434页

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3—4页

七、历史运动的因果关系

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0页

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页

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们对于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9—100页

因果性问题对于确定任何一种最新“主义”的哲学路线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54页

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的主观主义路线，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然界分隔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休谟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论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56页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0页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在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抓

住、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 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0页

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 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8页

因果性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表现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 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8页

接着就讲到历史问题。历史上常有人搜集了许多奇闻轶事当做大事件的小“原因”，——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导因，只是一种外部刺激，《事件的内在精神完全可以不需要它》。《因此，把历史描绘成阿拉伯式的图案画当然是显得巧妙的，因为阿拉伯式的图案画上面就是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但是，这样来解释历史是非常肤浅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 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9页

我们大家很清楚地知道，现在不仅俄国一国，而且世界各国都有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低落的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破产和贫困，愤恨和疲乏，疾病和饥饿。最后这点最为重要。饥饿，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

高劳动生产率。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页

八、历史上本质关系往往隐藏在现象形态的后面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

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十六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末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89年12月—189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页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现象是本质的显现

《……本质表现在现象中，因此，现象不单纯是某种没有本质的东西，而是本质的显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4页

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 9—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页

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 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4页

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Scheinen)。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 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7页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果的客观政治环境。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190页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

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3章所列举的集团和派别）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少的时间内，很快地就揭露了它们的原形。

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发表于1914年6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9页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了；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揭穿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虚伪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正视社会主义中两派的斗争，必须充分考虑这个斗争的问题。

列宁：《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1915年6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243页

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

列宁：《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发表于1914年5月13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94页

每一个强盗[①]都硬说鼓舞着他的是人民的福利，实际上他是

① 指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德等帝国主义。——编者注

为了把自己的钱袋装得满满的。

列宁：《在索科里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9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34页

科学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9页

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96页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

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74 页

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 4—5月间）。《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217 页

现在最危险的自我欺骗（有时简直是愚弄工人），就是德国的“独立党人”领袖们和法国的龙格派等等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在继续推行着那种旧的惯用的政策，即向机会主义作大大小小的让步，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态度，盲目服从资产阶级民主（即他们所说的“彻底民主”或“纯粹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等等的偏见。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 16日）。《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138—139页

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

口号；当时，社会革命党人和所有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运用了仿佛是为维护苏维埃政权而起义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白卫分子都会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甚至装扮成最左的共产主义者。

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1921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78—479页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发表于1913年3月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9页

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924年1月16—18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

资产阶级外交家在准备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高喊“和平”和“友好关系”。如果有哪一个外交部大臣开始为“和平会议”奔走呼号，那末你就应当知道“他的政府”已经定购了新的无畏舰和单翼飞机。

斯大林：《彼得堡的选举（圣彼得堡来信）》（发表于1913年1月12日〔25日〕）。《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74页

这些寡廉鲜耻的帝国主义者和穷凶极恶的反动派仍旧披着

“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外衣，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欺骗人民和愚弄头脑简单的人，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掩盖自己的强盗帝国主义的本质。

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1941年11月6日）。参见《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0年版第26—27页

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1页

这位道貌岸然的君子到处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的最忠诚的先进战士，暗地里却密谋篡夺整个领导，并通过自己亲信的耶稣会兄弟，把广大工人群众当作一群盲从的牲口牵着鼻子走！如果人们容忍这种情况，那我是连一天也不会留在国际里的。当巴枯宁的绵羊，这可办不到！我们揭露了这件事，而且声言要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揭发，这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7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99页

考茨基善于用漂亮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使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在口头上，在人民、群众和工人面前，是社会主义和革命性；在事实上，却是休特古姆主义，即在一切严重的危机关头投靠资产阶级。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5页

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6页

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蜜的考茨基的意图如何善良，但是他那个“理论”的客观的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36页

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

《列宁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1909年8月24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1页

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的”（不要笑！）思想体系。为了使偷运的程序“极为平安地”进行，所有这一切当然（呵，当

然！）都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1页

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参见1953年版第12页

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衣袋里装着党证，所以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异己分子。如果说旧的暗害分子公开反对我们，那末，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则是向我们的人献媚，夸奖我们的人，拍他们的马屁，以便骗取信任。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参见1955年版第16—17页

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同时，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处心积虑地保持缄默，绝口不提还存在着另一种过火行为，更危险和更有害的过火行为，即同富农结合，迁就农村富裕阶层，用右倾分子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党的革命政策。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2页

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

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4—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

当马克思发现有人对他搞秘密阴谋时，他正是采用这个最强有力的而且是他最经常采用的手段之一：把他的对手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对他们展开进攻。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90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88—389页

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苏维埃共和国主要的和唯一严重的敌人。如果没有协约国（英、法、美）帮助，他们早就完蛋了。由于协约国帮助，他们才成为一种力量。他们总是欺骗人民，有时装扮成“民主”、“立宪会议”、“民权”等等的拥护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甘心受他们欺骗。

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919年7月3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页

司徒卢威先生们虽然承认革命，但是立刻就一次又一次地露出马脚，又唱起陈词滥调，说什么可能达到和平的结局，说尼古拉将召请解放派先生们上台执政，如此等等。解放派先生们承认革命，目的是要比较安全地驱除这个革命，出卖这个革命。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5页

九、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折衷主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

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做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241页

它[1]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

① 指机械唯物主义。——编者注

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他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他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8—419页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相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首要性和次要性；可是，同时它又是一个两面的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观点加以观察；为了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在全部结果尚未能综合出来以前，甚至必须分别按两种观点一一地加以研究。但是，如果我们片面地抓住一个观点，认为比起另一个观点来它是绝对的观点，或者，如果我们根据推理的一时需要而任意地从一个观点跳到另一个观点，那我们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的片面性；我们抓不住整体的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尤其是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

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时还应加上物质电理论）的最新发展；(2) 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3) 旧唯物主义者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了解为（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2页

在许多愿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的全部特点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在两者之间安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名词：“飞跃”（有些记得恩格斯著作的片断的人，还补上更加意味深长的一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大多数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他们只“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认真钻研过问题，都不善于思考：社会主义的这位导师所说的“飞跃”，是指全世界历史的转变关头，并且这种飞跃往往包括十年或更多的年代。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25页

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

①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

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页

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50页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88页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耍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1页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

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在政治和经济的例子上我已经指出过这一点。

在“缓冲”的例子上，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党的列车有倾覆的趋势，那末缓冲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一点无可争辩。而布哈林是用折衷主义的态度提出“缓冲”的任务的，他从季诺维也夫那里抽了一点，又从托洛茨基那里抽了一点。作为一个“缓冲者”，布哈林本来应当独立地确定，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犯了错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还是犯了政治上不策略的错误，是犯了派别性言论的错误，还是犯了夸张的错误，等等，然后再**全力**来抨击**每种**错误。但是布哈林并没有了解他自己的这种“缓冲”任务。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49—450页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42页

在形而上学看来，世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它是由某个人或某种东西永远确定了的，所以形而上学者一开口就是“永恒的正义”和“不变的真理”。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0页

辩证法是在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成熟的，它在这个斗争中博得了光荣……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9页

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2月7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页

十、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拒

（一）新生力量必然战胜腐朽力量

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国际①所遭到的各国政府的迫害，同古罗马时代第一批基督徒所遭到的迫害很相似。起初这些基督徒也是人数不多，但是罗马贵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获得成功，罗马帝国就要灭亡。

① 指第一国际。——编者注

古罗马时代的迫害没有挽救了帝国，而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2页

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1页

随着资产阶级及其食客们的反抗的加强，无产阶级和同它联合在一起的农民的力量也在增长。随着被剥削者的敌人——剥削者反抗的加强，被剥削者也在壮大、成长、学到本事，并且从自己身上抛掉雇佣奴隶制的“旧亚当”。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91页

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而

且一定会粉碎他们的反抗。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94页

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工人们的每一次失败都推动更多的战士参加战斗，都促使更广大的群众觉醒过来，走向新的生活，准备新的斗争。

列宁：《五一节　传单草稿》（1904年4月）。《列宁全集》第7卷第187页

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发生了自己的作用，它已成为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进行鼓动的有力工具，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另一批新的人又带着新的力量站到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而战的战士队伍里。斗争不可能没有牺牲。对于沙皇强盗的野蛮迫害，我们镇静地回答说：革命者牺牲了，——但革命必将胜利！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底）。《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3页

不论革命如何困难或可能遭到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4—5月）。《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7页

每一步都可以遇到人类完全能够立刻解决的任务。资本主义妨碍着。它积聚了堆积如山的财富，但又把人变成了这些财富的奴隶。它解决了极复杂的技术问题，但由于千百万人的贫困和无知，由于一小撮百万富翁的蠢笨和贪吝，它又阻止了技术改良的实现。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明、自由和富裕，常常令人想起饱食终日的富人，他们在活活地腐烂下去，而又不让年轻的东西生存。

但是，年轻的东西不顾一切地在生长，并且一定会占上风。

列宁：《文明的野蛮》（发表于1913年9月17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89页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横行霸道，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16页

尽管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肆意横行，尽管他们放逐、监禁、甚至杀害斯巴达克派和布尔什维克，这一切再也不能帮助他们了。这只能使群众受到教育，使他们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34页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挽救资本主义的崩溃，能够阻挡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给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贺词》（1921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88页

现在，世界历史在飞快奔驰，用无比沉重的铁锤和空前巨大的危机摧毁一切习惯了的旧东西，使任何根深蒂固的偏见都站不住脚。

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10页

在共同的斗争中，资本的枷锁一定会被打得粉碎，社会主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04页

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9页

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

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生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易地生长起来的，它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

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基础。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1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3—284页

辩证方法说：只有天天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不倦地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阶级才会始终是进步的，才能粉碎奴役的枷锁。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2页

辩证方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31页

（二）反对因循守旧，支持新生事物和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

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的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15页

各地都在培养那些经受过内战和贫困考验的新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至于经常不断地把这种力量从下面提拔上来，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够。这一点是可以而且必须更广泛更坚持地做下去的。

列宁：《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31页

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部队内部的**日常生活**，而这方面新鲜事物最多，最需要注意、宣扬和社会批评，最需要指责坏人坏事，号召向好人好事学习。

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多**检查**这种新事物含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发表于1918年9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02页

有这样的历史时机，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关；也有另一种时机，即在破坏已经足够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此外还有一种时机，这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旧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26页

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9页

任何人只要多少能够从历史上来观察事物，就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目前的紊乱状态是过渡状态，是从旧到新的过渡状态，是新事物不断成长的状态。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3月28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2页

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发现这些质朴的不知名的新人材是不容易的。吸收那些长期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和恐吓的普通工农来参加国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我们应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这种不容易的工作，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生力量。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7页

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怎样**正确地**使用新党员。这个任务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任务，靠老一套办法是解决不了的。

资本主义扼杀了、压制了、摧残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在贫穷困苦、人格遭到侮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善于找出这些人才，让他们担任工作。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新党员，大多数没有经验，不熟悉国家管理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是被资本主义人为地压在**下面**、变成“底”层、没有抬头机会的那些社会阶层当中最忠实、最真诚、最有才能的人，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比别的人**更**有力量，**更**富朝气，**更**纯朴，**更**坚强，**更**真诚。

因此，一切党组织都应当对怎样使用这些新党员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应该**更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应该更迅速地在实践中考验他们。

列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1919年10月2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80—81页

必须更广泛和更大胆地、更大胆和更广泛地、再更广泛和再更大胆地把青年组织起来，**不要对青年存戒心**。目前是战斗时期。整个斗争的结局都将取决于青年，取决于青年大学生，尤其是青年工人。抛掉一切因循守旧、循规蹈距之类的旧习气吧。……必须万分迅速地把一切具有革命主动性的人团结起来和动员起来。不必怕他们缺乏锻炼，不必怕他们没有经验和不够成熟。

《列宁给亚·亚·波格丹诺夫和谢·伊·古谢夫的信（1905年2月11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123页

管理国家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新生力量在迅速地成长，这就是青年工人和农民。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努力学习，吸收由新制度得来的新印象，抛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成见，把自己锻炼成比他们的前辈更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919年7月3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页

罗兰夫人在1793年写道：法国没有人材，遍地都是些侏儒。谁这样说，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谁就是承认自己已被事变弄得眼花缭乱，不是他这个革命者在自己的意识和活动中支配着事变，而是事变支配着他，事变压倒了他。这样的组织家**最好是引退**，让位给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魄力足以补偿日常熟知的那套成规。

列宁：《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发表于1905年3月8日〔2月23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192—193页

人材多得很，只是需要抛弃那些尾巴主义的思想和清规，只是需要让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计划”和“谋略”能自由发展，

那时我们才配作伟大革命阶级的代表……

列宁：《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发表于1905年3月8日〔2月23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193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9页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①叫做愚蠢举动。但当**群众**已经起义了的时候，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训诫他们，向他们打官腔。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胜利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药。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奋不顾身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胜利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察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庸俗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的殊死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0—691页

① 把巴黎公社起义。——编者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拚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写了一些鼓舞工人农民进行斗争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以自由主义的论调大叫其“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因为公社社员表现了如他所说的“冲天”的英雄主义而欢欣鼓舞。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而做出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0—201页

他① 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② “学习”，正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一样，从来不对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本来就用不着

① 指马克思。——编者注

② 指巴黎公社。——编者注

拿起武器”，或策烈铁里所说的“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212 页

应该深入下层，大胆提拔新人。他们还没有受过训练，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会给我们培养出年轻的工作干部，使我们得到大批的年轻的新生力量，……我们只能前进，随时提拔年轻工人，把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安置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上的演说》（1919年 1 月17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 382 页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列宁和这种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宁这样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善于象列宁这样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55页

在我们国家里有成百成千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竭尽全力要从下面冲上来，以求把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入我们建设事业的总宝库。但是他们的努力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常常被文坛"名人"的自负、我们某些组织的官僚主义和冷酷无情以及同辈的嫉妒（它还没有转为竞赛）压抑下去。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打穿这堵死墙，使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得到出路。

《斯大林致费里克斯·康同志（1929年7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03页

大胆而及时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人对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识别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看过去的东西，停滞于过去的东西，停滞于陈旧的东西，而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

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识别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绝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把老干部和年轻干部配合起来，把他们结合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一个总的乐队中的方针。

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及时而大胆地把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95页

（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8页

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

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9页

在革命中，也象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象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8页

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6页

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5页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1872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宁可同肮脏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象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驯服的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这才确确实实称得上英雄。

列宁：《新的激战》（发表于1901年6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11页

迁延、争执、拖拉和犹豫不决，就是起义事业的灭亡。最大的果断性，最大的毅力，立即运用每一个适当的时机，立即燃起群众的革命热情，指引他们更坚决、最坚决地行动，这就是革命者的首要责任。

列宁：《革命军队的任务》（1905年10月底）。《列宁全集》第9卷第411—412页

革命者不是那种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最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动摇的时候捍卫革命的原则和口号的人。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3年6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4页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列宁给中央委员的信(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1页

历史上的伟大战争和革命的伟大任务都是这样来解决的：先

进阶级不止一次两次地进行冲击，取得失败的经验以后才得到了胜利。打了败仗的军队会好好地学习。

列宁：《走上轨道》（发表于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324页

革命总是在实际中、在斗争中、在炮火中受到最严重的考验。如果你被压迫，被剥削，因而想推翻剥削者的政权，如果你决心把推翻剥削者的事业进行到底，你就应当知道，你必须经受得起全世界剥削者的攻击；如果你决心给以回击，不怕牺牲，坚持斗争，那你就是革命者，不然你就会被消灭。

所有革命的历史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4月17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页

工人阶级的决心，它实现自己“宁死不屈”口号的坚决意志，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决定一切、战胜一切的因素。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3月2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67页

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4月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7页

运用**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也就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没有充分准备的组织受到“破坏”。我们以前的宣传小组曾经因为进行鼓动工作而受到破坏。后来，我们的委员会也因为进行示威而受到破坏。任何一次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会使作战队伍受到相当的

破坏。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当作战。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应当学会作战。如此而已。

列宁：《游击战争》（发表于1906年9月3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9页

要是没有我们“敢于”胜利的信心，就根本谈不到努力地和成功地集合军队，领导军队。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98页

假如无产阶级没有决心，不能够为了战胜资产阶级作出巨大的牺牲，那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00页

社会主义从来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是永远不会在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疯狂反抗的条件下实现的。情况愈困难，他们就愈幸灾乐祸，愈起来捣乱；我们愈困难，怠工者愈多，他们就愈愿意走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克拉斯诺夫的老路。所以我们说：不应该按照旧的方式来解决，不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拉着车子前进上山，而不让车子退下山坡。

列宁：《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918年7月4—10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6页

社会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

列宁：《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18年12月14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341页

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发表于1905年9月14日〔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34页

在这样崭新、伟大和艰难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策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惊慌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4月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6页

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和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的。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场所，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克服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68页

即使我们会犯几百次错误，会遭受几千次失败，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应当认识到，我们只有进行无产阶级式的百折不挠的冲击，才能取得胜利。

列宁：《在全俄纺织工业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4月19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3页

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不间断的进攻，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无产阶级斗争也有困难和失败。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些在胜利起义时期表现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胜利进攻时很会打仗，在革命退却时期，在无产阶级失败时期也能够表现勇敢的人，是那些在革命失利时，在敌人胜利时不失去理智、不畏缩后

退的人，是那些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张皇失措、不悲观失望的人。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6页

战争史上还没有过敌人自己跳进深渊的事。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使敌人走向深渊，并且把它推入深渊。只有用自己的力量不断增加的歼灭性打击，才能打垮敌人的抵抗，使我们取得最后胜利。

斯大林：《最高统帅命令》（1944年2月23日）。参见《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0年版第118页

胜利任何时候也不会自行到来，——它要在艰苦的战斗和顽强的劳动中才能得到。注定了要灭亡的敌人正在把他们最后的力量投入战斗，拚命抵抗，以图逃脱严厉的惩罚。敌人正在使用而且将来还会使用最极端最卑鄙的斗争手段。因此，应当记住，我们的胜利愈是临近，我们的警惕性就应当愈高，我们对敌人的打击就应当愈厉害。

斯大林：《最高统帅命令》（1945年2月23日）。参见《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0年版第151页

第七编　研究历史的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指南

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1—472页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

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页

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①。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发表于1910年12月2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98页

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方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什么必须普遍遵行的哲学历史公式，当做一种超过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页

① 参看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编者注

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

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6—587页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几千年或几百年，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联系着的情形，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

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7页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21—26日〕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页

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事件，应当根据**群众**以及各个阶级的运动，而不能根据个别人和集团的情绪。

列宁：《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发表于1912年9月2日和9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7页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应该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

列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发表于1917年9月1日〔8月19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45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21—26日〕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页

在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我们上面摘录的那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稍微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一般的劳动者或一般的工作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全部心理和生活习惯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小业主（他们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心理、同资本家对抗、对立和斗争的大工业中的雇佣工人。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8页

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20—621页

革命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而变化的。任何真

正的革命进步都要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也就是说，要求更清楚地认识阶级利益，更明确地划清各政治党派的界线和更确切地描绘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面貌；也就是说，要求以更加具体的、明确的、各个阶级的不同要求来代替一般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

列宁：《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发表于1907年5月2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393页

要辨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

列宁：《论俄国各政党》（发表于1912年5月10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页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千万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4页

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

列宁：《阶级变动》（发表于1917年7月10日〔6月27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118页

本文一开头即已指出作者① 的论断的基本特点是他的狭隘客

① 指彼得·司徒卢威。——编者注

观主义：只证明过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不尽力揭示这一过程在每个具体阶段上所具有的阶级对抗形式；只是说明一般过程，而不去说明各个对抗阶级，虽然过程就是由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形成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474页

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

谁直接为某种政策辩护，这并不重要，因为在现代崇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大财主都可以随便“雇佣”或者收买或者诱使一些律师、作家甚至议员、教授、神甫等等，让他们来捍卫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是生活在商业时代，资产阶级是并不以买卖名誉和良心为羞愧的。还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不加思索地或者惯于盲目地拥护那些在一定的资产阶级中间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不，直接为某些观点辩护的人是**谁**，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

例如“欧洲”，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现在正在军备上进行疯狂的障碍赛跑。在成千种报纸上，从成千个讲坛上，用成千种调子高喊着、叫嚣着爱国主义、文化、祖国、和平、进步等等，——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要为各种杀人武器、大炮、“无畏舰”（最新型战舰）等等再行支出上千万上万万卢布寻找理由。

对于“爱国志士们”的这些话我要说：公众先生们！别相信

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

列宁：《对谁有利？》（发表于1913年4月11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

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才正是现代整个掠夺制度的基础，正是这种剥削把社会分成了不可调和地对立的阶级，只有采取**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透彻地评价剥削的其他各种表现，而不至于态度暧昧和没有原则性。

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发表于1902年11月1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234页

既然谈到历史，就应该说明各种具体问题，说明各种思潮的阶级根源；谁愿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阶级斗争，研究各个派别在参加布里根杜马这一问题上所发生的斗争，谁就会看出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根源。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发表于1914年5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3—504页

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

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

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2页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提法应该完全不同。他们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到一定阶级的**利益**，因而应当把同样的 desiderata（愿望，要求）表达为某某社会成分所怀抱的、遭到其他某某成分和阶级反对的“愿望”。这样的提法就使人决不可能利用他们的“理论”来发表学究式的、超阶级的议论，来草拟某些保证取得“光辉成就”的方案和报告。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480页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会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现在，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使得生产者不自己起来斗争就

不可能有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378—379页

如果你们没有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当前的主要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它们的政策的本质，那末，事实上你们就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你们就是抛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

列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发表于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485页

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议论的基本错误在哪里呢？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

列宁：《再论杜马内阁》（发表于1906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没有阶级和阶级社会的概念，这些东西都是不够具体的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20年5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页

三、研究历史必须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

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470页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

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592页

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种各样实际干扰，这是在

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工作很快就要结束。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1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82页

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1页

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6年1月20—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4页

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7页

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区别表现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性质上**。民粹派认为要批判资本主义，只须肯定剥削的存在，只须肯定剥削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解释这些剥削现象，把它们连接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即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而这种经济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规律是需要做客观研究的。民粹派认为要批判资本主义只须从自己的理想出发，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出发把它加以

斥责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十分详细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那些阶级，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上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达上，才是有根据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420页

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

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21—26日）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页

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

题，事实却正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怎样搜集事实呢？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呢？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由此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来和一切今天被某些国家所恣意滥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论断比拟。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而且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1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280页

目前，表明俄国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客观**材料愈来愈多了。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收集、核对和研究这些客观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所说明的不是个别人和个别集团的活动和情绪，而是**群众**的活动和情绪。这些材料是从各种**怀有敌意的**报纸上拿来的，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可以**核对**。

只有根据这样的材料，才能学习和研究本阶级的运动。民粹派和取消派以及各种知识分子集团，如“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派，它们的一个主要缺点，甚至可说是最主要的缺点（或者说对工人阶级所犯的罪孽）就是主观主义。他们处处都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估计、自己的“希望”当作工人的意志，当作工人运动的要求。

列宁：《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发表于1914年6月26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384—385页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1920年7月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2—733页

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

四、运用辩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

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1882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63页

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420页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

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

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象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88页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

惊小怪。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86页

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

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和人剥削人怎样产生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出现及其产生的条件的问题）一样，要正确地认识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3—44页

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的。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

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页

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4页

辩证法包括历史性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20年5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页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3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713页

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由于没有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而带有某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参杂其间。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2—643页

辩证法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变动的，自然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风俗习惯在改变，正义的概念在改变，真理本身也在改变……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9页

五、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 2—5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512 页

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 7 月）。《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857 页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列宁：《〈共产主义〉》（1920年 6 月12日）。《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290 页

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 9 月—1878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267—268页

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象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

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123页

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

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8—189页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

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他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96页

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11月—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7—558页

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

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

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

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1869年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600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宁：《游击战争》（发表于1906年9月3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3页

应该记住恩格斯的名言：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

恩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剩余价值是**不公平**

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现在，在二十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不可遏止地向这方面前进的巨大力量。

在评价俄国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也许不仅俄国一国，在二十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都应当这样）。

列宁：《两种乌托邦》（1912年10月）。《列宁全集》第18卷第352页

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一个直接面临的斗争的口号是不能简简单单地直接从某一个纲领的一般口号中得出来的。只根据我们的纲领（见纲领的最后一段：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等等）来直接决定目前面临的即1906年夏天或秋天的斗争的口号，是不够的。为此必须估计具体的历史形势，研究革命的全部发展和整个连贯的过程，不仅仅从纲领原则中，而从运动已往的步骤和阶段中得出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应当作的真正的历史分析。

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7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99—100页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一般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

疲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拿来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02页

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凭空想出”这些形式，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综合、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公式，一切教条方法，而要求细心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越来越新和越来越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限于只是在某一时期可能实行的斗争形式，认为随着一定社会局面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凭空捏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

列宁：《游击战争》（发表于1906年9月3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2—673页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1月30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来衡量的。早一二十年或迟一二

十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略加以计算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极为严重的理论错误。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2页

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

列宁：《论口号》（1917年7月中旬）。《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3页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34页

马克思主义是用历史观点来观察一切事物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农村小资产阶级经济比农奴制经济进步；破坏农奴制经济和实行小资产阶级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资本主义以后又会排除这种小资产阶级经济……

斯大林：《土地问题》（发表于1906年3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04页

你的信无形中是从两个假定出发的：第一个假定认为，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时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第二个假定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

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说，这两个假定都大错特错了。

举几个例子来说。

1.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不可挽救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他们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

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2.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以此为根据，开始要求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消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

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而言的，它不适用于下列场合，即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公式。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会说：这种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必须抛弃其中绝对错误的一个公式，而把另外一个绝对正确的公式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切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而恩格斯的公式则对于下列时期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陆续的胜利将导致社会主

义在大多数国家内的胜利，从而造成实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1973年版第36—38页

六、研究历史要抓主体、抓典型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以畜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之外）。在他们中间出现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决定了。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依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的民族那里，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

位，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象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象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只要不是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带着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110页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

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把自己神话化而同过去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前一个社会，即它还得与之直接

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109页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

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103页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页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5—206页

这幅图画[①]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

显然，这一章里谈的，只是纯粹的、古典形态的采邑；这种采邑当然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并非到处同时出现的形态。可是，只有拿这种纯粹的形态来考察，才能了解这种经济关系的历史表现形态，而罗特的主要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从一切混杂的附属物

① 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中拣出了采邑这种古典形态。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1881—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52页

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七十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做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编者序言》（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1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没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就从商品的分析着手。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8—589页

在解决某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起码的一条就要首先把握住最典型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最不受局外的、复杂的影响和环境的左右，在这个事情解决之后，再深入一步把这些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一一加以考虑。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02年2—3月上半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108页

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49页

在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欧洲的民族只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实现了对殖民地亿万居民的统治。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根本不象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残酷的摧残和屠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了解现代的战争，首先必须对欧洲各国的全部政治作一个总的观察。不应该抓往往容易从社会现象联系中抽出来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个别例子和个别事实，因为相反的例子也是很容易举出来的。应该从欧洲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抓住这些国家整个制度的全部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种制度是怎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这次战争的。

列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73页

七、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结合起来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1858年3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

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

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①，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页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的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宝贵方法，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9页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

① 指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唯心主义曲解的蒲鲁东。——编者注

支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及其一贯的发展，凡是这种对抗为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业已固定的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露。这个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来给以完备的说明，应表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并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5—76页

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11—212页

俄国的半中世纪农业（宗法制的和农奴制的）现在正经历着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五十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俄国经济著作收集了分别说明这一过程的各个特点的大量资料。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地方自治局详尽地、细心地收集来和核对过的大量出色的统计资料进行必要的整理。应当把这些资料整理得能够从中得到正确、客观和以大量资料为根据的答案，来回答这五十多年对俄国经济改革进行的分析工作所提出或发现的一切问题（而目前的斯托雷平土地法令又提出了大量关于俄国革命后的经济的极重要的问题）。

应当把统计资料整理得能够据这些资料来研究旧的农奴制的、徭役制的、工役制的自然经济的破坏过程，研究这种经济被

商业性的资本主义农业所代替的过程。

列宁：《谈谈关于地方自治局统计任务的问题》（发表于1914年1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71页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21—26日）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6页

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2页

马克思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86页

第八编　研究历史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

一、我们的任务是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年3月、5月和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年3月、5月和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要记住一条老规矩：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5年5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0页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

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

就让资产阶级豕突狼奔，暴怒若狂，肆意横行，做出许多蠢事来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把最大的热

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4—255页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① 和革命的"。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即善于客观地表述这个斗争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

---

①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做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列宁原注）

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某一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最后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1—82页

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这样一种问题提法。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1页

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以解释世界为限，而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变世界。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发表于1920年4月23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3页

工人在夺得政权以后不仅能打败资本主义，能破坏旧东西，而且能建设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18—31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0页

二、对历史遗产必须批判地继承

（一）不要割断历史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

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恩格斯致爱·皮斯（1886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① 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5页

我们不预备做历史学家，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过去的一年，我们是把它当作材料，当作教训，当作我们往前行进的跳板看待的。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3月2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8页

机会主义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抓住每一分钟，抓住每个时机，

① 指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编者注

抓住今天，而不能了解“昨天”和“明天”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要求明确地认识到这个联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1911年1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页

（二）要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政治发动。既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7页

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1—592页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7—348页

马克思非常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斥责对革命传统的背叛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分析采用旧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人所共知的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可能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但是，马克思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① 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不同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7月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32页

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5页

在十八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对宗教作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5页

① 指马克思在1870年9月6—9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2页

我们否定旧学校，对旧学校怀着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视那种打破旧学校的决心，但是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死读书、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方式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9页

（三）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122页

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1882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

---

① “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的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规划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3页

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1页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

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1—442页

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等，不管资产阶级哲学家们那些“重新”回到陈旧腐烂的唯心主义去的学说怎样说，却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2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3页

既然在同中世纪封建势力和僧侣势力的斗争中，马克思一方面能够承受并进一步发展“十八世纪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承受并进一步发展十九世纪初期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辩证法），这只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这只是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上**最新成就**

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发表于1914年3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7页

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价值规律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现象，创立了这门科学，由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同前者一起用反封建反僧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丰富了这门科学，由于十九世纪初那些抱有反动观点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进一步阐明了阶级斗争的问题，发展了辩证法，并把它用于或开始用于社会生活，从而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所以说，在这方面获得许多巨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发表于1914年3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8页

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0页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

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8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62页

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辩证方法的时候，通常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的仅仅是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摈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且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2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援引费尔巴哈，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摈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29—630页

三、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促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我们从上面所发挥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①；

（3） 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②，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

① 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编者注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活动的现代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统治……"——编者注

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页

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毫无例外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要透彻地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知道这个问题的

历史。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5页

我们大家经历过1905年革命，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或者看到过，革命怎样引起了全世界革命思潮的高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既不能制造，也不能给它规定顺序。预订革命是办不到的，因为革命是发展起来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237页

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不应该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不应该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39页

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39页

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39页

有人说，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质，这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不对的。这是把规律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已经证明：社会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规律方面的情形一样，正如上面所举的江河泛滥的例子一样。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4页

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熟练地运用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支配它们。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6页

在阶级社会里，利用经济规律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阶级背景，而且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旗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先进阶级，而衰朽的阶级则加以反抗。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973年版第39页

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发展自己，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

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年7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页

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①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

我们必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现代历史并力求使我们的描写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能够促进运动的开展，有助于自觉地选择耗费力量最少而能够提供最大的最持久的结果的斗争手段、方式和方法。

列宁：《革命的日子》（发表于1905年1月31日〔18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82页

我们必须力求赶上事件的发展，作出总结、作出结论，从今天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应用于今天“人民还在沉默”而不久的将来革命的火焰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燃烧起来的地方。

列宁：《革命的日子》（1905年1月31日〔18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82页

① 指1848年2月巴黎人民举行的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二月革命迫使国王退位，成立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的临时政府，宣布第二共和国成立。——编者注

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有批判地来研究这次大革命的经验，检查这种经验，清除其中的渣滓，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5页

马克思是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他拿1848—1851年革命伟大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94页

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争取**更多的东西**，一定要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过渡到比较困难的任务。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般的进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进步。

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13—614页

要清醒地观察事物：资产阶级曾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材，而我们现在也就有同样的任务，要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的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所以我们说，获得胜利的阶级，应当是成熟了的阶级，可是成熟性不是由什么证书所能证明，而是要由经验和实践来证明的。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3月29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0页

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

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敏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3—224页

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74页

四、认清时代，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

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

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言已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大屠杀的不堪言状的惨祸，到处激起被压迫群众的英勇精神的高涨，百倍增强他们为解放而斗争的力量。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03—604页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

第一个原理：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内占统治地位；发行有价证券是金融资本的一种主要业务；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一；金融寡头的莫大势力是金融资本统治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揭露出垄断资本主义的粗暴的寄生性，使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压迫百倍沉重起来，使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愤怒更加增长，把群众引上无产阶级革命这条唯一的生路。（见列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

第二个原理：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所有这些，一方面使各个民族的经济和领土变成

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殖民地国家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外部的殖民地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因素日益增长。

第三个原理：独占“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那些已经抢得领土的国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额”的国家为重分世界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均势”的唯一手段，——所有这些都使第三条战线即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线紧张起来，因而使帝国主义削弱，并使头两条反帝国主义战线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战线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战线易于联合起来。（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在帝国主义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列宁把上面一切结论综合为一个总的结论说：“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①（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79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19—20页

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发表于1927年11月6—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203页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原注）

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2页

我们只有最后彻底地粉碎拥有强大技术和纪律的国际帝国主义，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且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

列宁：《在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上的演说》（1918年4月23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213页

美国革命无产者目前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世界大屠杀的最新最强的帝国主义。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86页

正是目前，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这些现代的奴隶主，揭开了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血腥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86页

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并且在地理条件上处于最安全的地位。他们发财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向自己进贡的国家。他们掠夺了数千亿美元。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都有英国和它的“盟国”、德国和它的附庸国为了共同分赃、互相“帮助”（在压迫工人与迫害社会党人国际主义者方面）而缔结的龌龊的秘密条约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

有污迹，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得的”军事订货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血迹，都有一千万死者和二千万伤者在英国或德国强盗为争夺更多赃物、英国或德国刽子手为争先摧残世界弱小民族而展开的所谓伟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圣的斗争中所洒下的鲜血。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87—588页

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不仅压迫大俄罗斯民族，而且使大俄罗斯民族腐化堕落，成为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8页

只有用革命来推翻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首先是推翻最反动、最野蛮、最凶恶的沙皇政府，才能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和国际和平的道路。

列宁：《反战宣言》（1915年8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347页

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万能和沙皇制度的暴虐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页

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如果说现在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那末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27页

现在沙皇帝国主义同欧洲先进的资本帝国主义在共同压迫许多民族的基础上结成的**联盟**，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现在已分裂为沙文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部分和革命部分。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64页

“费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东西：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这种转变在现在，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和战后，已成为**世界的**事实了。不了解这一事实，是“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最严重的盲目无知，是它的最大的罪行。机会主义或改良主义必然要转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或社会沙文主义，因为帝国主义造成一小撮最富有的先进国家去掠夺全世界，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用自己的垄断超额利润（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来收买**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

看不见帝国主义时代这一事实的经济必然性的，只能是十足的傻瓜或伪君子，这些伪君子欺骗工人，重复着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原理**，以此来掩盖**社会主义内部整整一个派别**转到帝国主义

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沉痛事实。

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7月14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8页

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去掠夺别的国家，奴役别的民族。这就是“沙文主义”这个概念的主要内容。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发表于1916年1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1页

简单地讲，“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这种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27页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10页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地活动，怎样地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89年12月—189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

我要问你们，有什么东西变了呢？来自俄国的危险减弱了吗？没有。只是欧洲统治阶级的理智昏聩到了极点。首先，根据俄国官方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供认，俄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它的

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

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1867年1月22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6页

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1920年7月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3—734页

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页

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3页

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

列宁：《以后怎么办？》（发表于1915年1月9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91页

真正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2页

不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机会主义决裂，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就是欺骗。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1915—1916年）。《列宁全集》第39卷第255页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0页

决不向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的勾结行为作任何让步！

列宁：《论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1917年8月29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33页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的一个主要缺点，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一个基本原因，恰恰在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的提出来，更不用说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78页

“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流派等等，反正都

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96页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而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8页

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用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依据战争的经验揭穿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丑恶本质而不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98页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

附：关于历史人物的若干论述

斯 巴 达 克

斯巴达克（？——公元前71年）——古罗马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原是角斗奴隶，公元前73年与数十名角斗奴隶一起逃亡，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不久就占领了南意大利。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

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呢？我们知道，大多数战争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叫做王朝战争。但有时战争也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进行的。斯巴达克掀起的战争就是为了保卫被奴役的阶级。在直到今天还存在的殖民压迫的时代，在奴隶制时代等等，也有过这种战争。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是不能谴责的。

列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61页

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就是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惨遭屠杀，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串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发生的最大一次国内战争。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51页

闵采尔、加尔文

闵采尔（1490左右—1525）——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的领袖，平民和农民的思想家。

加尔文（1509—1564）法国人，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新教教派之一——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该教派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

德国还在宗教改革时代就曾有人主张实行社会改革。在路德开始鼓吹教会改革、鼓动人民起来反对教会权力以后不久，德国南部和中部的农民就掀起了反对他们的世俗统治者的总起义。路德经常说，他的目的是在学说上和做法上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农民也希望这样，因此，他们要求不仅在教会生活中，而

且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最初做法。他们认为，他们所处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境遇是和圣经学说不相容的。他们天天受着一帮傲慢的男爵和伯爵的压迫和搜刮，这些人把他们当做牲畜看待；连一项保护他们的法律也没有，即使有，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和最早的基督徒的公社原则以及圣经上阐述的基督学说，是截然对立的。因此农民就起来进行反对他们的老爷们的战争，这种战争只能是殊死的战争。他们公认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传教士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自然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宗教和迷信的谬论，可是，除此之外，也还包括了这样一些原则：按照圣经，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权利私自占有任何财产；只有财产共有才适合于基督徒的社会；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对其他基督徒不得施以任何权力和暴力，不得担任任何政府职务或享有世袭权力；相反地，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末在人间也应该是平等的。这些原则只是从圣经和路德本人的著作中得出来的逻辑上的推论；而路德这位改革家并没有打算象人民那样走得那么远；尽管他在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他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他还象信奉圣经那样，坚信诸侯地主那种践踏人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由于他需要贵族和信仰新教的诸侯们的庇护，所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抨击起义者；这本小册子不仅割断了他同起义者的一切联系，而且还煽动贵族象对付那些反对神律的叛乱者那样，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他喊道："象杀狗那样杀他们！"整本书对人民充满了仇恨，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由此可见，他在开始自己一生活动的时候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经过一场浴血的国内战争以后，起义被镇压

下去，农民又回到了原来的奴隶地位。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4—585页

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宗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406页

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闵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断则在平民和农民的最先进的一派中完全再现出来。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已满足，因而轻易地在本阶级内拥有了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闵采尔却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9页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掩藏在基督教词令外衣之下，闵采尔宣说上述这些教义也同样是大半掩藏在这些基督教词令之下来进行的。但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到处都从他的著作

里透露出来。可以看出，这件圣经外衣在闵采尔这里远不如在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里那么重要。然而在闵采尔和近代哲学之间却隔着三百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十六世纪“闵采尔派”的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为了不仅在整个德意志，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贯彻这一切，须建立一个同盟。诸侯和贵族都须邀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须在最初的时机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越来越带上更激烈、更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而外，他还以同样的慷慨激昂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平等的千载太平之国和当时的压迫对照起来。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出去；他

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尔斯特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3—414页

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过这一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6—197页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能阐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地方诸侯和中央政权①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建立了新的信条，即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一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人下降为农奴。

但是，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中央政权”，而是“皇室中央政权”。——编者注

的经济力量的摆布；在经济革命时期，当一切旧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中心被新的所代替的时候，当印度和美洲已经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最神圣的经济信条——金银的价值——也已经开始动摇和崩溃的时候，这种情形就特别真实了。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① 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391页

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② 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诸侯”，而是“德国小诸侯”。——编者注

② 指1688年英国政变。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编者注

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

德谟克利特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了解德谟克利特哲学所依靠的真正的史料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几条轶闻；德谟克利特不仅不排斥世界，反而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几乎无人知道的伦理学只有几条意见，这些意见是一个游历甚广的老年人可能提出来的；他的自然科学著作只是被Per abusum〔牵强附会地〕列入哲学的，因为他所谓的原子跟伊壁鸠鲁的不同，他所谓的原子仅仅是物理假设，用以解释事实的辅助工具，这完全象原子在近代化学（道尔顿等）解释化合比例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所有这一切都不合乡下佬雅各的胃口。德谟克利特一定被"唯一地"理解了，德谟克利特说到"宁静"，也就是说到"精神的安静"，也就是说到"返回自身"，也就是说到"排斥世界"；德谟克利特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他和口念《Brahm》（应该说《OM》〔"唵"〕）的印度头陀的差别不过是象比较级和最高级之间的差别一样，即"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6页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辩证论者，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位伟大的研究家，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就会更容易了解。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

“5张床＝1间屋”

“无异于”；

“5张床＝若干货币”。

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本身，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实际上，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通约的”，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在质上等同。这种等同只能是某种和物的真实性质相异的东西，因而只能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

可见，亚里士多德自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这种等同的东西，也就是屋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呢？亚里

士多德说，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同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劳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不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3—75页

两个哲学派别：带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证明：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1页

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

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466页

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不同的**“实在论”**、**“经验论”**（第299页），同上第311页，这个见解是不正确的。（（这里黑格尔显然又把许多东西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唯心主义。））

在叙述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的学生们关于理念的争论时，黑格尔**抹杀**它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参看第322—323页及其他各页。）

注意

注意

他失言了：《把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奉为神，这是不足为奇的……神和人根本不是如此格格不入的》……（第305页）

（（只要倒转过来））正是这样！

① 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而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编者注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就在他的神的观念中（第326页）（（当然，这是唯心主义，但比起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来，它客观一些，**离得远一些，一般化一些**，因而在自然哲学中就比较经常地＝唯物主义。））

黑格尔把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完全弄糟了

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见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等人的批判，黑格尔对康德等人的批判。

注意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因为概念、抽象从什么地方来，“规律”和“必然性”等等也就从哪里来。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在其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中）破坏唯心主义**基础**这一点胆怯地避而不谈。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2—313页

亚里士多德**如此**无力地抬出神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留基伯和唯心主义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有折衷主义。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黑格尔因亚里士多德的“真正思辨的概念”（第373页关于“灵魂”和其他许多东西）而对他大肆吹捧，并渲染明显的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胡说八道，读到这里实在是令人厌

恶。

亚里士多德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动摇的一切地方，都被掩饰起来了！！！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7页

Aristoteles. «De anima» ①第2篇第5章：

感觉和认识

亚里士多德紧密地接近唯物主义

《区别》（感觉和认识②之间的）《就在于：那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其原因是：感觉的活动是针对单一的东西的，相反地，认识则是针对普遍的东西的；而这普遍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实体而存在于灵魂自身中。因此，每个人只要愿意，他自己就能思想……而感觉则是不由他作主的，——要感觉，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第377页）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8页

在《形而上学》③的开始部分，最具有特色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同柏拉图的论战以及因唯心主义的胡说而发生的绝顶天真的“困惑的”问题和怀疑。而所有这一切又在关于**基本的东西**、即概念和个别东西这个问题上陷入毫无办法的混乱。

注意：《形而上学》这本书在开头的地方坚决反对赫拉克利特、反对存在和非存在同一的思想（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没有掌握这种思想，没有掌握辩证法）。最典型的特

①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mpfinden и Erkennen. ——译者注

③ 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编者注

征就是处处、到处都显露出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

亚里士多德处处都把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混合起来，而且混合得处处都显出客观逻辑来。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没有怀疑。对于理性的力量，对于认识的力量、能力和客观真理性抱着天真的信仰。并且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即概念与感觉得到的个别对象、事物、现象的实在性的辩证法上陷入稚气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

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寻求、探索、迷宫，人迷了路。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寻求、探索，它接近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的逻辑学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索、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而这些提问题的方法就是希腊人所用的那一套试探方式，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卓越地反映出来的质朴的意见分歧。

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6—417页

柏拉图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

古代的著作家虽然只能看到金属流通的现象，但已经把金铸币理解为象征或价值符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6—107页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5—406页

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和现代的见解形成“最严格的对立”的①。——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69页

培根、洛克、霍布斯

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

洛克（1632—1704）——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霍布斯（1588—1679）——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

然而，从十七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英国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

① 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第5节。——编者注

② 马克思指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第2册。——编者注

学来宣扬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①。唯名论，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②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和他的同素体③，德莫克利特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在他看来，感觉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识的泉源。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于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④〔"痛苦"〕⑤。

---

① 唯名论者代表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维和语言的产物，它们只能用来表明现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纪的实在论者相反，唯名论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创造事物的源泉。因此，他们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经院哲学家"，而是"唯物主义者"。——编者注

③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同素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同素体是万物的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编者注

④ 《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qualitas〔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字；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恩格斯在英文版上加的注，在德文版上未加。——编者注）

⑤ 在德译文中，在"痛苦"一词后面，又从《神圣家族》中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编者注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它的诗的绚丽色彩，它变成了数学家的抽象的经验①；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憎恨起人类来了。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而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性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霍布斯，作为培根的继承者，这样推论道：如果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末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丧失了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词，除了通过我们的感官而为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一样，都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

① 在德译文中，这句话是："它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经验"；在这句话之后又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编者注

过程，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到的，那末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既有开始也有结束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就是我们称为善的东西。人和自然都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中提供了这种论证。

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同样地打破了还包围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英国人现在对马克思给予他们祖先的赞扬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那真是遗憾得很。可是不容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尽管十八世纪时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一切战争中都被德国人和英国人所战胜，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是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这甚至发生在卓绝的法国革命之前；而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都还在试图移植于我们自己的环境。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2—385页

约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代表工厂主反对工人阶级和贫民，代表商人反对旧式高利贷者，代表金融贵族反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

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他也接受了朗兹的挑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7—68页

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605页

洛克的著作的出现对于法国人是多么的凑巧。洛克论证了bon sens的哲学，即健全理智的哲学，就是说，他间接地说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

曾经**直接**受教于洛克和**在法国**解释洛克的**孔狄亚克**立即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他证明法国人完全有权把这种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和神学偏见的不成功的结果而予以抛弃。他公开驳斥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等人的体系。

他在他的著作《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的经验》中发展了洛克的观点，他证明，**经验**和**习惯**的事情不仅是灵魂，而且是感觉，不仅是创造观念的艺术，而且是感性知觉的艺术。因此，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把孔狄亚克从法国各学派中排

挤出去的正是**折衷主义**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

康　德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二元论者，星云说的创始人之一。

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不象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① 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厌恶，那末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掉的无法计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

① 指伊·牛顿在他的基本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2版第3册的结尾部分《总识》中所表达的思想。牛顿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用重力说明了天体现象和海洋的潮汐。但是我没有指出重力本身的原因。”接着他在列举了重力的某些性质以后，继续说：“至今我还不能从种种现象推论出重力的这些性质的原因，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hypotheses non fingo〕。凡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都应该叫做假说；凡是假说，不管它是形而上学的或物理学的，力学的或隐蔽性质的，都不能用于实验哲学之中。在这种哲学中，一切定理都由现象推论而来，并用归纳法概括。”

黑格尔也注意到牛顿的这种意见，他在《哲学全书》第98节附释1中指出：“牛顿……直接警告物理学，不要陷入形而上学……”。——编者注

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舍尔才充实了他的内容，并且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因此才使“星云假说”逐渐受人重视。进一步的发现使他最后获得了胜利；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恒星的固有的运动，宇宙空间中存在着有阻抗的媒质这一事实得到证实，通过光谱分析证明了宇宙物质的化学上的同一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的炽热星云团的存在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0—451页

康德已经以自己的星云说，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同时又以自己的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作用的发现，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页

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① 恩格斯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同样是由康德发现的潮汐对地球自转的阻碍作用只是在现在才被人理解。”——编者注

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直到那时，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个别天体上个别的有机物渐渐死去，人们总认为属和种是不变的。当然，自然界显然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可是这一运动总好象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世界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

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由于康德的这种不彻底性，不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不可知论者即休谟主义者），都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的差别，证明不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是向唯物主义、“实在论”或“素朴实在论”让步。此外，不可知论者抛弃了自在之物，也抛弃了先验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则要求不仅从纯粹思想中彻底地引出先验的直观形式，而且彻底地引出整个世界（把人的思维扩张为抽象的**自我**或“绝对观念”、普遍**意志**等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00页

摩 尔 根

摩尔根（1818—1881）——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人种学家。

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页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

① 恩格斯指的是1877年在伦敦出版的路·亨·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编者注

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① 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2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2—443页

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但是，他的著作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四十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编者注

著作之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页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间，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历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愈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

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愈将获得大家的公认。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

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

家庭的发展是与此并行的，不过，这一发展对于时期的划分没有提供这样显著的标志罢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页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摩尔根的另一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据亲属制度把原始家庭形式恢复起来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摩尔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

① 我于1888年9月从纽约返欧途中，遇到一位前罗彻斯特选区的国会议员，他认识摩尔根，可惜，关于摩尔根的事他能给我述说的并不多。摩尔根以个人的身分住在罗彻斯特，仅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兄弟是个上校，在华盛顿陆军部供职；靠这位兄弟的帮助，摩尔根得以使政府对他的研究感到兴趣，并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几种著作；据我的交谈者自己说，他在任国会议员的期间，也曾多次帮过摩尔根的忙。（恩格斯原注）

质上是与希腊人的 genea〔氏族〕和罗马人的 gentes〔氏族〕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腊—罗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上古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会组织，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极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以后，便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0页

黑 格 尔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伟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的辩证论者。

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象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看来这个体系从外部是不能攻破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只是由于身为黑格尔派的那些人从内部攻击，这个体系才被打破。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8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8—589页

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以致除了上面提到的体系而外，其他任何体系都是站不住脚的。虽然还有两三种体系，但这些体系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受到极端轻视，人们连驳斥一下的兴趣都没有。虽然黑格尔的知识很渊博，思想很深奥，可是由于他过分埋头于抽象问题，而未设法摆脱他的时代——旧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复辟的时代——的偏见。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9页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象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

学和形而上学，那末，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6页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

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218页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如在他的体系的其他一切部门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但是，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我们说，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0页

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①。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

① 在《引论》的草稿中，恩格斯是这样描述黑格尔哲学的：“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编者注

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64页

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①。”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

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顽强而毫无结果地向他的臣民约许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

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因此，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5页

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智及其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世界是经常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的原理，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认为反对现状、反对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和流行罪恶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他们认为，其他一切关于发展原理、进化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和革命）弄得残缺不全。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3页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1804—1872)——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

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

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0—141页

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1888年2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7—208页

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好象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徬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

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218页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势所必然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时，

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

“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

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

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溶化在宗教中。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

费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这个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人的映象。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想象的形象。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页

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

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大家知道（也许巴札罗夫不知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大家也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他而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0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1841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又有他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出版。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76页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在法国，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

的斗争”（《遗著》中的《神圣家族》）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0—581页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121页

在农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等实在劳动的特殊形式轮流地被看作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后，**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编者注

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在这里他完全没有看到自然因素，可是在纯粹社会财富即交换价值的领域内，自然因素却追跟着他。诚然，斯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但是，他又把这种价值规定的现实性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换句话说，从简单商品的观点看来他以为是真实的东西，一到资本、雇佣劳动、地租等等比较高级和比较复杂的形式代替了这种商品时，他就看不清了。例如，他说：在市民阶级的 Paradise lost〔失乐园〕中，人们还没有以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佃户、高利贷者等身分互相对立，而是以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的身分互相对立，在那里，商品价值是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他经常把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价值这一规定混为一谈，在谈到细节时总是摇摆不定，把社会过程在不等劳动间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误认为是个人劳动的主观的权利平等①。他力图用**分工**来说明实在劳动之转化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即转化为资产阶级劳动的基本形式。认为私人交换以分工为前提固然是对的，但是认为分工以私人交换为前提就错了。譬如在秘鲁人中曾有过非常发达的分工，但是并没有私人交换，产品并没有作为商品交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9—50页

① 例如，亚当·斯密说："对从事劳动的人说来，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必然有同等的价值。在他的健康、体力和活动处于正常的情况下，在他的技巧处于平均水平的条件下，他所付出的休息、自由和幸福的分量总是一样多。所以，不论他取得多少商品作为他的劳动的报酬，他所付的代价总是一样。诚然，用这个代价买来的商品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但这只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值有了变动，而不是因为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有了变动。可见，只有劳动从来不改变自己的价值。因此，他是商品的实在的价格……"（马克思原注）

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191页

李嘉图关于土壤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9页

他①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②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他不仅指责李嘉图，而且指责马尔萨斯、穆勒、萨伊、托伦斯、威克菲尔德、麦克库洛赫、西尼耳、惠特利、理·琼斯等等，一句话，指责欧洲的经济学权威，说他们分裂社会和制造内战，因为他们证明了：各

① 指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查理·亨利·凯里（1793—1879）他是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人。——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上，马克思在“代表者”一词上面写了“表达者”一词。——编者注

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种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立。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8页

大卫·李嘉图与亚当·斯密相反，他十分清楚地作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并且指出，这个规律也支配着似乎同它矛盾最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在这方面他至少推测到这个规律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历史前提。他说，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只适用于这样的商品，

"这些商品可以由工业任意增加，它们的生产受无限制竞争的支配"。

实际上，这不过是说，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同时，李嘉图还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① 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李嘉图虽然受着这种资产阶级视野的限制，但是他对深处与表面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经济作了非常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析，以致布鲁姆勋爵说：

"李图嘉先生似乎是从别的行星上掉下来的。"

① 李嘉图在《论农业的保护关税》一书中提到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常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正方形的住宅区。"欧文的平行四边形"这一名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编者注

……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0—51页

“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一教条，如果用它的最抽象的说法来表示，就是说“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同义反复只是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价值一窍不通。如果接受这个前提，那末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的推论都变成了空洞的呓语。所以，李嘉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 1817 年出版的自己那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把那种认为“价格由工资来决定”的流行已久的陈旧不堪的虚伪学说完全粉碎了。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9—170页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页

在亚当·斯密那里，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意见还常常和动劳时间决定价值的意见混在一起，自李嘉图以来，前一种意见就被逐出科学的经济学之外了，今天，它仅仅还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52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3页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

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　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就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①。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②，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③，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

---

① “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② “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它们所提出的实际措施”。——编者注

③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编者注

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283页

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

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页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① 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舌战，是需要有更多的

①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编者注

勇气的。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300页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页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

空想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这种劳动活动局限于单调地机械地终身重复同一的动作。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主张人口应该分成一千六百人到三千人的集团，分布于全国；每个集团居住在他们那个地区中央的一个巨大的宫殿中，共同管理家务。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四个到五个这种相互毗连的宫殿组成的。根据这两个空想主义者的意见，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场手工业在工业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相反地，在欧文看来，大工业已经起着最主要的作用，而且认为在家务劳动中也应该应用蒸汽力和机器。但是他们两人都要求每个人在农业上和工业上也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们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劳动的每一“会期”（用傅立叶的话说）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1—332页

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

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①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409页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三十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

① 指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编者注

且这部分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覆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410页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①。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②。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0—411页

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

① 恩格斯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编者注

② 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在1814年10月，第二本在1815年。在两巴的版本中，从第一本小册子作的摘录在第149—154页，而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则刊在第68—76页。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于1814年3月31日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了，而拿破仑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岛，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

百日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1815年3月20日他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编者注

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他以前写的所有著作，事实上只是歌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社会，只是歌颂产业家和银行家，反对拿破仑时代的元帅和法律制造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34页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

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412页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

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象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到1829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两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

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两千五百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两千五百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六十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以外，还得到三十万英镑（六百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①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

① 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恩格斯原注）

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附上了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2—415页

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现在我只想指出，傅立叶已经把一夫一妻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做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刻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les familles incohérentes）是一种经济单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4页注

巴　贝　夫

巴贝夫（1760—1797）——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时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末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这二者在法国革命以后都出现过；前者以拿破仑为代表、后者以巴贝夫为代表。关于巴贝夫主义，我想可以不必多

讲，因为邦纳罗蒂写的关于这个密谋的历史已经译成英文。共产主义者的密谋未能实现，因为当时的共产主义自身还是非常幼稚非常庸浅的，同时社会舆论也还不够开展。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6—577页

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从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民主制度产生的。第二次革命（1830年革命）却产生了另一种影响更大的共产主义。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9—580页

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被废除的时候。首先宣布这些“社会问题”的是最彻底的**共和主义者**，即英国的**“平均主义者”**、法国的**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等。巴贝夫的朋友和党内同志邦纳罗蒂所写《巴贝夫的密谋》一书表明这些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历史“运动”中得出一种信念：随着**君主制**和**共和制**这一社会问题的消失，还没有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3—174页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

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

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8页

“以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这一公式过于确定地表现了当时平民的博爱渴望。在公社倾覆以后的长时期中，在巴贝夫使这一点具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以前，没有一个人能说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如果说具有博爱渴望的公社来得太早了，那末巴贝夫就来得太晚了。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5页

魏　特　林

魏特林(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社会改革问题最近在德国又成了讨论的对象，但这次是在工人阶级中间讨论了。德国的工厂工业很不发达，因此大部分工人都是手工业者；他们在定居下来成为一个小师傅以前，都要在德国、瑞士、而且往往在法国逛上几年。这样以来，就有很多德国工人陆续到巴黎去并从那里回来，而在那里必然要接触到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其中有一个叫威廉·魏特林的，是普鲁士马格德堡人，普通的帮工裁缝，他决定在自己的祖国建立共产主义公社。

这个可以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的人，在巴黎住了几年以后，就到了瑞士，在日内瓦的一家裁缝店工作，这时，他向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宣传他的新福音。他在日内瓦湖畔的所有的瑞士城镇，建立了共产主义联合会，在那里做工的大部分德国人都对他的思想表示同情。他这样取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后，就着手出版一种定期刊物《年轻一代》，在这个国家扩大自己的宣传。虽然这份杂志只是给工人看的，文章也是工人写的，但从一开始它就胜过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办的大部分刊物，甚至胜过了卡贝慈父办的《人民报》。从这份杂志可以看出，杂志编辑为了取得一个政论家不可或缺的、从有限的几年教育里不能得到的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这份杂志还说明了，魏特林曾不断地努力把自己对于社会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综合成一种完整的共产主义体系。《年轻一代》杂志1841年开始出版；第二年，魏

特林发表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他这本书评述了旧社会制度，描绘了新社会制度的轮廓。将来我也许要从这本书摘出几段寄给你们。

这样，魏特林在日内瓦及其近郊建立了共产党的核心以后，就到了苏黎世；那里也和瑞士北部其他城市一样，他的一些朋友对工人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影响。现在他开始在这些城市组织自己的党。一些讨论社会改革问题的联合会以歌咏俱乐部的名义成立了。这时，魏特林表示要出版《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可是就在这时候，警察便来干涉了。

今年6月，魏特林被捕了。他这本书没等出版就和他的文件一起被没收。共和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审理这个案件，然后向议会——民选的代表机关——提出关于这个案件的报告。这个报告已在几个月以前公布。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瑞士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共产主义联合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德国工人；魏特林被看作共产党的领导者，并且常常收到有关运动情况的报告；他和德国人在伦敦、巴黎建立的同样的联合会有通信联系；所有这些由经常变更住所的人组成的团体无非是“危险的、空想的学说”的温床，它把自己最有经验的成员派往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并以自己的思想感染一切影响所及的工人。报告的起草人是布伦奇里博士。他是一个贵族，基督教的狂热拥护者，因此，他写的一切与其说是一篇冷静的官方报告，不如说是一封挟嫌陷害的告密书。这篇报告把共产主义说成旨在推翻整个现存制度和破坏社会一切神圣关系的最危险的学说。此外，这位虔诚的博士再找不出更厉害的字眼来表示他对这些卑贱无知的人们亵渎神明的粗野行为（他们竟想引用圣经来为自己不道德的革命学说进行辩护）的愤怒心情。魏特林及其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抱

着和法国伊加利亚派同样的看法，也宣称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

魏特林案件的结局远不是苏黎世政府所预料的那样。虽然魏特林及其朋友不止一次地谈吐失慎，可是加在魏特林头上的叛国和谋反罪名并未得到证实。刑事法庭判处魏特林六个月徒刑，并永久驱逐出瑞士；苏黎世各联合会的会员被驱逐出州境；苏黎世政府将这一报告转发各州政府并照会各外国使馆。可是在瑞士的其他地方，共产主义者并没有遭到多大损害。迫害开始得太晚了，并且没有得到其他各州比较有力的支持。这一迫害根本没有消灭共产主义，反倒给它带来了好处，它使所有操德语的国家对它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以前在德国几乎谁都不知道的共产主义，由于这些事件，在那里却成了众目所瞩的问题。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6—588页

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贝克尔**（一个智慧非凡的人，但也象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本身的不稳定而垮台）和其他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忠于魏特林共产主义体系的坚强组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前进报》上所说的话："（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这个大力士今天已

站在我们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9页

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身分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6—237页

欧仁·鲍狄埃

欧仁·鲍狄埃（1816—1887）——法国工人诗人。在伟大的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的委员。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的作者。

去年，1912年11月，是法国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即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作者逝世的二十五周年。

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

志和朋友。

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世界各国的工人现在都在纪念欧仁·鲍狄埃。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活着，并且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就象《国际歌》的作者一生所过的一样。他在1816年10月4日生于巴黎。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才十四岁，这首歌的名字叫作《自由万岁！》。1848年，他作为一个街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鲍狄埃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一个无产者，他起先靠包装箱子，后来靠绘制印花布图样维持生活。

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作出反应，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

在伟大的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的委员。在三千六百张选票中，有三千三百五十二票是选他的。他参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的一切措施。

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被迫逃到了英国和美国。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他在**1871年6月**，也可以说，是在5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

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公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1876年，在流亡中，鲍狄埃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强信念。

公社失败以后过了九年鲍狄埃才回到法国，回来后立即参加了“工人党”。1884年他的第一卷诗集出版了。1887年第二卷出版了，题名为《革命歌集》。

这位工人诗人的其他一些歌，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

1887年11月8日，巴黎的工人把欧仁·鲍狄埃的骨灰送到拉雪兹神甫墓地（Père Lachaise），在那里埋葬着被枪杀了的公社社员。警察夺取红旗，组织殴打。无数的人群参加了这次没有宗教仪式的葬礼。四面八方都在高呼：“鲍狄埃万岁！”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

列宁：《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发表于1913年1月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4—436页

约瑟夫·狄慈根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制革工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唯物主义哲学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代表。

要对这本书[1]做出完全确定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而是一个一半靠自学出来的人。从他使用的术语上

① 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编者注

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1]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象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末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文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科学修养的情况下得出这样多正确的结论。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1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3—374页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狄慈根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在下面将指出：他的表达方式往往不确切，他常常陷入混乱，而各式各样无知的人（包括欧·狄慈根）就把这些东西抓住不放，当然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也不例外。然而，他们不化一点力气或者没有本事去分析他的哲学的主要路线，把唯物主义和其他因素分别清楚。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1903年德文版第65页）中说道："我们如果把世界看作是'自在之物'，那就容易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了解：**'自在**世界'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差别，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而已。”“现象和显现者之间的差别，正象十哩路程和全程之间的差别一样。”（第71—72页）在这里并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任何原则的差别、任何“超越”、任何“天生的不一致”。但是，差别当然是有的，因为这里有着**超出**感性知觉的**界限**向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的过渡。

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这篇文章中说道：“我们知道〈erfahren，体验到〉，任何经验都是那种超出任何经验界限的东西（用康德的话来讲）的一部分。”“对于意识到自己的本质的意识来说，任何微粒，不论是灰尘、石头或木头的微粒，都是一种**不能彻底认识的东西**（Unauskennntliches），这就是说，每一个微粒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可穷尽的材料，因而是一种超出经验界限的东西。”（第199页）

你们看：在狄慈根**用康德的话来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仅仅为了通俗化和对比的目的而采用康德的**错误的**混乱的术语的时候，他承认超出“经验界限”。这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从唯物主义转到不可知论时抓住不放的一个好例子，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超出“经验界限”，在我们看来，“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狄慈根正反对这种哲学，他说：“不健康的神秘主义反科学地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分开。它把显现着的物和'自在之物'，即把现象和真理变为两个彼此 toto coelo〈完全地、根本地、原则地〉不同的并且不包括在任何一般范畴中的范畴。”（第200页）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18—119页

约·狄慈根尽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局部性的

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们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许多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6页

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狄慈根并不认为自己是某一学派的创始人，这一点对于评价工人出身的狄慈根是非常重要的。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发表于1913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61页

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人，应该读一读约·狄慈根的著作，但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阐述**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发表于1913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页

在约·狄慈根从事写作的时候，正是单纯的、庸俗的**唯物主义**传播最广的时代。所以，约·狄慈根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变，强调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即强调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必须懂得人的每一种认识的相对性，必须懂得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全面联系和相互依存，必须把自然历史唯物主义提高到唯物主义历史观。

约·狄慈根在强调人类认识的相对性时，往往陷入混乱状态，以至错误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做了让步。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多少能够巧妙地维护僧侣主义，即维护这个认为信仰高于科

学或者同科学并列，或者整个地让位于信仰的学说。不可知论（来自希腊文，《a》是不的意思，《ГНОСИС》是知识的意思）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动摇的，实际上也就是在唯物主义科学和僧侣主义之间动摇的。康德（康德主义者）、休谟（实证论者、实在论者等等）的拥护者和现代的“马赫主义者”都属于不可知论者。因此某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如臭名昭著的非开化论者和僧侣主义的公开拥护者，曾试图“利用”约·狄慈根的错误。

但是整个说来，约·狄慈根是个唯物主义者。狄慈根是僧侣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敌人。约·狄慈根写道：“我们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只有一个共同点：承认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这个“只有”也就是哲学唯物主义的核心。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发表于1913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63页

卡尔·李卜克内西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德国和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9年1月与卢森堡一起被反动政府杀害。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或“国际派”，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的最有名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的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后来，他又到柏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

散发秘密印出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他因此被逮捕并被判处苦役。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在德国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起来。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同本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列金、大卫之流）作无情的斗争，而且同本国的中派即同本国的齐赫泽、策烈铁里之流（即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一百一十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统一”，反对全体议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此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象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正确地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臭尸。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5—56页

李卜克内西是各国工人都知道的名字。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协约国，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领袖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无限忠诚，象征着真诚地不惜一切牺牲地去同资本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象征着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帝国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且正是在帝国主义的胜利把“自己的”国家弄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不惜一切牺牲地去进行这种斗争。德国社会主义者中一切忠实的真正革命的人，无产阶级中一切优秀的坚定的人，一切义愤填膺和日益具有革命决心的被剥削群众，都是同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派”一起前进的。

列宁：《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1月21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0页

上文是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艾伯特和谢德曼政府卑鄙杀害以前写的。这些刽子手，为了讨好资产阶级，竟让德国的白卫分子即神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警犬对卢森堡实行私刑拷打，公然借口“逃跑”而枪杀了李卜克内西（俄国的沙皇政府在血腥地镇压1905年革命时，也屡次借口被捕者“逃跑”而加以杀害），而且这些刽子手还用所谓清白的超阶级的政府的威望来替白卫分子作掩护！简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和无耻。显然，历史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尉官”的作用一定会达到野蛮、卑鄙和龌龊的“顶点”。让考茨基之流的傻瓜们在自己的《自由报》上大谈其由“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来组成“法庭”吧（这些奴性十足的东西仍旧把刽子手谢德曼之流叫做社会主义者）！这些具有庸人的愚蠢和市侩的怯懦的英雄们甚至不懂得法庭是国家政权机关，而德国的斗争和内战正是为了解决政权由谁掌握的问题：是由刽子手和杀人犯谢德曼辈及“纯粹民主”的赞美者考茨基辈为之“服务”的资产阶级掌握呢，还是由将要推翻剥削者资本家并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无产阶级掌握。

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的鲜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的鲜血，一定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去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个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

列宁：《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1月21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2页

有人对我们说：“在许多国家中，一切处于睡眠状态。在德国，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拥护战争，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反对战争。”我回答说：这一个李卜克内西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全国人民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寄托在拥护他的人们身

上，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你们不相信吗？你们就继续进行战争吧！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你们不相信李卜克内西，不相信工人革命，不相信革命正在成熟，你们就相信资本家吧！

列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92页

卢　森　堡

卢森堡（1871—1919）——波兰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女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和第二国际左派的著名领袖。生于波兰。1893年参加创立波兰社会民主党。1897年移居德国，积极参加德国工人运动。

保尔·列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想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过错误的著作。我们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这一点：鹰有时比鸡还飞的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犯过错误（1918年底1919年初出狱后，她已经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但纪念卢森堡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永远是有意义的，而且她的传记和她的**全集**（德国共产党人很不应该地迟迟不出版她的传记和全集，由于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只能部分地

原谅他们)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臭尸了。"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可是，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保尔·列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让他们去高兴吧。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1922年2月底）。《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0—601页

高　尔　基

高尔基（1868—1936）——革命作家。生于一个木工家庭，1934年曾任苏维埃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小市民》、《母亲》、《童年》等。

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这是无可争辩的。企图"利用"（当然是指在思想方面）这个权威来巩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这正好说明不应当怎样对待权威。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2页

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2页

在无产阶级艺术方面，马·高尔基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

尽管他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2页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怎么竟做出这种事情？这简直太糟糕了，真的！

昨天我从《言论报》上读了您对拥护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叫嚣”的回答，本来感到很高兴，今天取消派的报纸来了，**上面刊登了您的一段文章**，这段文章在《言论报》上是没有的。

这一段文章这样说：

“至于‘寻神说’，应当把它**暂时**〈仅仅是暂时吗？〉搁下，这是一种无益的事情：在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没有什么可寻找。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你们那里并没有神，你们**还**〈还！〉没有把它创造出来。不要寻找神，要**创造神**；不要虚构生活，而要创造生活。”

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暂时”的！！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要用造神说代替它！！

您竟能**做出**这种事情，这岂不是太糟糕了吗？

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者创神说等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谈寻神说不是为了反对**一切的**鬼神，不是为了反对任何思想上的奸尸勾当（信仰任何神都是奸尸勾当，即使信仰的是最纯洁的、最理想的、不是寻来而是创造的神，也是这样），而是要表明蓝鬼比黄鬼好，这比根本不谈还要坏一百倍。

在那些最自由的国家里，呼吁“民主、人民、舆论和科学”是**完全**不适当的，——在这样的国家（美国、瑞士等等）里，人们正是特别热心地用这种纯洁的、精神上的、创造的神的观念来麻

弊人民和工人。正因为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观念，甚至任何对神的谄媚，都是无法形容的卑鄙龌龊的东西，是**民主**资产阶级毫不在乎的（在很多场合甚至是他们所欢迎的）东西，——所以是最危险的东西，是最可恶的“传染病”。群众识破千百万种罪恶、坏事、暴行和**肉体**的传染病，比识破**精巧的**、精神上的、用最漂亮的“思想”外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念要容易得多，因此前者的危害性比后者小得多。强奸少女的天主教神甫（我刚才偶然在一张德文报纸上读到这件事）对于“民主制”的危害，比不穿袈裟的神甫，比不相信粗陋宗教的神甫，比宣传建神和创神的、思想上的、民主主义的神甫要**小得多**。因为揭露、谴责和赶走前一种神甫是**容易的**，而赶走后一种神甫就**不能**这样简单，揭露他们要困难一千倍，没有一个“脆弱的和可悲地动摇的”庸人会同意“谴责”他们。

您知道**小市民**灵魂的“脆弱性和可悲的动摇性”（俄国的灵魂，为什么说俄国的呢？意大利的就好些吗??），而您却拿最甜蜜的、用糖衣和各种彩色纸巧妙地包着的毒药来诱惑他们的灵魂!!

真的，这太糟糕了。

“代替我们这里的自我批评的自我侮辱已经够了。”

造神说难道不是**最坏的**一种自我侮辱吗?? 一切从事造神的人，甚至只是容许这种做法的人，都是以最坏的方式**侮辱**自己，他们所从事的不是“实际活动”，而恰巧是自我直观，自我欣赏，这种人只“直观”自“我”身上种种被造神说所神化了的最肮脏、最愚蠢、最富有奴才气的特点。

不从个人角度而从社会角度来看，**一切**造神说都正是愚蠢的小市民和脆弱的庸人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是在幻想中“自我侮

辱”的、“悲观疲惫的”庸人和小资产者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您关于灵魂的说法很正确，只是不应当说“俄国的”，而应当说小市民的，因为无论犹太的、意大利的、英国的，都是一个鬼，卑鄙的小市民在任何地方都同样丑恶，而在思想上干奸尸勾当的“民主小市民”则加倍丑恶）。

我一边读您的文章，一边在探索，怎么能够在您那儿发生这种笔误，但我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是您自己也不赞成的那篇《忏悔》的残余吗？？是它的余波吗？？

或者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例如您想离开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吗？也许是为了同“一般民主派”谈话而打算象同孩子说话那样奶声奶气吗（请原谅我的这种说法）？也许是“为了”向庸人们作“通俗的说明”，您想暂时容许他的或者他们的（庸人的）偏见吗？？

但要知道，无论从哪种意义和哪个方面来说，这种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我在前面写过，在民主国家里，呼吁“民主、人民、舆论和科学”，从无产阶级作家方面来说，是完全不适当的。那末，在我们俄国呢？？这种呼吁也不完全适当，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庸人的偏见。对某种模糊不清的一般呼吁，我们这里甚至伊兹哥也夫也会在《俄国思想》杂志上举双手表示赞成。为什么提出这些口号呢？？您倒可以把这些口号同伊兹哥也夫主义区分得很清楚，但读者不能区分。为什么给读者蒙上一层民主的薄纱，而不去明确地区分小市民（脆弱的、可悲地动摇的、疲惫的、悲观的、自我直观的、直观神的、造神的、姑息神的、自我侮辱的、糊里糊涂的无政府主义的——这个词真妙！！——等等）和无产者（他们善于做真正实际的精神奋发的人；善于把资产阶级的

“科学和舆论”同自己的“科学和舆论”，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民主区分开来）？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1913年11月中旬）》。《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1—485页

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而且还将作出很多贡献。

但是，高尔基为什么要搞政治呢？

在我看来，高尔基这封信① 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

列宁：《远方来信》（1917年3月12日〔25日〕）。《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2页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梅奇！我愈是细读您的信，愈是考虑来信的结论和信中的叙述（以及我们几次见面时您所谈的）的联系，我便愈加确信，不论是这封信，或是您的结论，或是您的一切印象，都是完全不健康的。

彼得格勒是近来最不健康的一个地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居民经受的苦难最多，工人献出的优秀力量也最多，饥荒很严重，战争危险也很严重。您的神经显然受不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大家劝您换换地方，因为使自己的神经失常到病态的地步是极不明智的，就从最简单的考虑来说，也是不明智的，更不用说从其他观点来考虑了，可是您却固执己见。

在您的信中，也和在您的谈话中一样，尽是一些不健康的印

① 指高尔基给当时俄国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一封贺信。——编者注

象，使您得出了不健康的结论。

您从痢疾和霍乱谈起；接着就发出一种不健康的怨言，说什么“博爱啦，平等啦”。说来无意，而听来却象是这样的意思：这个被围困的城市的贫穷、困苦和疾病，都是共产主义的过错!!

往下便对“低级”文学（什么文学？为什么与加里宁有关?）说了一些我简直无法理解的刻薄的话。而结论似乎是“剩下来的极少数有理智的工人”说：他们“被出卖”“给农夫当俘虏了”。

这就太没有道理了。怎么，难道加里宁犯了把工人出卖给农夫的罪吗？听来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十分幼稚、愚蠢、用“左的”词句代替理智的工人，或者是心神不安、受过折磨、挨饿、有病的工人，或者是很善于歪曲一切，很会抓住任何一件小事来发泄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深仇大恨的“贵族残余分子”，才能捏造出这种事情来。您在信中也提到这些残余分子。他们的情绪有害地影响着您。

来信说，您看到“各种各样的阶层的人”。看到是一回事，在整个生活中天天接触又是一回事。您主要接触的是这些“残余分子”，因为单是您的职业就使您“接待”几十个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用说您的生活环境了。

“残余分子”倒似乎是“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一种近似同情的感情”，而“大多数工人”却在产生坏人、混入党内的“共产党人”，等等！于是您竟得出这样的“结论”：干革命不能靠坏人，不能不要知识分子。

这完全是一种在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变本加厉的病态心理。

现在正采取一切办法，吸引知识分子（非白卫分子的）去与坏人作斗争。在苏维埃共和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工人和农民，而

不是终日埋怨和疯狂发泄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分比正在逐月增长。这在彼得格勒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彼得格勒是一个失去地位（和理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特别多的城市，但是，从整个俄国来看，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要想在彼得格勒或者从彼得格勒来确信这一点，只有非常了解政治情况，具有特别丰富的政治经验才行。您没有这一切。而且，您既不搞政治，也不观察政治建设的工作，而是从事一种特殊职业。这种职业使您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他们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在最好最难得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过是徬徨迷惘，悲观绝望，呻吟叹息，重复旧成见，担惊受怕，皇皇不安。

要观察，就应该在下面观察，在下面可以看看重新建设生活的工作，在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农村观察，——在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极复杂的材料，在那里只观察就行了。可是您不这样做，反而把自己摆在翻译作品之类的职业编辑的地位上。在这个地位上观察不到新生活的新建设，会把全部精力都浪费在听病态的知识分子的牢骚上，浪费在观察处于极端严重的战争危险和极度贫困的条件下的“故”都上。

您使自己所处的地位，使您不能直接观察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生活中的新事物；您只能观察故都生活的片断，那里工人的精华都到前线和农村去了，剩下的是多得不合比例的没有地位、没有工作、专门“包围”您的知识分子。劝您离开，您又执拗地拒绝。

显然，您把自己已经弄到了病态的地步：您来信说，您对生活非但感到很沉闷，而且“非常厌恶”!!! 那是当然的！在这种

时候把自己困在一个最头痛的地方，作一个翻译文学的编辑（这可真是对于观察人，对于一个艺术家最适当的工作！）。在这里，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都**不可能**进行观察和研究。您剥夺了自己做那种能够使艺术家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可能性——在彼得格勒可以搞政治，但是您不是政治家。今天是无端打碎玻璃，明天是枪声和狱中的叫喊，接着是留在彼得格勒的不工作的人中最疲惫的人的一些闲话，然后又是知识分子的、没有首都的首都知识分子的千千万万的印象，接着又是受委屈的人们的千百种诉苦，在编辑工作之余**不可能**看到任何的生活建设（这种建设在彼得格勒是按独特方式进行的，而且又最少），——这怎么不把自己弄到感觉生活非常厌恶的地步呢。

全国正紧张地进行着反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全世界资产阶级正在为他们的被推翻而疯狂地实行报复。这是自然的。为了报复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批打击**从四面八方**袭来。这也是自然的。在这里生活，应当做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到那些不是对首都举行疯狂进攻、对各种阴谋作激烈斗争、表现出首都知识分子的深仇大恨的中心所在的地方，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

生活令人厌倦，和共产主义的“分歧日益加深”。分歧在哪里呢，无法理解。分歧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呢，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指出。其实这是两种人的情绪的分歧：一种是从事政治或者全心全意投入最激烈的斗争的人的情绪，另一种是人为地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而受资产阶级大首都腐败印象折磨的境地的人的

情绪。

对您的信我率直地说出了我的看法。从（和您的）谈话中，我早就有了这样的看法，但是您的信把从您谈话中得到的那许多印象综合和固定下来了，总括起来了。我不想强迫别人接受劝告，但是我不能不说：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是接触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否则生活就会完全令人厌倦了。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1919年7月3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8—31页

蒲　鲁　东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331页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只要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6页

蒲鲁东的书[1]我已经读完了一半，我认为你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诉诸资产阶级，他回到圣西门那里去以及在批判部分的成百件其他事情，都证明：他把产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实质上相同的阶级，他认为，只是由于革命没有完成，它们之间才发生对抗。假哲学的历史结构是十分清楚的：革命前，产业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从1789年到1848年处于对抗的状态：否定；蒲鲁东的合题要一举解决这一切。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是决定性的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论点，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制造了把无产阶级反过来纳入到资产阶级中去的假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4页

我们所批判的浦鲁东先生的观点，是他的“空想的科学”，他企图用这种科学来缓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还要回头来谈这个问题。他的整个银行制度，他的整个产品交换制度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1848年8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8页

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末所有这些著作都象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十八世纪

① 指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① 和十九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

他那本关于《**政变**》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也是一样，在这里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象**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5页

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

①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十八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而言。——编者注

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至于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入”并使“永恒公平”得以实现就行了！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只求公平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480页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一般体现着这些条件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现象。从这个同任何关于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有联系的概念格格不入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就必然完全是任意的命令，随时能够顺利地用一些直接相反的命令来代替。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了。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7页

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不应当有的事件。小资产者蒲鲁东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

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如果这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末“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式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进程摧毁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消灭了大工业一切部门中的单独劳动，并且日益消灭着小工业和最小工业各个部门中的单独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被征服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页

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①，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在他的《经济矛盾》中，这个公平还被称为“永恒公平”，justice éternelle。后来永恒性就不再提起了，但实质上还是保存着。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6页

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经常自相矛盾著称的蒲鲁东，有时在某些地方也发表一些意见，好象表明他很想根据事实来说明观念。但是，这些言论对他的思想的基本倾向说来是毫不足道的，何况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而是“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条件和理论的、哲学的、宗教的原理”。——编者注

这些言论即使偶尔出现也表现得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页

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允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

无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鲁东说：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正义**，这种正义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蒲鲁东被称为形而上学者。马克思借助辩证方法和蒲鲁东作斗争，并证明说：既然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那末“正义”也一定要变化，因而“不变的正义”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呓语（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形而上学者蒲鲁东的格鲁吉亚的门徒却一味向我们重复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承认各种含糊不清的教条，例如所谓“不可认识的东西”和“自在之物”，归根到底也就变为毫无内容的神学。与蒲鲁东和斯宾塞相反，恩格斯借助辩证方法来反对这些教条（见《费尔巴哈论》）。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和斯宾塞的门徒

向我们说：蒲鲁东和斯宾塞是科学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形而上学者！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0页

拉　萨　尔

拉萨尔(1825—1864)——生于德国犹太富商家庭，庸俗民主主义者，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始祖。1863年5月，被选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支持普鲁士王国宰相俾斯麦的“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象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即将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愈来愈暧昧不明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令人

厌恶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鄙的布林德（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发表了）。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答应同恩格斯一起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而且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计划**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名为撰稿人。**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保证）。1864年9月底，他本来要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①。可惜拉萨尔没有能演出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显得极其愚蠢可笑！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以此永远结束！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2—353页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对一

① 威·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1月20日以前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走上了同俾斯麦的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他答应在普鲁士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问题上从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给俾斯麦以支持，交换条件是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这个政治“遗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1928年发表的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完全证实了李卜克内西所报告的消息。——编者注

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可以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的良好手段，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的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①，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甚至到处都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甚至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3—354页

① 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编者注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①，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②的对立——当做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谁也不会糊涂到认为这个口号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拉萨尔只能以这个口号（似乎！）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替这个口号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

① 指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1869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编者注

② 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舒尔采-德里奇进行这种“贮钱箱”鼓动是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编者注

号① 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② 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象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实际上，任何宗派都有宗教的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8年10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

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命题：罗马的遗嘱制同罗马本身一样古老，以致在罗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遗嘱制的时代”，遗嘱制勿宁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期从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年黑格尔派，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伸出罗马的法权规范，从而便得出了上述的完全违反历史的论断。这在该书中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该书根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在罗马的继承制中财产的转移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法学家，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

① 人民宪章是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编者注

② 没落帝国是对晚期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称呼；这里指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编者注

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远。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注

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多年来马克思容忍他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并用来装扮自己，而且他由于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有一定的义务。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二十六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① 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末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比究竟应占什么地位的时候了。要知道，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念的象征。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做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

① 指反社会党人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编者注

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评价而感到自己受到挫伤的那一部分工人，只是从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来了解拉萨尔，而且还是通过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现在正忙于别的事情。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判断，自然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赋予别人以勇气。但是，假若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8—489页

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做法（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究竟怎样要求进行这种工作，这可以从他对1856年德国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情况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在德国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

面，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马克思当时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的利益而背叛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也正是因为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写信同马克思商量他们将在刊物上共同发表意见的问题时说道：“在一个农业国家里，代表工业工人说话时只攻击资产者，而忘记了封建贵族对农村工人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1864—1870年间，当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时代，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了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相互斗争的时代快告终结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思想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无论对俾斯麦或亲奥派都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要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要在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基础上**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4—605页

巴　枯　宁

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

谢尔诺自杀，是很自然的。但是直到最后和他关系很坏的巴枯宁马上把他的文字材料据为己有，这却是使人想不通的。顺便说一下，我们的法语区日内瓦委员会① 的书记② 对巴枯宁厌烦到

① 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② 培列。——编者注

了极点，并且诉苦说，由于他推行自己的“暴政”，把一切都搅乱了。巴枯宁先生在《平等报》上暗示，德国和英国的工人不要求保持个性，因此接受了我们的“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与此相反，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代表。确实，他的头脑里是一片无政府状态，那里只容得下一个明确的思想，即巴枯宁应该当第一提琴手。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10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0页

国际成立之后不久，俄国人巴枯宁（虽然我从1843年就知道他，不过对于了解下面所谈情况并非绝对必要的，我都撇开不谈）在伦敦同马克思会面。后者在那里接受他加入协会，巴枯宁答应不懈怠地为协会工作。后来巴枯宁到了意大利，在那里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临时章程和对工人阶级的宣言**，他寄来了“非常热情的”回信，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几年以后——在这几年间他杳无音信——他又出现在瑞士。在那里他不接近**国际**，而接近**和平和自由同盟**。在这个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1867年在日内瓦召开）以后，巴枯宁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反对者，他们不仅反对他的“独裁的”影响，而且把他当做一个“可疑的**俄国人**”加以监视。**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以后不久，**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次巴枯宁以挑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顺便提一下——是用乐观主义的俄国佬通常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而向西方文明进攻时所用的那种口吻来痛斥西欧资产阶级。他提出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瓜们感到恐怖，而且使巴枯宁先生能够大叫大嚷地**退出**和平同盟并**加入**国际。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包含着

象“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样一些谬论，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总而言之，是一个仅仅为着追求短暂功效的庸俗的即兴作品。巴枯宁在巴黎的朋友（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参加《实证论者评论》的出版工作）和在伦敦的朋友象宣布一个事变那样向全世界宣布巴枯宁退出和平同盟，并且宣称他的滑稽可笑的纲领——这个由陈腐的老生常谈拼凑起来的杂拌——是某种非常惊人的和独出心裁的东西。

就在那时候，巴枯宁加入了国际的罗曼语区分部（在日内瓦）。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枯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

巴枯宁背着伦敦总委员会——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得到通知——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就是他曾经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领。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传巴枯宁特有的深奥哲理的“宣传团体”，而巴枯宁本人，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设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巴枯宁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

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3—304页

巴枯宁自从打算宣布自己是**欧洲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的时候起，就背弃了他的老朋友和导师赫尔岑，而在赫尔岑去世以后，却立即对他大肆赞扬起来。为什么？尽管赫尔岑自己是一个很富的人，他每年还从同情他的俄国假社会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派那里得到二万五千法郎的宣传费。巴枯宁由于自己的赞歌而**获得了**这笔钱财，于是——尽管他憎恶继承制度——却毫无限制地开始占有了“赫尔岑的**遗产**”，既占有金钱的遗产，也占有**精神的**遗产。

同时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俄国青年大学生流亡者的侨民团体，他们真正忠于自己的信仰，并且用下面这一点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他们把**同泛斯拉夫主义的斗争**作为自己纲领的主要点。

他们在日内瓦出版了《**人民事业**》杂志。大约在两星期以前他们找向伦敦，寄来了自己的章程和纲领，并请求批准他们所成立的国际俄国支部。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满足。

在另外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他们请求马克思临时作为他们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点也得到了同意。同时他们宣布——似乎是向马克思**表示歉意**——不久他们就要撕破巴枯宁的假面具，因为这个人采取**两面派政策**：在俄国采取一套，在欧洲采取完全另外一套。

因此，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手法，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很快就要完蛋了。

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5—316页

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伯尔尼[1]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他是这

① 此处以及下面的地方，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洛桑”。——编者注

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一个吹牛专家，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

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分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 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骗子手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物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么地产和资本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末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

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末，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想泡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极罕见的纲领。

（2） **“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 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的任务只是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讽刺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末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认为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同他们打交道，那就是说我们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而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可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知识就是这样。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60—662页

1868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

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组织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致费·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

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做**社会清算**。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就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让人叫自己相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按本性来说是有政治头脑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

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1]真该死，它竟授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

整个骗局的主要点扼要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401页

伯 恩 施 坦

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按普通一般人以及《信条》作者们所了解的含义来说，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而这种企图当然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流派已经

①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利。第五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拒绝接受新支部的权利，第六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有暂时开除个别支部的权利。这些决议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载入组织条例，它们遭到巴枯宁派的攻击。——编者注

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遭到忠实地保持革命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原则的党的指责。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底—9月初）。《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5页

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叫做伯恩施坦派，因为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页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页

修正主义或“修改”马克思主义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爱德华·伯恩施坦才扬名（臭名）全世

界的。

列宁：《图快出丑》（发表于1914年5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2页

伯恩施坦根本没有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16页

考　茨　基

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考茨基所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一种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论。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0页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每个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以及每个大银行，都是一种垄断组织。超额利润并没有消灭，它仍然存在。一个享有特权的财政上富足的国家剥削其他一切国家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变本加厉了。少数富强国家（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万万以至数十

万万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万万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就在于此，而考茨基不仅没有把此中最深刻的矛盾揭示出来，反而把它们掩盖起来了。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93页

问题并不象和平主义者、考茨基主义者所提的那样：要么是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要么是拒绝改良。这是资产阶级对问题的提法。事实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进行革命斗争，万一革命不能完全成功，有时改良是它的副产品（这是整整一部世界革命史所证明了的）；要么光是空谈改良和答应改良。

目前以和平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考茨基、屠拉梯和布尔德朗的改良主义，不仅把革命问题放在一边（这已经是背叛社会主义），不仅在实践中拒绝进行任何系统的、顽强的革命工作，而且还发展到说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为（考茨基在1915年11月26日《新时代》上说过这句话），发展到拥护并着手同革命斗争的公开死敌休特古姆、列金、列诺得尔及托马之流等等实行统一。

这种改良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全面地利用欧洲当前的革命形势来直接鼓吹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由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为了发展争取革命的斗争，以及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也丝毫不拒绝、不放弃利用改良。

列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1917年1月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917页

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1915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就是说，变成承认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资产阶级学说，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俄国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关于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① （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0页。——编者注

（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虚伪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①

最后，我在1917年8月和9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六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中，我特别谈到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变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②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他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作了机会主义的歪曲，这种歪曲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作了详细的揭露。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16—618页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08—812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4页。——编者注

考茨基是这样提问题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3页）。

我们要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主义者，是根据他们的**名称**，即根据他们的言论，而不是根据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呵！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应该谈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关于"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的伟大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问题。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吗？然而考茨基象个一味背诵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硬是背朝着二十世纪，面向着十八世纪，在许多章节中千百次枯燥无味地反复咀嚼着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君主专制、同中世纪制度的关系的滥调！

真是象在梦里嚼树皮！

这根本是文不对题。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说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视民主"（第11页）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话来抹杀和混淆问题，是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拚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19—620页

考茨基象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还是没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2—623页

考茨基史无前例地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卑鄙地空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既然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概念作了这样的"解释"，使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消失了，他也就是在对马克思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是个后生小辈了。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8—629页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全部或大部）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

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各样的话，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话。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的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42—643页

考茨基或者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或者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容许他们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论断，在两种情况下，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事实都是十分明显的。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46页

考茨基先生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Wien.1918）这本小册子中写道：“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这一场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的小册子第33页）接着他加上一句说，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把苏维埃由“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变成了“**国家组织**”，从而“破坏了民主”。（同上）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小册子（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中，我详尽地分析了考茨基的这一论断，表明它的内容就是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因为国家（任何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不是别的，正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阶级的机器。称苏维埃为**阶级**的战斗组织，而否认它有权变为“国家组织”，这就是**在实际上**背弃社会主义的起码原则，宣扬或维护**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侵犯性，在事实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

考茨基的立场的荒谬是如此突出，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人群众的进攻是如此有力，以至考茨基和考茨基分子不得不支吾搪塞，可耻地退却，因为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他们是办不到的。

列宁：《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1919年5月2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5—356页

象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也教过别人（从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其中许多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善于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中迅速装满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害怕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

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的聪明角色过去一直（现在还在）固执地向自己和别人担保说，"负三"大于"负二"。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5—256页

卢　　梭

卢梭（1712—1778）——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之一。

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0页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① 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

① 指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编者注

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① 在实践中表现

① 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无权状态。消灭这种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

这个理论在卢梭的17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编者注

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405页

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① 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

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

① 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编者注

另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

这种错误是悲剧性的，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写着**“人权宣言”**的大牌子，以自傲的口吻说道：“但创造这个的毕竟是我。”就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种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象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

这里不是替**恐怖主义者**的错误做历史的辩解的地方。

……

正好相反，**世俗的**历史却告诉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前想获得空前成就并耽于**幻想的政治**启蒙运动，才初次开始平凡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6—157页

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理中去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上混乱的原因。例如，罗伯斯比尔把大贫和大富仅仅看做**纯粹民主**的障碍，因此他想建立一种普遍的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可见，**政治**理智越是片面，因而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不能发现社会疾苦的根源。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0—481页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些人① 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② 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 年 12 月—185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04页

至于谈到恐怖，那末，在它具有意义时，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阶级或唯一能保证革命胜利的阶级的派别集团，通过恐怖不仅保持住政权（在把叛乱镇压下去以后这是起码的），而且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能无拘无束，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在边境上。1793年底，边境是相当安全的，1794年又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法国军队几乎到处都向前推进。带有极端倾向的公社③ 就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公社的革命宣传不论对罗伯斯比尔或对丹东来说都成了一种障碍，这两个人都要求和平（但他们

① 指罗伯斯比尔等。——编者注

② 指拿破仑。——编者注

③ 指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实际上它从1792年起领导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而进行的斗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限价的政策、通过旨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热月 9 日（1794年 7 月27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组织被消灭。——编者注

都按照自己的一套要求和平）。在三种倾向的这一冲突中，罗伯斯比尔获得了胜利，但**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6月26日，在弗略留斯之役中，茹尔丹使整个比利时拜倒在共和国脚下，因而恐怖就失去了立足之地；7月27日，罗伯斯比尔垮了台，开始了资产阶级的狂欢暴饮。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5页

巴黎公社② 和克罗茨都是主张宣传战争的，认为这是唯一的拯救手段，而公安委员会却玩弄**外交手腕**，它害怕欧洲同盟，想通过**分裂**同盟的办法去寻求和平。丹东想同英国媾和，即同福克斯以及希望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的英国反对派媾和。罗伯斯比尔在巴塞尔同奥普两国密谋，想同**它们**达成协议。这两个人共同反对公社，以便首先把那些想要宣传战争，想要在整个欧洲传播共和制度的人们推倒。他们居然胜利了，公社（阿贝尔、克罗茨等人）的脑袋落地了。可是，从这时起，那些想单独同英国缔结和约的人和那些想单独同德国一些邦缔结和约的人之间就不可能有和平了。英国的选举结果对皮特是有利的；福克斯被拒之于政府之外已有好几年了，这就损害了丹东的地位；罗伯斯比尔胜利了，丹东被砍去了脑袋。可是（阿韦奈耳对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在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但到了1794年6月26日，即在弗略留斯之役取得了胜利以后，这种恐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因为这一胜利不仅解放了边境，而且把比利时、间接地把莱茵河左岸都交给了法国，而那时罗伯斯比尔也就变成多余的了，他终于

② 指1789—1794年资产阶级的巴黎公社。——编者注

在7月27日垮了台。

《恩格斯致维·阿德勒（1889年1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1—312页

1793年的雅各宾派[1]是十八世纪最革命的阶级即城乡贫民的代表。当时，这个阶级已经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用最革命的办法、直到用上断头台的办法制服了本国的君主、地主以及温和的资产者，而欧洲的君主就联合起来用战争反对这个阶级，反对这个十八世纪真正革命的阶级。

雅各宾派宣布“协助联合起来的暴君策动反对共和国的阴谋”的人是人民公敌。

雅各宾派的榜样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过时，只不过应当使它适合于二十世纪的革命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对于二十世纪的这个阶级来说，人民公敌已不是君主，而是地主和资本家阶级。

列宁：《论人民公敌》（1917年6月20日〔7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页

1793年的雅各宾派是以掌握了**整个国家政权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阶级同剥削者阶级**进行真正革命斗争的伟大典范而载入史册的。

列宁：《论人民公敌》（1917年6月20日〔7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页

---

① 指罗伯斯比尔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编者注

拿　破　仑

拿破仑(1769—1821)——法国军事家。法国皇帝。

最后，这种不学无术忘记了普鲁士法正是起源于“这个沃尔弗”的哲学学派，忘记了法国拿破仑法典并不起源于旧约全书，而是起源于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鸠的思想，起源于法国革命。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29日—7月4日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129页

对这个非凡的人物的评价，除去上面所说的，我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统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我并不准备责备他。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但是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846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8页

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正是由于他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施，所以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他触犯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古老的习俗。正是由于他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所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禁售一切英国商品、和英国进行战争虽然促使德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咖啡、食糖、烟草和鼻烟价格暴涨，当然这就足以引起爱国的德国店铺老板们愤怒了。此外，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划的人。他们诅咒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子弟抓去打仗；而这些战争都是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钱搞起来的。但是他们却把这类英国人当做朋友加以颂扬，虽然这些人正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这些人靠这些战争**大发横财**，他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欺骗德国人，把德国人当做自己的工具。德国人咒骂拿破仑，因为他们想继续过苟且偷安的生活，保留自己原来那种可怜的生活方式，只关心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过问任何伟大的

理想和公共的利益。而最后，当拿破仑的军队被俄国击溃的时候，他们便乘机摆脱掉这位伟大征服者的铁链。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846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6—637页

我在第一封信里描写了法国革命前、革命时以及拿破仑统治期间的德国状况，指出了这个伟大的征服者是怎样被打倒和被哪些反对者打倒的。现在我继续来谈经过这次民族独立的“光荣复兴”之后，德国的情况起了怎样的变化。

我对所有这些事件的看法和一般的见解完全相反。但是我的看法丝毫不差地为德国历史上的下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所证实。要是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确实是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战争，那末结果就应该是所有被拿破仑征服了的国家，在拿破仑垮台之后，都宣布平等的原则，享受到平等原则带来的幸福。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就英国方面来说，战争是由惊惶失措的贵族发动的，并且得到了财阀的支持。这些财阀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利润泉源：接二连三的借款；国债的增长；以及他们有可能渗入南美市场，在那里倾销自己的工业品，夺取他们认为能使自己的腰包塞得更满的、原属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他们力图使不列颠威镇四海①，以便能够打垮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如果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够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障碍的话。最后，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从供应欧洲市场取得巨额利润的权利，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分庭抗礼。这就是当时英国统治阶级进行这次长期战争的**真正**原因。至于说法国革命威胁着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口实，也只不过表明这种“人类理性的完美创造”无比优越而已。从西班牙

① 原文为《Britannia rule the waves》，即“不列颠威振四海”（摘自英国国歌）。——编者注

方面来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卫正统的王位世袭和僧侣专制裁判的原则。1812年的宪法的原则是为了鼓舞人民继续作战在较晚的时候提出来的，而**这些原则本身**也是来自法国。意大利从来不敌视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只给它带来了好处；单就意大利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这件事来说，就得感谢拿破仑。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至于德国应该感谢拿破仑的地方，我已经在第一封信里谈过了。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846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9—640页

如果拿破仑在德国成了胜利者，那末依照他的坚决果断的原则，他至少要撤去三打为人敬爱的国君。法国的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就会为德国的统一确立巩固的基础，就会使我们摆脱涅谢尔罗迭先生所推崇备至的联邦议会的暴虐统治和它三十三年来使我们所处的可耻地位。拿破仑的一些法令将彻底清除所有中世纪的废物、徭役、什一税、优惠和特权、封建经济和宗法关系，在我们祖国的各个偏僻角落里这些东西现在还压在我们头上。德国其他地方也许早就达到莱茵河左岸在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后所达到的地步了；我们这里现在也许既没有乌刻马克贵族，也没有波美拉尼亚的万第人了。我们也许不必呼吸“历史的”、“基督教德意志”沼泽里的窒息空气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俄国的照会》（1848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43—344页

当拿破仑推翻了执政内阁的资产阶级统治，恢复了秩序，巩固了农民土地占有的新条件并在自己的Code civil〔民法典〕中加以肯定，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驱逐出法国国境的时候，农民就

欣喜若狂地归附于他，成了他的主要支柱。

恩格斯：《从巴黎到伯尔尼》（1848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1页

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impôts, á bas les riches, á bas la république, vive l'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9页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5—696页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卓越的改革不能视为奇迹；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就如象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同样，也正如象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上不是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一样，在军事上，它的任务也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及其运动性，而恰恰相反，在于把两者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2页

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

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2页

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89年12月—189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页

现在是波拿巴主义狂热的第三次发作。第一次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波拿巴，第二次是一个冒牌波拿巴①，第三次这个人甚至连冒牌波拿巴也不是，而简直是冒牌英雄、冒牌将军，一切全都是冒牌的，他主要的就是他那匹黑马。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89年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73页

拿破仑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革命所公开宣布的资产阶级

① 路易-拿破仑，后为皇帝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的体现。的确，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一个空想的恐怖主义者。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他充分地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是他也要求资产阶级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他的日常实践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他对工业琐事的轻视是他对思想家的轻视的补充。而在内政方面，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他仍然做为绝对的目的本身来体现的国家的敌人。例如，他曾在枢密院里宣称，他不容许大土地所有者任意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他那由国家掌管马车运输从而使商业受国家支配的计划也有同样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7—158页

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拿破仑的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副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最后的可能性。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页

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

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页

拿破仑本人是一个十足的暴发户，他是不会去照顾自己老部下的自尊心的，因此他强迫贝尔纳多特——违背以前的协定——于1810年11月17日参加大陆体系和对英宣战。他还取消了贝尔纳多特作为法国公爵所应得的收入，并借口贝尔纳多特是“和他不相等的国王”，而不接受贝尔纳多特直接给他的信件，并退回查理-约翰赠送给新生的罗马国王①的六翅天使勋章。

马克思：《贝尔纳多特》（1857年9月17日—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63页

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做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

法国的历史向我们表明，拿破仑主义反革命派是十八世纪末（第二次是1848—1852年）在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并且为正统王朝的复辟铺平了道路。拿破仑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环境里转向反革

① 指雷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仑第一儿子。——编者注

命而产生的。

列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发表于1917年9月1日〔8月19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45页

十八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着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自卫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7页

拿破仑第一当时对普鲁士的摧残和侮辱比威廉现在对俄国的摧残和侮辱要厉害得多。好多年来，拿破仑第一在大陆上一直是所向无敌的，他当时战胜普鲁士比现在威廉战胜俄国要彻底得多。但是几年之后，普鲁士还是恢复了元气，并且在解放战争中，利用了决不是同拿破仑进行解放战争而是同它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强盗国家的援助，推翻了拿破仑的压迫。

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①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错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结果，历史经过了充满战争和悲剧（各国人民的悲

① 我这里讲的帝国主义是泛指对别的国家的掠夺，帝国主义战争是指掠夺者为了瓜分这些赃物进行的战争。（列宁原注）

剧）的这一整个时代，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

列宁：《不幸的和约》（发表于1918年2月24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页

谁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视对这种教训应负的责任，不逃避这种教训，他至少会记得拿破仑第一与德国的战争。

普鲁士和德国多次同侵略国缔结过（比我们）苛刻十倍、屈辱十倍的和约，直到承认由外国人充任警察，直到承担派遣自己的部队去帮助拿破仑第一进行侵略战争的义务。拿破仑第一同普鲁士所订的条约对于德国的压迫和宰割，比现在兴登堡和威廉对我们的压迫要厉害十倍。

列宁：《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1918年3月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50页

有人引证拿破仑，硬说希特勒的行动象拿破仑，他的一切都象拿破仑。但是，第一、在这方面不应当忘记拿破仑的命运。第二、希特勒象拿破仑不过是小猫象狮子一样，因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1941年11月6日）。参看《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4年版第29页

林　　肯

林肯（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颁布了有名的《解放黑奴宣言》，平定了南方奴隶主的叛乱。1865年4月，林肯被奴隶主反动势力暗杀。

林肯总统在大势之所趋和人心之所向都不许再拖以前，是从来不冒险朝前走一步的。但是，只要 «old Abe» 〔“老阿伯”（阿伯拉罕·林肯）〕一旦相信这样一种转折点已经到来，他就会采取某种突然的、尽可能不声不响的行动而使朋友和敌人都同吃一惊。最近，他就用极其平静的方式干出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这件事如果放在半年以前，可能要以他的总统职位作代价，即使在几个月以前，恐怕也会引起一阵辩论的风暴。这里我们指的是麦克累伦被免除了指挥联邦所有军团的commander in chief〔总司令〕的职务一事。首先，林肯用一个精明强干而不讲客气的律师爱得文·斯坦顿先生替换了陆军部长凯麦隆。接着，斯坦顿就向布埃耳、哈勒克、巴特勒、薛尔曼等将军及其他各军区司令官和讨伐军长官发出指令说，今后一切命令，无论是通告性的或机密性的，一律直接自陆军部取得，同时，他们必须直接向陆军部报告。最后，林肯发布了几项命令，用宪法授予他的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 〔“陆海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用这种“不声不响的”办法，那位“年轻的拿破仑”① 就被解除了他对所有军团的最高指挥权，只有波托马克河线上的军团留给他指挥，虽然 «commander in chief» 的头衔还给他保留着。在林肯总统接收最高指挥权之初，就顺利地从肯塔基、田纳西和大西洋海岸传来了一些捷报。

马克思：《美国近事》（1862年2月2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05—506页

林肯总统——一个在法律上小心谨慎、从宪法来谋求和解、出生在肯塔基这个边界蓄奴州的人——总是很不容易挣脱“忠诚

① “年轻的拿破仑”是民主党队伍中拥护麦克累伦的人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个在比较年轻（34岁）时就做总司令的将军。——编者注

的”奴隶主的控制，极力避免同他们公开决裂，因此，他就要同北部的一些坚持原则的并且日益被事变进程推向前台的党派发生冲突。

马克思：《美国废奴派的示威》（1862年8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63页

林肯是史册上《sui generis》〔“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他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别的人在为几平方英尺土地行动时可以宣布“为理想而奋斗”，而林肯即使在为理想而行动时，他所谈的也只是“几平方英尺土地”。他犹豫不决地、违背本意地、勉勉强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好象是在请人原谅他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他向敌人迎面投掷过去的、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最严厉的法令，都象——他本人也力求使它们象——一个律师送交对方律师的普通传票，象在法律上玩弄狡计，象小气地附有种种保留条件的 actiones juris〔诉状〕。他不久以前发表的宣言，这份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份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的文件——林肯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宣言，也具有这种性质。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象英国的那些奴隶制度的品得——《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tutti quanti〔之流〕所做的那样，是再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在今天，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轻重的事情都故意带上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那在新大陆上以如此平凡的形式所进行的一切重大事件，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

马克思：《北美事件》（1862年10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86—587页

当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群情激愤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倾泻悲痛和愤怒的言辞。就连那些被雇用的诽谤者，他们成年累月地、不辞劳苦地、息息法斯式地对阿伯拉罕·林肯和他所领导的伟大共和国进行了精神上的暗杀，现在也在人民的这种愤懑情绪的总爆发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争先恐后地将辞令的花朵撒满他的陵墓。他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象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1865年5月2日和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8—109页

美国人民在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中曾把领导的责任付托给两位劳动的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得鲁·约翰逊。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1865年5月2日和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9页

我们在林肯先生再度当选总统时给他的贺信中表示过，我们确信，美国的国内战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同美国独立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

马克思：《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1869年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2页

加 里 波 第

朱泽培·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

关于加里波第从马尔萨拉向巴勒摩这次令人惊奇的进军的详细情况，我们在听到许多极其矛盾的消息以后，终于获得了看来相当可靠的报道。的确，这是本世纪最惊人的战绩之一；如果不是这位革命将领在这次胜利进军以前就卓有声誉，这样的战绩几乎是无法解释的。加里波第的胜利证明，那不勒斯王国军队仍然对这个曾经在法军、那不勒斯军和奥军面前一直高举意大利革命旗帜的人感到恐惧，而西西里人民对于他以及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则没有丧失信心。

恩格斯：《加里波第在西西里》（1860年6月7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9页

现在我们应当说，加里波第为了准备强攻巴勒摩而采取的机动，立刻表明他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将领。在这以前，我们只知道

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同时也很走运的游击队领袖；即使在罗马被围期间，他的那种用不断出击来保卫城市的战术也差不多没有使他得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超出这个水平。但是，这一次他所解决的纯粹是战略任务，经过这次考验以后，他已是一位公认的军事专家了。他赖以成功地欺骗了那不勒斯军队总司令、使后者犯下大错而让一半军队远离城市的那种方法，他的迅速的侧敌行军和在巴勒摩城下最出人意料的方向上的重新出现，以及他利用守军被削弱的时机所采取的坚决的强攻，——所有这些，要比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间所作的一切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军事天才。西西里起义得到了一位第一流的军事领袖；我们希望，不久将作为政治家而登上舞台的加里波第，将不会玷污他作为军事家的荣誉。

恩格斯：《加里波第在西西里》（1860年6月7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73页

大概，加里波第太信赖英国政府的善心，太相信路易·波拿巴的处境困难，他指望，在他把任何领土合并于皮蒙特之前，在他只倚靠意大利的武器来进行解放事业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是不敢干涉，不敢公然违反他过去在开始向意大利进行十字军征讨时所持的口实的。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靠的，即不管加里波第的计划是否顺利实现，在当前情况下只有他的计划，才不仅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意大利摆脱历来的暴君和内部纠纷，而且也能使意大利逃脱新的法国保护人的魔爪。

马克思：《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1860年7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01—102页

加里波第为了尊重维克多-艾曼努尔，并且在自由派贵族的强大压力之下，违反着自己的意志，同意了建立新政府和免除克

里斯比的职务，把他作为私人顾问和朋友留在身边。可是一当加里波第作了这种牺牲，他就看到了，那帮人坚持克里斯比政府辞职，只不过是为了强加给他一个名义上是加里波第的政府、而实质上却掌握在拉法里纳或卡富尔手中的内阁。这个内阁在拉法里纳的鼓励之下，并且依靠卡富尔庇护，将很快使他的全部解放计划化为乌有，并利用自己在国内的全部响影去反对他们已经叫起来的所谓尼斯的暴发户，即加里波第。正是在这个关头，加里波第不仅拯救了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拯救了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事业：他驱逐了拉法里纳和两位科西嘉伙伴，接受了阁员们——拉法里纳的走卒——的辞呈，并任命了一个爱国政府，我们可以提一下，马里奥先生是这个政府的成员之一。

马克思：《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1860年7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03—104页

随着事变的发展，我们已开始了解加里波第制订的解放意大利南部的计划。我们对这个计划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是赞叹它的宏伟。只有在象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够设想出这样的计划或是企图实现它，因为在这里民族派组织得这样出色，而且完全处于一个为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事业而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人的控制之下。

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进军》（1860年9月1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63页

现在我们有了关于加里波第占领南卡拉布里亚和该地的那不勒斯守军已经完全瓦解的详细材料。加里波第在他辉煌事业的这一阶段，表现出他不仅是勇敢的领袖和卓越的战略家，而且还是足智多谋的统帅。以主力对连绵的海岸堡垒线进攻，这一行动不

仅需要有军事天才，而且需要有军事知识。因此，可以满意地指出，虽然我们的英雄一生中没有经过一次军事考试，而且恐怕从来也没有在正规军队中服务过，但在这个战场上却同在其他任何战场上一样行动自如。

恩格斯：《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1860年9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68页

哥白尼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宇宙的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

哲学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事情，就象物理学、数学、医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在自己领域内所做的事情一样。维鲁拉姆男爵培根把神学的物理学称为献给上帝的永不生育的少女；他把物理学从神学里解放出来，于是物理学就变成一门有成果的科学了。正如你们不会去问医生是不是教徒一样，你们也不应该问政治家这一点。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真正的太阳系）同时，也发现了国家的引力定律：国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各种形式的欧洲国家的政府都企图——诚然，这是肤浅的，这是初次实践活动中所常有的——在确立国家间的均势方面运用这个定律；然而，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和其后的霍布斯、斯宾诺莎、胡果·格劳修斯，以及卢梭、费希特、黑格尔等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他们都效法哥白尼的榜样，哥白尼丝毫没有因为约书亚使太阳停止在基遍并使月亮停止在亚雅仑谷[①]而感到惶惑不安。

① 基遍和亚雅仑谷均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10章第12节。——编者注

最新哲学只是承继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始的工作。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29日—7月4日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7—128页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①。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447页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②，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

① 指哥白尼在他临终的那天——1543年5月24日（旧历）得到一本他的刚刚印好的著作《天体运行》，该著作阐述了宇宙的太阳中心说。——编者注

② 指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发现的海王星。——编者注

达 尔 文

达尔文(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

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①，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1日或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3页

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①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0—131页

达尔文的著作①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1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4—575页

达尔文在他的卓越的著作中没有看到，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

① 指达尔文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编者注

发现了“几何”级数，就是把马尔萨斯的理论**驳倒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他用华莱士关于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在达尔文的著作中，例如在谈到物种消灭的地方，也有在细节上（更不用说达尔文的基本原则了）从博物学方面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反驳。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 128 页

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①，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6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1—252页

和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恒性差不多同时，卡·弗·沃尔弗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②。但

① 指霍布斯《利维坦》一书。——编者注

② 1759年卡·弗·沃尔弗发表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发育论》（《Theoria generationis》），他在其中驳斥了预成论，科学地论证了渐成论。

预成是指成熟的机体在胚细胞中预先形成。预成论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生物学家中占统治地位。从预成论的拥护者的形而上学观点看来，成熟的机体的一切部分都已经以紧缩的形式存在于胚胎中，这样一来，机体的发育被归结为已有器官的纯粹量的增长，而本来意义上的发育，即作为新生成（渐成）的发育就不发生了。从沃尔弗到达尔文等许多杰出的生物学家不断论证并发展了渐成论。——编者注

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3页

但是还剩下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植物和动物，包括人在内——都各按细胞分裂规律从一个细胞中成长起来，那末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并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基本上是确定了；因此，不仅有了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末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527页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① 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间有无数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证实，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

① 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编者注

不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但是，没有种的概念，整个科学就没有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3页

达尔文的错误正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中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1）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的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的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

（2）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合这些环境的，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说来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化）。

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1页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正确，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学说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理论从自然界的历史再搬回社会的历史，那是很容易的；而断定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2页

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1页

极为谦逊的达尔文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做有损于他自己的荣誉，即使这样的前辈比起那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大吹大擂的杜林，是微不足道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5页

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在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尔萨斯的解释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还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定会对物种进化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定

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8页

达尔文赋予自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前进的人们所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别的变化，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生物培育者的智慧"，那末生物培育者也同样会**从虚无中**得出他那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动植物形态的变化。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9—110页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

但　丁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1893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页

歌　德

歌德(1749—1832)——德国作家和思想家。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

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 de guerre lasse〔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① 的时候，竟能郑重其

①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的极其肮脏的牛圈。意思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编者注

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 menus plaisirs①。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6年底—1847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257页

海　涅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

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

① 原意是：“小小的乐趣”；转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额外费用。——编者注

海涅。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211页

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泼辣而欢乐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6月12—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6页

世界历史确实是最伟大的诗人，它甚至能够模仿海涅。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9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4页

为了让我们怀着高高兴兴的心情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分手，它通过“诗册”（海·皮特曼编，1847年赖希附近的波尔拿出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庆祝会作为收场。在大熊的庇护之下，放出了旋转焰火，就是在罗马复活节也看不到比这更明亮的焰火。所有社会主义诗人都自愿地或者被迫地供应了几把必不可少的焰火。这些焰火状如麦束，嗞嗞作响，闪闪发光，升到天上，噼啪地散在空中，化作亿万颗星星，把我们黑夜般的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但是，可惜好景不长，不消片刻焰火就熄灭了，剩下只是浓烟一片，使夜色比实际上更加漆黑。只有海涅的七首诗，象一颗颗永远闪烁的明星，透过这片浓烟射出光芒，这七首诗出现在

① 恩格斯指海涅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些言论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部著作发表于1834年，它是对德国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一部分发表于1833年）的继续。海涅的这些言论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编者注

这伙人中间，使我们非常惊讶，也使大熊狼狈不堪。

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7年1—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3页

精致的文学始于海涅；它的使命是在于磨炼那十分需要磨炼的语言。在诗歌中这已经作到了，至于散文则比已往任何时候还坏。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法历史材料。关于德国的笔记》（1789—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俄文版第10卷第351页

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最积极的作家有：巴黎的卡尔·马克思博士，现在在科伦的莫·赫斯博士，巴黎的卡·格律恩博士，巴门（在莱茵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里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奥·吕宁博士，科伦的海·皮特曼博士等等。此外，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的作者；我把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

……

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

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1844年11月9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1—592页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①；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

① 正统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编者注

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①，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赫　尔　岑

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6页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

① 恩格斯这里指的是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团体；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有一个街垒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原来所在的圣马丁街。这个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失去的幻想》和中篇小说《卡金尼扬公爵夫人的秘密》中描绘了“在圣玛丽修道院墙下阵亡”的共和党人米歇尔·克雷田。巴尔扎克称他为“能够改变社会面貌的伟大的政治家”。——编者注

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蠢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蠢贼的第一人。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2页

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六十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主义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1—422页

赫尔岑是属于十九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朗和阿拉克切也夫① 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暴徒，赌徒，闹集市的好汉，养猎犬的阔少，打手，刑吏，淫棍”以及痴心妄想的马尼洛夫之流。“但是在他

① 比朗是俄国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统治时期（1730—1740年）的宠臣，出身于日耳曼贵族，他利用权势巧取豪夺，专横暴戾，历史上有“比朗暴政时期”之称。

阿拉克切也夫是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陆军大臣，以实行专横残暴的军阀统治著称。——编者注

们中间，——赫尔岑写道，——也出现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①，出现了象罗慕洛和烈姆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自然研究通信》的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就陷入了精神破产的状态。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俄国，直接观察过这次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1848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

①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者，因1825年12月14日发动反对沙皇政府和农奴制度的起义而得名。

十二月党人成立了三个秘密团体：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北方协会、巴·伊·彼斯节里领导的南方协会和安·伊·波利索夫和彼·伊·波利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些团体都有自己的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统治的纲领。由于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局限性，他们害怕广大人民起义，企图通过军事政变实现自己的纲领。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数百名起义者被逮捕，最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彼斯节里等人被处绞刑。列宁指出：“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编者注

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6—417页

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8页

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9页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家。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

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①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

① 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见《涅克拉索夫作品集》1950年俄文版第241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发表于1908年9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0—371页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历史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不抵抗邪恶；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发表于1908年9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3页

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这里反动的一词，是就这个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用的）。但是决不应该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它是与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相适应的。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后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早在六十多年以前，马克思在评价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评价过了。

其次，托尔斯泰的空想学说正象许多空想学派一样，是具有

批判成分的。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的深刻的指示：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成分的意义“恰与历史发展进程成反比例”。正在“按排”新俄国和消除现代社会灾难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愈发展，活动的性质愈明确，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会愈迅速地“失去任何实践的意义和任何理论的根据”。

在二十五年以前，尽管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但是托尔斯泰学说的批判成分有时实际上还能给某些居民阶层带来好处。然而在最近十年中，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已经前进了不少。而在我们今天，当上述许多事变已经结束了“东方的”静止不动的状态以后，当“路标派”的自觉的反动思想，在狭隘的阶级意义和自私自利的阶级意义上的反动思想在自由资产阶级中间得到这样广泛传播的时候，当这些思想甚至传染了一部分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造成了“取消派”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候，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向“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的说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1911年1月22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35—36页

梯　也　尔

梯也尔(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任法国内务大臣政府首脑、共和国总统等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f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

这个矮子[1]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驱去攻打巴黎。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

① 指梯也尔。——编者注

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9—360页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0页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象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①。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

① 指公元前一世纪在古罗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在罗马奴隶主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

苏拉专政（公元前82—79年）——苏拉是奴隶主贵族的走卒，他在专政时期曾大规模地屠杀与他为敌的奴隶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统治下，第一次宣布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经审判，人人得而诛之。

前后罗马三执政（公元前60—53年，公元前43—36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前三执政是庞培、凯撒和革拉苏，后三执政是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三执政的统治是为消灭罗马共和国和建立罗马单一的君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阶段。三执政广泛地采用了在肉体上消灭自己敌人的手段。前后三执政垮台以后，接着就开始了自相残杀的流血的内战。——编者注

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3页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① 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

当司徒卢威先生以革命的名义说起话来的时候，我们由不得要想起梯也尔来。在二月革命前几天，这个穷凶极恶的矮子，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变节行为的理想代表人物，就嗅到了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气息。于是他在议会讲台上宣布，说他**是革命政党中的人！**（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解放派转到革命党这方面来的政治意义和梯也尔的这种“转变”**是完全相同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5页

波 拿 巴

波拿巴(1808—1873)——拿破仑的姪子，第二共和国总统，法国皇帝。

在波拿巴身上，帝位僭望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

① 指梯也尔及其一伙。——编者注

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债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 年 12 月—185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41页

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652页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充当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 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620页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

① 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的生平中的以下一些事实：1832 年路易·波拿巴曾在土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1848 年在英国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曾志愿充当特别警察（特别警察是英国的一种由公民组成的警察后备力量），与警察当局一起反对 1848 年 4 月10日由宪章派组织的工人示威。——编者注

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①，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4页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③的仪式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3页

---

① 塞文　是法国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整个这个地区爆发了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的农民起义。由于对新教徒的迫害而爆发的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方一直到1715年还有起义爆发。——编者注

② 万第　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万第省曾经发生贵族和僧侣领导的农民反革命暴动。——编者注

③ 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　是保存在特利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编者注

乍看起来，好象现在路易-拿破仑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主宰统治着法国，好象除了他本人的权力之外，唯一的权力就是那些把他团团包围起来的宫廷阴谋家（他们为了独占这位法国独裁者的宠爱和垄断对他的影响而互相倾轧）的权力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8页

这个波拿巴真是一头不可救药的蠢驴。这个畜生对历史运动毫无概念，全部历史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大杂烩，没有任何联系，起决定作用的是老江湖骗子的小骗术，而且是什么样的骗术呵！对付任何事变，总是只用同一个处方。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5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3页

俾斯麦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普鲁士首相；北德意志联邦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首相；工人运动的死敌。

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

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1页

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萨多瓦之役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蹂躏德国。普鲁士在得胜之后，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骗把戏和财政欺诈手腕，它的漂亮的言词和最下流的诈骗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1870年7月19—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9—340页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①]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象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

① 指普法战争。——编者注

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8页

自从俾斯麦在波兹南① 进行文化斗争② 并且仿佛是为了亵渎教皇而禁止波兰文教科书，取消波兰语，用尽一切力量来把波兰抛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愈来愈接近俄国，以便即使在它的统治下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并在国际的行列中进行斗争。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

俾斯麦指望，无政府主义者和杜林派的阴谋能瓦解我们同志之间的团结，能引起他最希望的事——进行暴乱的尝试，而那时他就可以开枪了。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人在德国干的很出色，我相信，整个普鲁士帝国必将在他们面前碰得粉碎。而俾斯麦所得到的只能是：如果俄国跳起舞来，——这已经不要等待很久了，——德国的变革也就足够成熟了。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78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9页

---

① 在1894年版中不是“波兹南”，而是“波兰”。——编者注

② 文化斗争 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

恩格斯讥讽地把使波兹南的波兰居民普鲁士化的政策称为在波兹南进行的文化斗争。——编者注

布勒斯劳选举[1]在这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俾斯麦在自己加速自己的溃败。他确实是在“随机应变”——从溃败走向溃败[2]。在英国报刊上他已经几乎找不到辩护人了；甚至非常同情俾斯麦的《泰晤士报》也企图摆脱这种状态。自从俾斯麦成为保护关税主义者以来，英国人当然是不愿理睬他的。其实，就是在德国，回复到保护关税主义也是公开的反动措施。不管怎么样，俾斯麦先生又把事情弄到要解散帝国国会的地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让他去狠狠地触怒德国庸人吧；最后连德国庸人也会失去耐心的，特别是当事情涉及到钱袋的时候。而俾斯麦在对外政策方面造成的混乱，用任何代价都是无法清偿的。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3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2页

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

① 指1879年2月5日布勒斯劳（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城的西部选区因为该区议员亨·毕尔格尔斯去世而举行的帝国国会补选。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条件下举行的这次选举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团结一致。工人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他虽然没有当选，但得到的票数超过了七千五百张。——编者注

② “随机应变”（《von Fall zu Fall》）——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居拉·安德拉西的用语，后来成为说明随风转舵、没有明确方向的政策的普通名词。安德拉西在谈到1876年举行的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柏林会议时宣称，三大强国关于东方问题没有通过任何明确的决议，而仅仅是达成了关于**随机应变地**协调各自的立场的协议。恩格斯在这里把这一说法用来形容俾斯麦的政策，含有双关的意思，因为《von Fall zu Fall》还有“从溃败走向溃败”的意思。——编者注

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想，那末俾斯麦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我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象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该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了的革命。在俄国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怎么办的。

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1879年3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366页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二十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

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也就是"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

在整整二十年内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斯”跟前匍匐跪拜时所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间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一千五百万或两千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躏；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连军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4—325页

1848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然而这次革命毕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1892年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7页

马 尔 萨 斯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传仇视无产阶级的人口论。

马尔萨斯本来就是一个职业**剽窃者**。只要把他论人口的著作

第一版同我以前引用过的唐森牧师的著作[1]对比一下，就会相信，马尔萨斯不是作为具有自由创作思想的人来加工唐森的著作，而是作为盲从的剽窃者照抄和转述唐森的著作，同时**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唐森，隐匿了**唐森的存在。

马尔萨斯利用安德森的观点的方式，是很有特色的。安德森维护鼓励谷物输出的出口奖励和限制谷物输入的进口税，决不是从地主的利益出发，而是认为这样的立法会**"降低**谷物的平均价格"，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均衡发展。马尔萨斯采用安德森的这个实际结论，则因为马尔萨斯作为英国国教会的真诚教徒，是土地贵族的职业献媚者，他**从经济学上**替土地贵族的地租、领干薪、挥霍、残忍等等辩护。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因此，他为**"非生产**劳动者"、消费过度等等辩护。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1—122页

马尔萨斯干了什么呢？

他利用安德森的理论，代替自己的（也是剽窃来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怪诞幻想——他把这种怪诞幻想当作"漂亮辞句"保留着——来证明自己的人口论。在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符合地主利益的限度内，他保留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仅仅这一事实就证明，马尔萨斯同安德森本人一样，不了解这个理论

① 指唐森的《论济贫法》。——编者注

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联系；——他不去考察这个理论的创始人的反证，就利用这个理论去反对无产阶级。从这个理论出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向前迈进一步的使命就落到了李嘉图身上，这就是：在理论上，作出商品的**价值**规定等等，并阐明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在实践上，反对**资产阶级生产基础上**的土地私有权的必要性，并且更直接地反对国家促进这种土地所有权发展的一切措施，如谷物法。马尔萨斯得出的唯一的实际结论在于：为地主在1815年要求的保护关税辩护——这是巴结贵族，——并且对财富生产者的贫困进行新的**辩解**，为劳动剥削者进行新的辩护。从这一方面来说，是巴结工业资本家。

马尔萨斯的特点，是思想**极端卑鄙**，——只有牧师才可能这样卑鄙，他把人间的贫困看作对罪恶的惩罚，而且在他看来，非有一个“悲惨的尘世”不行，但是同时，他考虑到他所领取的牧师俸禄，借助于关于命运的教义，认为使统治阶级在这个悲惨的尘世上“愉快起来”，对他是极为有利的。这种思想的卑鄙还表现在马尔萨斯的科学工作上。**第一**，表现在他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上；**第二**，表现在他从科学的前提做出的那些**看人眼色的**而不是**毫无顾忌的**结论上。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23—124页

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就象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

而**马尔萨斯**呢！这个无赖，从已经由科学得出的（而且总是

他剽窃来的）前提，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结论。因此，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

他的第一部著作①，就已经是靠牺牲原著而剽窃成功的最明显的写作例子之一。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它还为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护。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25—126页

他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相反，对于被压迫阶级，他的结论却是毫无顾忌的，残酷无情的。他不单单是残酷无情，而且宣扬他的残酷无情，厚颜无耻地以此自夸，并且在用他的结论反对“无权者”时，把他的结论夸大到极端，甚至超过了从他的观点看来还可以在科学上说得过去的程度。②

---

① 〔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例如李嘉图（见前），当他的理论使他得出结论说，把工资提高到工资最低限度以上并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时，他就直接说出这一点。而马尔萨斯坚持工资保持低水平，目的是要资产者借此来发财。（马克思原注）

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憎恨马尔萨斯——科贝特**粗鲁地**称他为**“江湖牧师”**（科贝特虽然是当代英国最大的**政论**家；但他缺少莱比锡大学教授的教养，并且公开反对“学者的语言”），——对马尔萨斯的这种憎恨是完全正当的；人民凭着真实的本能感觉到，在这里反对他们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人**，而是一个被他们的敌人收买的统治阶级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27页